
歲月沉沙第三部
風雨歸舟
羅蘭

# 目次

## 我是歸人

## 我是過客

**溯源**

# 序曲



# 一、感情化冰先是痛

從一九八七到一九八八年，居住在台灣的人們，經過了變化最多、變化幅度最大的一年。

在這一年之間，各種禁令的相繼解除，使人們的心情煥發出多年以來所未曾有的異彩。我們從戰戰兢兢過險橋的心情中走過來，對前途得到了初步的肯定。回顧這半個世紀以上的艱苦行程，卻是不由得有點痛定思痛而感慨莫名。

我說半個世紀以上，是包括了從三十年代走過來的這一代人們一生的歲月。他們挾帶著民國二十年以前的內戰與北伐的歷史遺痕，從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算起，是他們讀初中、高中或大學的年齡。國仇家恨已經摻入了他們年輕的呼聲，顛沛流離已經從他們的腳下開始。

那首直到現在仍然有人在唱的「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的歌，所描寫的正是「長城外面」，東北同胞的故鄉。他們從那一年、那一天，敵人打到了他們的村莊開始，就被迫經歷了歌詞中所說的「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的大遷徙。那是「九一八」，日人大舉侵華的第一站。

從那一年、那一天，他們就要為了大愛與大恨，忍痛凍結了自己個人的感情。要拋棄的豈止是「田舍、家人和牛羊」？他們必須要訓練自己，凍結各種私人的愛恨、離別與割捨，感情上的堅與忍，早早的就成為他們對自己最凌厲的要求。

戰亂與國仇，使他們不得不面對離鄉背井，不得不面對投筆從戎。拜別爹娘的那一刻，他們的心情是慷慨赴義，而不是兒女情長。他們的年齡在戰火與離別中增長。他們的歲月裡，寫滿了拋棄與割捨。他們的日記裡，寫滿了對自己的鞭策：

「你愛你的父母、兄弟姊妹，因而捨不得他們嗎？不，你要和他們分開！無論你是被迫或自願。」

「你愛你的愛情嗎？不，你要和他分開，無論你是被迫或自願。」

「你要婚姻嗎？不，你愛的不一定能屬於你；你擁有了他，你不一定能給他幸福，無論你是被迫或自願。你們的小小爐灶沒有安全與安定。也許在某一次流離中，你們永遠不再相見了；也許你到了天南，他到了地北，再相見時也不是原來的你和他了。」

「也許，你們的孩子在大家搶登某一班擠得不堪負荷的列車時，被遺落在車站上了。也許，被遺落的是你的妻子或丈夫。」

「你已一腳踏入了那使你今後可以青雲直上的校門了嗎？對不起，你要讓一讓。戰爭來了，學校在炮火下碎成齏粉，你的學業前途之夢，也就碎成齏粉。你只能對自己說，夢碎的代價是，

你奔赴了一個令你覺得自己更崇高、更神聖的理想。」

「你的父母年邁體衰，他們曾經那麼愛你、照顧你，對你寄以厚望。你曾對自己發誓說：『我一定要孝順他們，奉養他們。』你做到了嗎？沒有，沒有。你爲了奔赴一個更崇高的理想，你要爲國家獻身，爲民族效命。於是，那年邁父母倚閭目送你遠行的一個鏡頭，就永遠在那裡『停格』。」

「你曾想念過他們嗎？在長長的歲月裡，你曾爲自己的不孝而不安過嗎？沒有，好像沒有，似乎沒有，大概沒有。……你不敢肯定，不敢深入反省。你假裝什麼也不曾發生，你不想追問自己。也許，在夢中，你曾哭泣。但醒來之後，你活在更清明的理智監督之下，你不去想自己究竟是在什麼樣的感情之中。」

「你努力讓自己豁達，你看輕這一切人間世的苦樂。你把一切個人的悲歡看作毫末，你承認人很渺小，於是，學業、事業、愛情、婚姻、父母子女的親情，當然都更微不足道，更是沙塵。於是，你活得開朗而堅毅。」

「你是這樣的善於克制自己，你只要不讓自己悲傷，就可以不悲傷；你不讓自己懷念，就可以不懷念；你不讓自己牽戀，就可以不牽戀。」

……

從民初到五十年代的炮火，每次行動的綱領或許有所不同，顚沛流離的滋味卻是沒有兩樣；

渡海來台時的背景即使每人不盡相同，一個海峽的徹底隔絕，卻是沒有兩樣。所隔絕的，在一切現實的意義之外，對「人」來說，不是別的，而是「感情」。

這一代人們，無論他是在海峽的那一岸，在一生的歲月裡，所努力以赴的，是救國與建國；而在這慷慨悲歌的漫長生途之中，他們所拚命圍堵的，卻是個人的感情。他們必須把一切的割捨視爲尋常，必須對一切的牽繼視若無睹。否則，他們活不下去。

這一代，從三十年代走過來的這一代，活得堂堂正正。他們練就了鋼筋鐵骨，對一切的柔情，都可以有「一跺腳，不顧而去」的堅決。戰爭讓他們必須如此；現實讓他們必須如此。這麼長時期的戰亂播遷，這麼長遠的流離失散，證明了很多事。而其中最嚴肅的一項證明卻是：這一代的人是用了前所未有的力量與方法，在一面爲國家民族前途而奮鬥，一面爲自己的感情拚命地築堤。

築堤是爲了防堵感情的溢出。他們知道，如果感情氾濫，會使他們無法抵禦，日子將會過得不堪想像。

我是其中之一。

忽然想起陸游筆下的「**一個飄零身世，十分冷淡心腸**」，頗似我多年來心情的寫照。「飄零身世」的副作用原來就是如此。離別與割捨經歷多了，形成了「十分冷淡心腸」。這歷程，起初是禁不起折磨而痛苦；後來是了悟到「你必須讓自己經得起折磨」而堅強。那麼，與其「有情」

而痛苦，不如「無情」而淡然吧！

多年來，我只敢看蘇、辛、陸、朱等詞家清曠的作品。他們幫我超然，助我擺脫。「超然」於人間感情之上；「擺脫」人際感情的牽戀——既然無法付出，就讓自己多提煉出一份力量，「獨往獨來」吧！

把太多情的詩句封鎖起來，就不會爲那「一簇煙村，數行霜樹」的故園景色去做無謂的傷懷了。

一九八七年九月，政府說，可以回大陸探親了。

年輕人是搶著要替長輩去，老兵們是老淚縱橫地試著去。而一般說來，長一輩人們的反應是相當沉默。

文藝界年長的朋友，也大部分反應淡然，極少人從正面對這件事發表意見。報紙副刊上，一星半點，有幾個聲音，大部分所刊出的文章卻都在「顧左右而言他」，環繞著一個應該觸及的問題，在它的周圍輕描淡寫地轉。

這表面上的漠不關心，使你要在那偶然迸發出來的一言半語間去尋索，才可以找到這堅固堤防背後的濤聲。

春節期間，《聯合副刊》上刊出兩篇關於過年的文章，卻都是海外作家的。王鼎鈞先生寫的是幾位海外華僑在宣誓歸化美國的前夕，長歌代哭。

思果先生寫的是〈我們過很多年〉，其實是什麼也沒過。我在這天是「爬格子」，寫了一篇並不想發表的感想，題目叫〈不該給自己安排那麼多的年〉。

國內作家們對海峽兩岸的感情，一向表達得比海外作家要謹慎。沒想到在解禁這件事情上，也仍然是海外作家先透露了一點抽象的心聲。大家同樣在圍繞著一個應該觸及的主題，輕描淡寫的轉，而唯一道出的訊息是，「我們的感情也在解禁」。至少，大除夕的報紙副刊，居然也忘記禁止說感傷的話了。

感傷是一種眞情。它能不能流露？什麼時候流露？怎樣流露？在習慣了努力爲自己家國之思的感情築堤的人們來說，成爲一個新的考驗——能流露嗎？感情是眞的凍結了嗎？如果堤防撤除，會不會氾濫成災呢？

被壓擠成一大片厚厚的冰層的感情之流，萬一化開的時候，會不會痛？我知道，在北國寒冬裡，凍得快要壞死的手腳，恢復知覺的時候，是很痛的。

也許，我們需要時間，時間給我們的答案將是肯定的。在目前，我只覺得日子忽然變得很溫柔。

冬末春初，細雨微疊的天氣，我偶爾會坐在書桌前，重新爲少年時所愛讀的某些詩句感動，它們不再只是那「**飄瀟我是孤飛雁**」的疏淡蕭條；所重拾的卻也不僅是柳永的「**楊柳岸曉風殘**

月」，讓我回到一個能夠動用感情的、故國式的別離；或敢去想像那「霜風淒緊，關河冷落」，「瀟瀟暮雨洒江天」的寂寞關山。

也不僅是在歐陽修的「買花載酒長安市，又爭似，家山見桃李，不枉東風吹客淚」，讓我有放膽念舊懷古的心情，敢在幽思中去擁有一個應該屬於我的「長安」。

就連「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的閒情，也不再令我覺得「今世何世，你還如此逍遙？」而想到自己在這窮畢生之力所修築的感情堤防背後，也可以向故國家人親友們說一聲「別來將謂不牽情，萬轉千迴思想過」了。

一位搶先代表長輩跑回大陸看過回來的年輕朋友，曾很直率地批評我們這些人對這件事的趑趄不前，說：「你們爲什麼要『自綁手腳』，有什麼好『怕』的？」

我不怪她不能理解我們這半世紀以上的感情凍結，需要怎樣的一種「化冰」的過程。這過程，使我們的反應不是雀躍爭先，而是「痛」定思「痛」。

我羨慕他們的「不怕」。悲憫自己這一代多少年來的「自綁手腳」。羨慕他們不必問，這「民主」、「開放」、「不用怕」的偉大時代，是誰在堤防的堅冰之下，凍結了自己，承受了一世的寒霜，才鑄造而成。

「不怕」的人是因爲不必再經驗那種種「怕」的過程，因此覺得自己是生來就有「勇敢」的

權利。

說的也是，在連「綠島」也將成爲觀光勝地的這「嶄新」的時代，誰還願意去追問什麼是勇敢，什麼是懦弱；什麼是淡漠，什麼是有情；什麼是奉獻，什麼是攫奪？

在這樣耀目的新時代裡，在四通八達的坦途上，習慣了埋頭修路與築堤的人，反而相當的不能適應。在使自己能從強烈的光明中睜開眼睛，重新爲自己的感情找到定點之前，你怎能怪他們這暫時的「欲語還休」!?

# 二、問君能有幾多愁

也許你已經發現，也許你還未來得及覺察，自從政府開放回大陸探親以來，喧騰熱鬧，辦活動、提意見的，大部分是年輕人。年長的，和這件事眞正切身有關的一代，反而是沈默無語的居多。

報紙和雜誌的記者，先先後後，用電話訪問過我，我口頭的反應是：「等等再談」，而內心的反應是：「一言難盡」。和我同時代的人，會有同樣的反應。

凌峰回去了。梁燕民說，也要回去。盧碧雲在鏡頭面前洒淚……。這些演藝界的公衆人物，所表現的也只是從千言萬語之中，抽繹出來的一絲半縷。年長一代的沈默和年輕一代的喧騰，形成強烈的對比。

辛稼軒詞：「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爲賦新詞強說愁。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

「卻道天涼好個秋」的輕描淡寫，也就正是這番「欲說還休」的況味了。

在演藝界熱心可感的種種「義行」之中，我最欣賞的倒是崔苔菁回答民生報記者訪問的一句話：

「藝人的工作是取悅大衆，這就夠了，不要讓政府太爲難。」

以姣嬈誇張的動作、豔麗的外型，紅遍歌壇的崔苔菁，針對這件事所發表的意見，竟然是如此成熟而體貼，使我這相當冷靜的人，在讀到這段不到兩行的話時，竟是驀然淚下。崔苔菁所表現的成熟，當也代表了演藝界終年在大風大浪裡奮鬥掙扎求表現的人們，對人生世相深入的認識和體悟。

我們是處在了一個「非常」的時代。這樣的時代，前所未有。這樣的時代，太不單純。它絕不是一些直覺的反應所可涵蓋，絕不是一些簡單的事例所可說明。它是一部血淚交織的「極長篇」，你怎麼寫，也寫不完它所有能代表這時代的事件。你只能在悽傷與狂喜之間，往復迴環，莫知所以；最後，你所有這些複雜的反應都已匯成深潭，歸於靜止與沈默。

倒是另有一些民衆，早年由大陸隨軍來台，退役之後，自謀生路，維持了起碼生活而略有積蓄的人，用他們最擅長的、做了再說的實際作風，在「覺得可以了」的情形下，不聲不響地去了又回來，然後繼續埋頭做他們的營生。

後面街角那個水果攤的老闆，好久沒來了。攤子的地方空了很久。起先以爲是被警察或大廈管理員趕走了，忽然有一天，又看見他那紅撲撲的、健康的笑臉，一團和氣地在那裡做生意。我問他：「嗨！怎麼好久沒見你呀？」

他用若無其事的語氣說：

「回了一趟大陸。」

「好不好呀？」我用「平常心」問候似的，想繼續這談話。

「東西很便宜，生活很落後。還是這兒好啦！」

他輕描淡寫地說完，就又忙著秤蘋果去了。

我也就把照例的那一千個問號都藏回心底，專心地等著他把錢找給另一個主顧之後，也給我秤幾個蘋果。

計程車司機，年長一點的，大部分是大陸人。你問他們：「要不要回去看看？」答案各不相同。有的是：「去過了，看看老媽媽呀！快九十歲了！再不看，看不見啦！」

有的說：「去做什麼?!家裡都沒有人了！」

有的說：「沒錢怎麼去？」

有的說：「算了！有眼淚還怕沒處掉啊？」

無奈的成分比想像中的興奮要多得多了！

旅居海外的人們回去過的就太多了。作家和海外學人們不算，他們寫回來的文章與報導，盈篇累牘。雖然一直給人一種「雙重標準」的印象，但總算從他們的筆下得到過不少的故園訊息。倒是另一部分不寫作、也非著名學者的人，在海外飄泊多年，退休之後，拿著外國的退休金，以外國異鄉人的身分，回到故鄉——想定居。結果是只和親朋故舊做了一陣「擺也擺不平」的聚晤，格格不入的一個「外國人」與「中國」。觀念上的不被接納，現實生活的無法適應，徬徨無主地回到台灣，希望這裡也聊可做個第二故鄉。但小住一陣之後，仍覺自己是一片孤雲，只得還是悵然地「回到」「番邦的祖國」去了。至少，那裡有他的退休金和年紀更老時的社會照顧。看看他們「三地」奔波之後的、現代式的「葉落歸根」，你也說不出自己的眼淚是來自那一個泉源。

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女孩（在現代的寶島，富裕嬌寵的生活之下，不僅二十多歲還是嬌憨天眞的「小孩」，四十多歲也仍然會被稱爲「女孩子」），隨著父母回了一趟大陸，帶回來三本照片，給同事們觀賞：

「大陸好落後呀！蒼蠅好多！」

「我們坐了火車，那火車好大呀！」

「你看！這是武漢，這是西湖，這是桂林，這是廣州。下回我們要去北方，看長城和山海關。」

「你們去這一趟，花了多少錢？」

「不知道，都是爸爸媽媽花的。」

不識愁滋味的、豐衣足食培養之下的少女，輕輕快快地把照片收起來，「拜啦！」轉身走了。

留下一團迷惑給辦公室裡年長的人們。奇怪怎麼她好像去了一趟東南亞，或日、韓之旅，完全是觀光客的心情。

孩子們蹦蹦跳跳地爲「老兵返鄉」募款。「老兵」們反而變成了小孩，沒有行爲能力似的等著孩子們來「接濟奉養」，盡盡他們天眞無邪的「孝道」。

小孩就小孩吧！募到了款，冬天也到了。且等明年開春，舒冰解凍的日子，回去看看。眼前既然一時也走不了，只得先算計算計，老家還有誰。該給他們帶點什麼？但願他們身體還都健康，八十、九十，都沒關係！只要有一口氣在，見得了面，就不白跑這一趟了！

還鄉，眞是形形色色，有苦有樂。

一生中還過兩次鄉的，大有人在。抗戰八年，勝利之後的那次「還鄉」，不等年輕人們蹦蹦跳跳地唱歌，他們自己就會唱：

**捲詩書整行裝，**

**上征途意氣揚，**

江流似箭，
關山退兩旁，
怎及我歸心更急，
恨不能插翅飛翔
……

不是老兵們老得不會唱歌了。
而是這時代，沒有這種歌可唱。

# 三、天才中國

自從開放大陸探親以來，許多四十年來未曾有的，有關兩岸的活動逐漸出現；許多一直就有的活動化暗為明。這過程，新鮮刺激、緊張懸疑、高潮迭起。吸引人的程度，勝過所有的連續劇。

海峽兩岸從隔絕到交通，政策上，雙方都堅持「絕不改變」。我們的「三不」，他們的「四個堅持」，都一再地重申，表示毫無讓步的餘地。

但在「三不」與「四個堅持」聲中，我們從可以經由紅十字會、在三親等之內、無公職的條件下申請去大陸；到不必都經紅十字會，從第三國轉個彎，即可回大陸；到目前，行李直掛「台北—北京」或「北京—台北」；旅客搭機，從「第三國」轉個飛機（甚至停個站），不必入境，就算是「經過了第三國」；以及開放教職員回大陸探親，記者赴大陸採訪；這一系列的作業，完全「不違反三不」。我們的政府，仍然是在「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原則之下，與大陸處

於「敵對」狀態。而大陸那邊，也在「四個堅持」聲中，發給「旅行證」、「台胞證」。下令全國各級幹部「優待台胞」，甚至對待亞銀年會的我方代表，可以不持證，不看證，掩耳盜鈴一番，以表示「三不」和「四個堅持」。

時常有人問，政府究竟採取什麼樣的大陸政策，不該如此不明不白，讓大眾無所遵循。其實，中國自古以來，就是這麼聰明——你與其有個政策，不如沒有政策，可以更有伸縮的餘地。一旦有了明文規定的政策，那就必須遵循；一旦必須遵循，就會在「轉不了圓」的情形之下，「作法自斃」。中國人不喜歡「作法自斃」。

「法」是死的，「人」是活的。

如果我們把「三不」和「三不通」釘死在毫無彈性的解釋上，又怎能這麼快達成這探親和「去那邊看看再說」的願望？

「去那邊看看再說」是「活」的，是可以「鑽法律縫隙」的，是可以把同樣的一句話做不同樣的解釋的。不信你看所謂「經第三國」，究竟「不入境」也算「經過」，還是不算「經過」呢？「不交通」是不是等於「經第三國去就可以」？行李雙方直掛，算不算「交通」？那邊一通電話打過來了，你接聽之後才知道這也是「交通」，但這有沒有罪呢？

記者從不准採訪，到反正也順便採訪過了，到「這還不去？」「早知道，早就去了。」你說那一條是合乎或不合乎那一條法律或政策的呢？

「兩岸關係法」慢吞吞地在訂，好像反而是越慢越好。訂出來之後，萬一跟不上事情發展的速度，或不敷事實的需要，那時候是改還是不改呢？是遵守還是不遵守呢？倒還不如大家走著瞧。「行」就繼續；「不行」就「引以爲戒」。政府反正什麼也還沒說，老百姓自己去鑽鑽看，「行」就是「行了」；「不行」也不違任何一條法，政府也省得爲難。

「官方」是「絕對不接觸」，所以郭婉容部長去了，也算沒去。你也不能說下不爲例，下回再說下回的。國旗、國歌、名稱之類的問題，從絕對堅持，到豎個「抗議中」的牌子，以免誤事；從你唱歌，我就不參加，到你唱你的，我雙手交抱胸前，表示「我沒聽見」，這都算是「不違反」「國策」，反正我們說不違反就算不違反，說違反才算違反。

這使我想起我家二弟小時候和鄰居孩子打架，打贏了，打算見好就收，乘勝走回家門口的時候，那敵對的一方不甘認輸，挑戰式的喝問：「有本事，你再來比試比試？」二弟用同樣兇悍的口氣，大聲回答說：「我不！」

口氣兇悍就行了，行動有什麼關係？大原則是「不吃眼前虧」。何況今天打完架，明天還不是又玩在一起了？

兩岸關係解凍的過程，充分顯示了中國人的智慧，和中國文化富彈性的一面。

自古，中國就是一個富彈性的民族。我們的宇宙是「動」的。「山不轉，路轉」，人是「活」的。

我們比較不喜歡把事情釘死在一個狹窄的意義上，正如我們不喜歡「嚴刑峻法」。我們一向所說的「情、理、法」，雖然在現代世界飽受批評與否定，說它使我們的法律一直形同虛設；但是，以兩岸關係來看，我們這兩年以來所走的路，完完全全，百分之百，是「情」字領先，「理」字隨之，最後才問到有沒有「法」。而在必須「依法」的時候，不是發現法律不適合當前的情況，就是發現「沒有可以依據的法」，於是，還得麻麻煩煩地去忙著「修法」，或「制定新法」，把政府忙得頭昏腦脹。而如果問問民意的話，從已發生的事情來說，大家也似乎很滿意於這種種的「法外施恩」或事後的追認。

奇怪就奇怪在這裡。

我們明知許多問題出現在「法」的不健全，卻在實際上，有時會覺得「幸虧它不健全」。如果眞的希望它那麼健全，不但恐怕至今還在等著「兩岸關係法」出現之後，才可以「探親」；而且我看，如果讓政府在兩年前就訂個「兩岸關係法」，它也仍然會被「三不通」拘束住，無法說出「你可以去，但我可沒讓你去」這樣的話，民眾反而眞的去不成或眞的「犯法」了。

從這一點來看，我們中國人眞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類，一切「走著瞧」。你不「走」，又怎能「瞧」到什麼？又怎麼能知道那一條法該訂，那一條法不該訂？世界一天到晚在變，你怎麼能先訂個法，不許它變？如果「法」也天天變，那豈不成了「朝令夕改」？如果不變，那豈不是「跟不上時代」？

在有一次聚餐席上，朋友們談起政府訂不出大陸政策，我開玩笑說：「政府官員都不許回大陸，他們怎麼知道這政策該怎麼訂？」常言道：「眼見為實，耳聽為虛」，我們的政府官員都只「聽」說大陸如何如何，而沒「看」見過大陸如何如何，你讓他們怎麼訂？所以得先讓他們回去看看再說。

大家別以為這眞是開玩笑，現在的情況豈不正是如此？大陸政策跟在民衆後面訂，你去過了？我才說可以去；你和那邊做生意了？我才說可以做；你做生意吃虧了？我才說「眞會吃虧」；你吃了虧之後，換個較聰明的方式又去了？我才說「這個方式比較聰明。」

中國式的「民主」比西方式的「民主」實際多了。西方才不會有這種「靈活運用」的事。而我們由衷地覺得由於這件事，大可證明中國人能把許多不可能變成可能的這種「智慧」。中國人高瞻遠矚，從大處著眼，不斤斤計較細節。這種智慧，給我們帶來許多迴圜的餘地，可以有更廣闊的天地供我們奔馳。我們也不說否定「法」的功能，我們百分之百地肯定它，而且一有機會就批評自己沒有「法治精神」。但我們會把「法治精神」擱在日常無關緊要的小事上。如果有了大事，像大陸政策這種攸關民族命脈、國家前途的事，那「小小的法」又如何來得及管？又如何涵蓋得住？如果你要等一切依法，那你一定直到今天還在為資金沒出路，貿易受制於外國而發愁不已。何況那麼多家人離散的兩岸民衆，你不快點讓他們自己去想辦法見個面，那還叫什麼「民主」的國家呢？老百姓又怎能說你這政府的好話呢？「法」在後，「情」在先，「理」跟著從中

調解。「既然這樣最合乎『人情』，事情就這麼辦了！」

「路是人走出來的」，這是生物性的、大自然性的、人性的。「衆志成城」，「路」是大家意見的結合，不是少數人規定的。「法」是少數人規定的，因此它不夠用。中國人說，不夠用不要緊。我們先做，你再跟著訂。等什麼事都辦好了，那時，「法」也有了，豈不是皆大歡喜?你說「民主」，這不是「民主」是什麼?當「官」無法「主」的時候，我們「民」可以幫你們的忙啊!試看這些年的「民間」外交團體，如果不是「民」在幫忙，外交到那裡去找「彈性」?

民之所好好之。「民」是對自己的安全與利益最清楚的。你讓他去赴湯蹈火，除非他認爲值得，否則他不去。你讓他不去投資，他左算右算，這「資」還是得「投」，做生意，不擔點風險還行?憑著一股衝勁，他就去了。然後，你會看情形，幫他立個法。或和對岸商量商量，互相立個法。當然，這要在「不接觸，不談判」也絕對不接受「三通」的原則之下，經過了第三國或第三者，用書面，而不是用交「談」，所以一切仍然是，早就「合法」。

中國人聰明，所以能想辦法使自己在世界上生存得漂漂亮亮又奇奇怪怪的，讓那些老外，簡直看不懂。老外做不出來的事，我們很容易就做出來了，只因爲他們比較死板，我們比較靈活。

你看老外做買賣，找零錢的時候，要從一分、一毛往上加，把錢一個一個的放在你手裡，中國人老早急死了，「三下五除二，立刻就算出來了，幹嘛這麼笨呀?!」

常有人問，你們中國究竟是要統一，還是要獨立?還是要一國兩制，還是要一國兩府?

我們說，你急什麼?到時候，你自然知道。

我們的歷史就是一系列的大創作。什麼都可以由中國人創出來，而且保證它的每一章節都是別出心裁，絕對與衆不同。

**附記：**

這篇文章於一九八九年五月卅一日剛剛在聯副發表，四天之後，天安門事件發生，使我像挨了一記悶棍，氣惱與失望、悲哀與忿怒，對那幕後的惡勢力忿怒不已，卻又敢怒而不敢言。隱忍著，勉強度過了一九八九年的炎夏。秋天，我在美國看洛磯山，想的全是中國。



# 一九八八風貌



# 四、寧要安定不要錢

一九八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聯合報引述《瞭望》雜誌海外版的報導說：「大陸當前許多城市居民的社會心態是，一方面對改革的期望過高、過急；另一方面又盼望能保持舊的生活秩序和工作方式。」

「人們還不自覺地留戀著舊秩序。」報導引用中共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社會輿論調查室的調查指出：「人們對生活保障的需求突然強烈起來。據一九八七年五月和十月兩次調查顯示，這種需求都被排在各種需求的首位。其中工人對現行制度中，最滿意的是固定工作制度——即『大鍋飯』體制的典型代表。滿意數占被調查人數的七一·七%。」

在一個習慣了低物價、低消費，一切由公家決定，自己對生活無從負責的社會，忽然面臨了大家可以自己設法賺錢改善個人的生活，卻也提高了生活費用，物價也開始波動的現象，難免使大多數不懂得自己經營生意，或不習慣處處談錢的人們感到不安。

在今天的大陸，許多已經退休的人們，過著受政府照顧的生活。夫妻二人，從工作崗位上退

下來之後，每人每月平均有二百元人民幣左右的退休金。生活雖然簡陋，晚景尚稱自在，不必憂慮衣食。但是，如果物價上漲，這點錢就不夠用了。即使新的法令允許人們各自營生，賺錢貼補，他們也不太可能讓自己臨老才去學經商，嘗試做「個體戶」以跟上時代。他們對「舊的生活秩序和工作方式」的留戀，實在是可以理解的。

大陸發展經濟過程中所出現的一些問題，在久已習慣了工商業社會怪現象的我們看來，實在不足為奇。但在他們看來，卻不但是「新聞」，而且是嚴肅的課題，要認眞地去面對並加以討論。例如：軍公教人員退休之後，能不能經商？各單位是不是應該有送往迎來的應酬？這種開支的限度應是多少？商業活動中，能不能收受「信息費」、「諮詢費」、「手續費」等等「佣金」？如何收法？「佣金」和「回扣」如何分？如何使佣金公開化等等。

由於大家不再能滿足於過去的「工資」和低水準的生活，人人也都感到有必要憑自己的力量，在固定的收入之外去賺錢。而這種賺錢的方式是否合法，以及究竟要怎麼樣去賺錢，都困擾著那些多年以來「不知錢有什麼用」的人們。

一九八八年八月，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舉行的「海峽兩岸作曲家座談會」中，有人提出音樂著作權的問題。認為一個進步的社會，應該保護「智慧財產權」，使作曲家能經由作品的發表、出版、演奏等等，獲得應有的收入。

會後，我訪問了兩位大陸的音樂家——丁善德先生和殷承宗先生。這兩位代表著大陸音樂家

老一輩和中年一代的人士，卻一致認爲，藝術的價値不該用金錢來表達，他們並不熱中「出售」音樂以獲利。他們說：

「如果不給錢就不許人演奏，豈不是限制了自己的機會？」

「能有更多的人演奏，並給更多的人聽到，才是我們的目的。」

「我們也不懂得怎樣去和商人談條件。與其爲了金錢的去浪費精神，還不如把這分精神用來作曲。」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抱持和他們同樣的想法。你不能說他們是不求進步的。因爲究竟是讓藝術的本身去直接通過大衆的取捨，還是要經過商人的經營，才有機會接近大衆，是一個値得爭議的問題。前者固然可能由於缺少推動而被淹沒；後者卻是必須先讓藝術家通過以商業利益爲取捨標準的一道窄門。西方藝術家爲了覓得一位「經紀人」的青睞，其過程也並不是很容易爲孤高的中國藝術家所樂於接受的。

大陸的民意調查，會出現七一·七%的人，情願過以前那種「不必自己經營賺錢」的日子，可能並不單純地意味著他們「甘心吃大鍋飯」；更不一定就是因爲人們保守、因循或懶惰，而是說明人們不見得都喜歡經商，也不見得人人都覺得自己工作目的是爲了賺錢。世上一定有很多人只是希望有個安定的生活，可以讓自己專心去工作，而並不想把精神用在發財致富。

對於一些問題的發生，大家所要去正視的，應該不僅是現象，而更是產生這現象的基本原

因。在對待金錢的態度方面，這世界上可能是有兩種截然不同的人。他們由於天生性向的不同，對金錢的看法也就不同，因此對同樣一種制度的反應也就兩樣。

有人是天生的「經濟動物」。他們對數字精明，有拓展的天分，懂得經營，你讓他們去過商業生活，他們會如魚得水，而不會感到痛苦和緊張。他們經商的目的也不一定是爲了要享用他們所賺的錢，許多大企業家，日常生活相當儉樸。他們只是擅長大手筆的經營。這樣的人，你如果不讓他經營，而讓他安於一個僵化的制度或主義，去過沒有作爲的生活，當然是人才的浪費。

但也另有一種人，天生不具備經營頭腦。他們對數字毫無概念，對銀錢的賠賺得失，永遠毫無興趣。他們甚至不能勉強自己去面對商場上複雜的人際關係；更沒有能力與興趣去瞭解商情。但他們淡泊的天性和與世無爭的生活態度，卻可能正是他們生存的要件，也更可能是這社會的另一種所需。這些人之中，有人是十分的誠樸老實，他們適於做基層的工作，是最不會爭權奪利的一群。他們不夠精明的天性，需要社會給他們公平的生活保障。他們也許就正是前述民意調查之中，那七一·七%，情願過以前那種「不必自己經營賺錢的日子」的一部分人。你不能把他們的「誠樸」看爲「懶惰」。這兩者是不一樣的。

另有一部分人，也屬於那七一·七%的範圍之內。他們有才華，但是天性澹泊，不喜競爭，也不擅實際事務。他們可能是藝術家、音樂家、文學家、教育家、科學家等等。如果你要勉強使他們爲了實際生活的需要而不得不去經商，或不得不爲了要把自己「打入市場」而忍受商人的支

配與剝削，甚至爲了迎合「市場」的要求而不得不降低自己專業上的成就，以博取俗衆的接納，對他們都會造成絕大的痛苦與損失。而國家和社會也將因此失去了領導精神生活的菁英。這種損失，並不能以金錢來彌補。它所損失的是遠程的收穫，和深一層的文化內涵。

一個國家，既不能缺少有形的「金錢財富」，也不能缺少無形的「精神財富」。上述這兩種性向不同的人，都應該在他們各自的道路上，得到肯定與幫助，允許他們有各展所長的可能。

一個政權，或一個制度，如果全然不鼓勵商業文化，難免導致國家與社會的貧窮。但如果只鼓勵商業文化，則會使另一大部分天性不適於經商的人，由於在創造財富方面缺乏才能而受到挫折，失去了安全感與自信心。結果會使整個社會因缺少精神內涵而風氣浮薄，甚至由於過分強調「利」的追求，而減少了人們爲國家社會犧牲奉獻的熱情與動力。

有數千年歷史文化的中國，是建立在「精神財富」與「金錢財富」兩者的互相制衡。而由於「金錢財富」的有形而易見，爲了怕民衆一味逐利而造成文化上的偏失，我國歷來的教育，總是先建立人們對「利」的戒備。從這裡過濾出應該更受保護、更受尊重，卻往往爲世俗所忽略的「精神財富」創造者，使他們成爲社會的典範，發揮在品德教育與人生態度上的領導功能。陶淵明可以說是最典型的一個例子，人們並不因爲他的「貧窮」而認爲他是「失敗者」，反而對他的人生態度表示由衷的歌頌。

我們不知道大陸的經濟改革究竟會繼續遭到多少阻力。但我們希望，當人們看到阻力的時

候，能夠體認，這些阻力的來源，既不是某些人的「反動」；也不是觀念上的「落後」與「保守」。它所反映的，只是許多在天性上不同於商業界人士的另一種更腳踏實地的生活態度。他們代表著喜歡過簡單生活，情願把主要的力量用在工作上或創作上的人們。他們也可以說是更愛自由，以至於連金錢都被他們認爲是約束與阻力的人們。

我們尊敬那些懂得經營、極會爲國家與個人創造金錢財富的人。他們給國家帶來實力，增加稅收，奠定社會大衆高水準生活的基礎。而他們的力量之值得借重，也正是因爲它可以在政府妥爲策畫與運用的情形之下，使其他大部分不會創造財富的人，也得到適當的生存保障。

我們也同樣尊敬那些不擅經營，而肯付出一己之力，從事其他工作，或發揮一己才華與特殊天賦，爲國家創造精神財富的人。他們應該有不去追逐金錢而得到政府妥善照顧，使他們能夠專心工作，並得到社會尊重的權利。

一個國家或制度，最好能兼顧到這兩種不同性向的民衆。分別發揮他們的所長，使會創造金錢財富的人，盡量去創造「金錢財富」；也能制定政策，使不會創造金錢財富的人不必憂慮生活，而專心去創造「精神財富」。不必拘於某一種主義或一味追隨某一個先進國家的制度與成規。

歷史悠久的中國，有許多很值得自豪的成就。而其中最難能可貴的一點，或許正是歷來政府與民間所共同塑造的典型人物之中，精神財富創造者的地位，始終高於金錢財富的創造者吧？

# 五、大陸的「熱門話題」

一九八八年五月廿八日，晚上八點三十分，大陸中央電視台「熱門話題」節目，主持人訪問幾位中小學老師和企業界人士，談工資和中小學「校辦工廠」的問題。

什麼叫「校辦工廠」？

很湊巧，我看到了實例。

北京海淀區西頤小學，是我三妹曾經任職教導主任的小學。她帶我去參觀，認識了這小學的校長。她們很熱心地讓我看了學生們上課的情形和「校辦工廠」，以及樓上一間空教室，租給別人辦工商管理講習班。

這是爲了響應最近倡導的「創收」（創造收入）。教師的待遇太低了。各校都在想辦法創造收入，來給老師增加一些補貼。

西頤小學的「校辦工廠」是做些鉛筆刀之類的文具批售，和爲附近「友誼賓館」的外國專家及大學或研究所複印參考資料、報告及論文等等。我參觀的時候，兩個年輕的工人正在笑瞇瞇地

工作。

電視台的訪問重點，正是有關這類「創收」的問題。

電視上應邀接受訪問的人們，有一部分贊成這個辦法。問題只是有些學校可以辦到；有些學校卻因爲沒有空間而無法辦到。也有些認爲所創造的收入並不夠多，而且這些收入還要繳稅，老師所得的錢也要繳納「獎金稅」，實在所剩無幾。更有幾位老師認爲，有許多學校是把「創收」的工作讓老師去擔任，這會剝奪老師的時間和心力，課後只顧去「創收」，而沒有時間備課和批改作業，勢將影響正常的教學。

我特別問了西頤小學的校長：「你們的校辦工廠有沒有影響老師的教學？」

西頤小學的辦法比較合理。他們是工廠歸工廠，教學歸教學。由專人負責工廠，學校從旁監督，而不必老師去兼任。工人也是從外面請來的，等於學校另外辦了一個工廠，因此不致影響教學。又因爲是小學，所以也不必有「建教合作」的實習或工讀的意思在內。

但是，校長似乎仍然擔心，目前學校的空間雖然很大，將來是不是仍有一天會發現它影響到校舍應有的空間。她不希望由於「創收」而影響到學生的福利或教學的方便。但老師工資太低的問題必須解決，因此還是相當困擾。

「政府沒錢給老師提高待遇，只得允許大家自己想辦法」。「創收」因此是在合法的範圍內斟酌進行的。

所到之處，無論是在北京，或是在北戴河這避暑休假的地方，都會遇到素不相識的年輕人，試著走來和我這「台胞」打招呼。（台胞在大陸人眼中是很容易辨認的。儘管我穿得非常樸素，卻還是會被他們一眼就認出來。因爲當地中年以上的婦女，都穿長褲，很少人穿洋裝。而她們的長褲和我們的也不一樣）。青年們來找我這位「台胞」聊天的主要目的，是想知道，究竟台灣的富裕社會是什麼樣子。人們日常生活收支的比例是怎麼樣。而他們「經濟學台灣」，所遇到的問題究竟該用什麼態度去面對。

幾乎每一個自動走來和我打招呼的人，都會從他們目前發展經濟、創造財富的現況，談到他們的憂慮——「人們收入的差距太大了！」而幾乎每一個人都提出老師們的「工資」（大陸把所有人的「薪水」都叫「工資」）來做實例——二百多元，不加獎金之類的話，只有七八十元的基本工資，怎麼能和工商界的高收入相比？「老師收入這麼低，又怎麼能得到社會的尊敬？」

我覺得，創收一定不難，老師的待遇也將會因此獲得改善。問題的重點卻是在於「尊敬」這兩個字。它比實際工資的問題更爲嚴重。

如果一個社會用來判斷某些人值不值得尊敬，是用收入的多少來做標準，那將是這社會的病態和悲哀。

一個社會是否健康，應該是看這社會對知識和品德尊敬的程度，和是不是用金錢去衡量一切。如果一個社會只知道尊敬有錢人，而不知道尊敬知識和品德，那將是一個墮落的社會。事實

上，幾乎在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國家，老師的收入都不能和工商界的收入相比。而一個進步的國家，並不會由於老師的收入低，民衆就不尊敬老師。也不會使老師們認爲他們的收入應該跟上工商界，否則就會不受尊敬。大家能建立起一種觀念，了解到，老師的工作，不同於一般的職業。他們的職責是作育英才，樹立典範，教人堅守原則。他們的價值也在這裡。所謂「尊師重道」，所尊敬的是他們的「道」，而不是他們的「錢」。如果一個人的工作目的是在賺錢，那當然不如直截了當去做生意。

我不是說，老師的收入不應該提高，而是說，人們不應該認爲老師的收入少，就不值得尊敬；或是爲了要使某人受到尊敬，就讓他多有一點錢。中國歷史上許多極受尊敬的人物都是沒錢的。這事實，值得思考。

正在一切向「錢」看的大陸民衆，是處於一種十分困擾的階段。幾十年來，他們習慣了沒有物慾的生活。大家收入都少，大家都過的是「均貧」的日子。北戴河「外國專家休養所」的一位遊覽車司機說：「以前大家都不知道錢有什麼用處。反正大家都沒錢，也就用不著比較。」同車的導遊說：「你是沒出過國，到了外面，你才會知道，人家的貧民窟比我們十八級幹部的住處還好。」司機開玩笑說：「你這是右派，十五年前有罪。這次言論最好歸台灣去審理，藉此可以『出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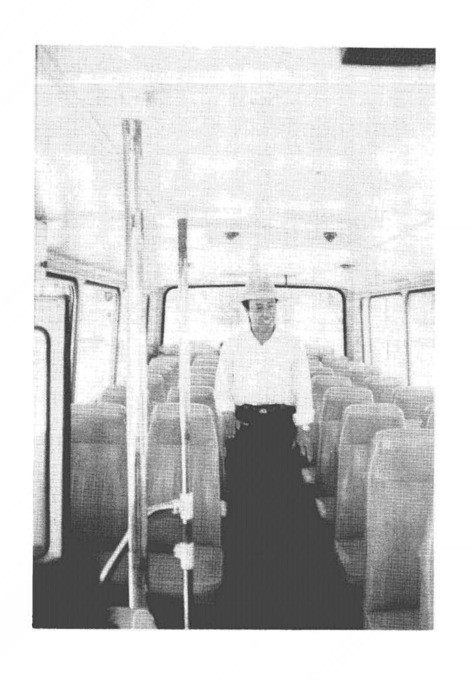
玩笑聲中，透露著人們對追求財富所產生的各種困惑。那位動作機敏、衣著時髦的年輕導遊

說：「天天奔波掙錢，反而覺得自己沒有理想與前途，不知自己爲什麼活著」。一位修水管的年輕「師傅」，一面抱怨工資低，一面卻又把自己的抱怨推翻，用反省的語氣說：「也對呀！大家應該向『前』看，而不應該向『錢』看。因爲越看越不夠呀！」

一位隨團體到北戴河休假的年輕人，起初抱怨工資低，卻又念念不忘他父親的教訓，說：「人人各有福分，羨慕人家，去圖非分之財，就該惹禍了。」最後的結論卻是：「我不想賺錢，我兒子不饒我哩，逼著我給他買汽車。我說：『誰讓爸爸沒本事呀！沒有汽車不要緊！你懶得走路，爸爸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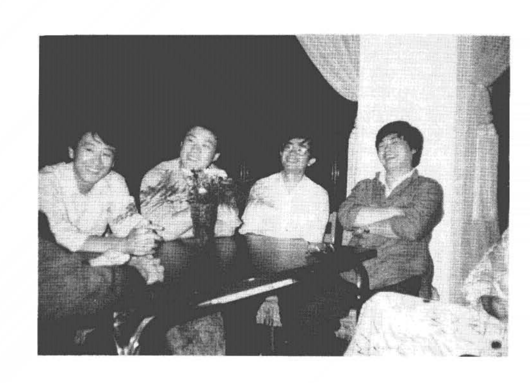
金錢帶來的困擾，在大陸同胞群中隨處可見。過去的價值標準和目前「發展經濟」的口號，發生觀念上的衝突。而他們一時又找不回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來使問題取得平衡。

我在大陸的五個星期之中，曾有十天在北戴河。在餐廳遇到幾位來自北京「航空器材研究所」的青年碩士。他們約我在招待所樓下茶座聊天。所關心的，除了台灣青年的生活，大學生的課外閱讀範圍、消閒方式，以及出國留學等等問題之外，也同樣關心金錢財富對社會所造成的種種無所適從的困惑。他們不希望再看到「均貧」的社會。但對於財富取得的方式和所帶來的影響，也是憂心忡忡。一般人那種在一切都極度貧乏的社會中，埋頭苦幹的心情，已經逐漸退卻。不擇手段追求財富的貪汙、瀆職，以及人心的變壞等等不正常的現象卻日益明顯。他們的憂慮也說明了知識分子希望對社會負責，卻又不知從何著手，正在等著一個屬於中國傳統的、固有文化



北戴河的這位遊覽車司機笑嘻嘻地把車子清理完畢，才下去吃飯，「不急，不急！」。

「列寧說，麵包是一定會有的，文革是一定不會再有的。」



這張照片，我最喜歡。

他們是幾位研究生，在北戴河度假，遇到我在那裡，就召集了一個小型座談會，談話主題：「究竟錢有沒有那麼重要？」

答：「取之有道，用之有方」可也。

的重被肯定，來做為目前問題的解藥。

一位在公家機關負責採買的年輕人，鄭重其事地向我抱怨「政府的法令不完備」。我以為是什麼大事使他無所遵循，卻原來，他的問題只是：「買東西的時候，對方商人要給我回扣，政府法律卻沒有規定可以不可以收。」

淳樸的老百姓，正在學著適應一個新來的金錢社會。惟恐自己落於人後，卻又不知怎樣才可以「合法地」跟上這前所未有的「走資」步伐。

車站的出租車，一部一部的停在那裡。這邊剛下火車的人們，在「候車站」排隊等車。酷熱的太陽直射著他們。而出租車在那邊，一動也不動。「反正幹一天和等一天是一樣的拿工資。不拉就是不拉！」

「個體戶」的出租車過來兜生意。「去嗎？一個人二十塊！」

陸續又上來了三個人。「方向差不多啦！」你的二十塊加上其他三人的每人二十塊，他這一趟是八十塊人民幣。是老師一個月的工資了。

從車站到住處，同在一個城裡，個體戶司機跑一趟，可以賺八十塊。

坐火車，從北京到北戴河，浩浩蕩蕩，五小時快速車程，票價九塊多。這票價，大眾支付得起。但外面那些各行各業「個體戶」的收入和公家的收入越來越懸殊。說不定就會影響到這低票價對大眾的優惠，使它無法繼續維持。

政府的照顧跟不上民間追求金錢的速度。而一部份私人財產的增加，卻造成了受政府照顧的人對政府的責難。民間與政府「走資」的腳步不一致，大家愛財，卻又取之無道，所以問題叢生。

一位在小學任教的老師，在送我去機場的路上問我：「你覺得孔孟老莊的思想對現代社會有什麼作用？」

我揀重點回答：「大概最有作用的是他們對『利』的戒備吧！這幾位哲人對後世中國人影響最大的也就是對『利』的淡泊和防堵，以及『安貧樂道』的榮譽感的建立。孔孟教人們對錢財『取之有道，用之有方』；老莊使人們知道一個政府應當做到『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和『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個人應該了解『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的眞理。」

古人的學說固然有許多已經不適用於現代；但仍有許多曾是使我們屹立世界數千年的基本力量。不但我們應該珍惜，全世界在面臨問題的時候，都可能要向這幾位哲人的智慧去尋求解答。

大陸正在倡導「中國式的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他們已經研究了多年，應該已經十分熟悉。問題在「中國式」這三個字。「中國式」不是憑空建立的，它的根基仍然是在古老中國的許多不朽典籍裡。只可惜，幾十年來，他們推行的是簡體字。年輕一代不認識繁體中國字。如果連三十年代的文學作品都看不懂，又用什麼去研究那些可貴的典籍呢？

# 六、咬「文」嚼「字」看大陸



北戴河附近的農村莆藍，是我妹妹隨她的丈夫做貧農，受苦受難的地方。這次她帶我去「觀光」兼「憑弔」，卻使我有機會住進北戴河的「外國專家休養所」，避開了那幾天北京高達三十八度的酷熱，也趁此看到了這「中國裡的外國」。

北戴河是很漂亮的。

一所又一所櫛比鱗次的「休養所」也整理得花木扶疏。只是那些單位門前的招牌、商店豎立的廣告牌，時常使我這過客看得目瞪口呆，不解其意。

「休養所」當初可能是指某些特殊性質的工作人員，必須按時檢查身體，休息一陣，以恢復健康。但是，當你看到「石油休養所」、「有色金屬休養所」、「華北電力休養所」之類的字樣時，不禁會引起你的疑問：「石油和電力都太累了嗎？」、「有色金屬生病了嗎？」尤其是當你看到「醫藥休養所」的時候，更會覺得奇怪，「難道說，醫藥也生病了嗎？」

其實，「休養所」就是我們這裡所說的「招待所」。供各單位員工度假之用。

當然，陪我去「休養」的妹妹並不贊成我這麼挑剔——大家都這麼用，誰不懂？說的也是。我願意放棄我的挑剔。畢竟你是好多年沒回大陸了，懂什麼？

所住的「休養所」附近有一處優美的風景區，叫「鴿子窩」。這處風景之美，果然名不虛傳。導遊手冊上特別介紹曹操爲這裡寫的一首〈觀滄海〉：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裡，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魏武的詩，氣勢雄渾，十分耐讀，可惜手冊上印的那些簡體字，使原詩古意盡失。因而使人擔心，當他們的青年有機會讀到原詩時，反而不認識那些繁體字。因此大家正在建議，書寫不妨用簡體以節省時間；印刷卻應該用繁體，才不致使大家無法閱讀圖書館中的藏書。

有許多簡體字，使你看了啼笑皆非。「北戴河」變成「北代河」，使你不知那是什麼地方。一家餐館門口，豎著一個長方形的大廣告牌，老遠就向行人顯示它的「正宗冷面」。乍看之下，使人想到那「冷面」二字是「冷面冷心」的形容詞，而且還是「正宗」的「冷面」。當然，知道的人會瞭解，它是說：「正宗的韓國冷麵（面）」。

簡體字簡到大家胡亂造字。一家商店門口寫著「小賣卩」。我問妹妹，這是什麼？她說這大概是「小賣部」。有人以爲既然可以把字簡化，何不索性多省幾筆？於是「部」，就變成了「卩




現在大概有很多人把麵粉的「麵」字，簡寫為「面」了，好不好呢？也許時間可以回答，1988年，第一次在北戴河看到這「正宗冷面」，卻是讓我想到紅樓夢，尤三姐責備柳湘蓮「想不到，你果然是冷面冷心！」而這裡的「冷面」還是「正宗」的呢！

「ㄕ」。那麼「理髮部」就是「理髮ㄕ」了。

「幼兒園」是「幼ㄦ園」。你只要想到注音符號的「ㄦ」就可以明白。可是他們又不用注音符號，而是用漢語拼音。於是你可以在「全脂奶粉」的字樣下面，看到鄭重其事另加一行Chuan Zhi Nai Fen 的拼音，不知道是怕中國人不認識中國字呢，還是怕外國人不認識？如果是爲了外國人，請問他們看了這一行拼音之後，就會知道那是什麼嗎？

中國字是一種藝術，它本身就有畫面之美，著重均衡以及整個字的組合給人的視覺反應。而簡體字中有很多帶有「厂」的字，都被挖心掏肝，以求簡化。「嚴」變成「严」，「產」變成「产」，「廠」變成「厂」。雖然看的人可以理解，但對一個字的本身來說，就失去了端莊與平衡，給人以丟盔卸甲的感覺。

在書寫的時候，固然可以節省時間，更可以用書法把它美化，而不致有太大的問題；印刷出來卻爲了刻字的時候要求其方正，而缺點畢露，更時常使人產生錯覺，以爲那是日本字。

我也相信，大多數人對簡體字並沒有什麼反感，因爲它確實節省時間。很多簡體字也早已爲大家所慣用，當然不必固執。問題似乎大部分出在印刷而不在書寫。例如「言」字旁的字，我們平常都早已寫作「讠」而並不產生問題。

但是在印刷體方面，如果也改成「讠」，就會有問題。最常見的一個「設備」的「設」字，改成簡體之後，成爲「设」。書寫的時候，並不會與「沒有」的「沒」字發生混淆；但印刷體卻

因爲字小，又沒有筆鋒的幫助，「没」字就很容易被人看成「沒」。於是，「本所『没』有理髮部、餐廳、醫療部」等等的宣傳文字，就會經常使人看成是「本所『沒』有理髮部、餐廳、醫療部」，而必須回頭重看一遍，才可以明白。

「胜利」的「胜」字，和原來的「勝」，在視覺氣勢上，不可同日而語。「勝」有「力」的支撑，「胜」卻把重點移到了旁邊的「肉」部或「月」部，而不能再在字典上屬於「力」部了。給人的感覺也好像是屬於生理上的一個字而完全失去了美感。

「山海關」三個字，本來氣勢雄偉，古意盎然。到了導遊手冊上，「關」變成了「关」。好像拆去了大門，只剩下「鎖頭」，也就無「關」可「守」了。那個孤零零的「关」字，好像剝了腳爪的螃蟹，赤裸裸、光禿禿，失去了屏障。

「關」一定要站得穩穩當當才行。把一個莊嚴的「關」字去了皮，只剩「瓤」，變成一種滑溜溜、不設防，失去保護的可憐相，眞使「天下第一『关』」失色。

如果你知道什麼是「餐斤」，什麼是「副食斤」，那你就有資格做大陸人了。附近一家市場，左邊門上大書「百貨斤」，右邊門上大書「副食斤」。

其實「斤」乃是簡體字的「厅」（廳）。卻因爲這門上所寫的是美術字，把應該有筆鋒而顯得柔和的地方都硬化了。「厅」本是「厂」裡面加了一個「丁」字，如果是書寫，可能很容易分辨。但寫成美術字，則斜、垂、撇、鈎，都成直角與方形。爲了把字體圖案化，更免去了那

「丁」字下面的一鈎。於是就變成直楞楞的一個「斤」字。實在糟蹋了中國字。

其實，大陸各處名勝古蹟遺留的前人題字及匾額，觸目皆是。即使一個平凡的亭子或不起眼的小廟，都會有字跡蒼勁、古意盎然的匾額或對聯，襯以黑底金字，眞是典雅莊嚴，多少優美的文化都蘊含在這些觸目皆是的字跡之中。

北方社會流傳一句形容暴發戶沒文化的話，說是「樹小房新字不古」。「樹小」表示房子剛蓋好，沒來得及讓樹木長大。「房新」表示剛剛有錢，不是有根基的老家庭。而最重要的重點在於「字不古」。一切的對聯、匾額與題字，如缺乏古老蒼勁之美，都說明這家住戶沒唸過多少書，缺乏傳統文化的薰陶。

中國大陸幸而擁有極其壯觀的大樹和古字，到處都可看到古代帝王、書法名家以及詩人、文人、名臣、名將的題字、對聯、匾額或碑碣。中國人對「字」的欣賞深度，在全世界獨一無二。如果繼續聽任後代胡亂施爲，那就太對不起祖先了。



# 我是歸人



# 七、四十年來家國

四十年闊別故土，一九八六年才在海外見到了在北京做小學教導主任的三妹，和在昆明做機床廠副廠長的小弟。知道他們都已從苦難中掙扎過來，而且在工作上表現卓越。也知道家族中其他人都能奮勉自強，雖然現值二億人民幣的老家祖產已經蕩然無存，但一家長幼都已各自從零開始，再度出發，痛惜的心情也化作了悲壯的力量。

從弟弟妹妹口中，和他們所保存的父親手書裡，得知一生獻身工業的父親去世前的淒涼景況，而那年——一九七二年，卻正是我應邀赴美，暢遊歐洲回國之後的第二個年頭。初聞這個消息，我曾是非常痛悔與愧疚。深責自己爲什麼不曾藉出國的機會，及時寫封信去請安問候。直到弟弟妹妹告訴我，那時正是文革如火如荼，父親非常擔心會收到我的信，給他增加有家屬在台灣的罪名。曾一再地說，如果我寫信去，他將把信原封不動地交給公安局，連拆也不敢拆，這才略微減輕了我痛悔的心情。但想到，以父親瀟灑的個性，竟被逼得如此緊張，他給弟弟妹妹的信

上，字裡行間，全是為了應付檢查而造作的詞令，使我深感文革暴政對人心所造成的殘害與荼毒。此番「探親」，不但無法補贖我對父親未盡一分孝道的愧疚與自責，就連好好找個墓地為父親骨灰安葬的願望，也無法達成。老家偌大的墓園，早已歸公，讓父親與母親合葬的精神安慰也已不切實際。做為一個最受疼愛的長女，當長跪在父親骨灰盒前，匍匐請罪的那一刻，可以說是人間最慟的一刻。但又何濟於事？四十年遠離膝下，如今說什麼也無法使自己心安；無論你流多少眼淚，或在父親靈前洒下他生前多麼心愛的酒，也仍然是：「一滴何曾到九泉」，人天永隔只能說是生為這一代中國人的悲哀了。

出發前的心情十分奇特。那是一種把一生的感情都壓縮成一片空白的心情，既不是興奮，也沒有悲傷；既不是緊張，也不是平靜。它只是一分無聲的靜止。行前連一封信也沒寫給住在北京的三妹。我好像不希望任何人期待我去，也不希望自己太熱切地準備見到任何人。似乎我只是想把一切可能有的心情都摒除在外，好盡量留下所有的空間，去準備容納一萬種即將湧至的感情與激動。這心情，從來沒有一個時代曾經給過我們。也沒有任何地方可以找到前人對這種心情的描述。我只覺得自己迷失在一片感情的汪洋，周圍天風海雨，使我茫然不知所之。卻又有一個堅決的自己，在那裡等待與承受。

我的心和我的手都很空。搭機前往的心情比做觀光客還更平常。新航飛機上的五六小時，也不使我覺得是在飛赴闊別的家鄉。機長報告我們飛臨越南，飛過南中國海等等行程時，也未引起

我的興奮。

直到我們進入上海上空，同座的一位新加坡小姐推推我說：「你看，上海郊區灰濛濛，房屋這麼多，綠地這麼少，人們怎麼生活呢？」

四十年前的四月，我從北方隻身乘輪船抵達上海，用茫然的心情看過了聞名已久的黃浦江，住過揚子飯店。那是我流浪歲月的開始，迷惘的心情，和今天截然兩樣。今天，我降落在上海機場，覺得自己出奇的清醒。完全摒除了感情之後，所有的感覺都十分透明。第一眼看見的，第一個反應卻是：機場的空橋好髒，怎麼那麼多的油汙！

出了空橋，左手邊站著兩個「解放軍」，綠制服、紅領章，反映在我這只在電影上看過「解放軍」的人的心上，是悚然一驚——他們來做什麼？

這一驚，就是我踏上大陸國土之後的第一次屬於感情的反應了。然後，我接下來的反應是：「這孩子好瘦！」

上海機場過境室空空蕩蕩。一股有人很久沒洗澡，也沒換衣服的氣味，瀰漫在空間裡。清清淡淡的午後光線，從大而薄的玻璃窗照進來，菜綠色的橡膠地毯也有欠營養。有一架電視機在播著電視劇，兩個穿制服的人在那裡聚精會神地看。那邊免稅商店櫃台鎖著，店員不在，看來也沒有什麼東西可買。近處有個大大的標示牌，黃底黑字，猜了半天，那「餐廳」兩個簡體字，總以為是「多斤」。這邊寫著「問訊」的小櫃台，躲在通道牆角。一個女孩，露著半個頭頂，縮在椅



1988年5月，我從台北轉新加坡，領到「台胞證」，經上海飛抵北京。

我是歸人，也是過客，夕陽把我這旅人的頭髮染上一片金黃。

這是天安門，那時還沒有「六四」，淳樸清爽之美，頗有社會主義好的一面，令人難忘。

子上打電話，空曠無生命的免稅商店那邊，卻播著熱門音樂。

這上海，就是以前和以後，「**迎我西來送我行**」的一個「點」了。它連「**客舍青青柳色新**」的畫意都沒有。更遑論灞橋折柳的詩情？當年，我孤零零地走；今天，沒想到我還是孤零零地來，心情上涼涼地。

一個多小時以後，再經過空橋入口登機時，又看見那個穿綠制服的瘦小青年。我對他笑笑，他也靦覥地對我笑笑，卻使我驀地湧上來滿眼的淚。扭頭快步走上了飛機。

北京上空，看過去，很顯然是比上海得寵多了。極目無邊的綠，是田地，是原野，是樹林，是城裡，是郊區。著意綠化過的、大範圍的北京，不再是記憶中灰濛濛的古城。誰說不是事在人爲？你在這裡花了力量，這裡就有你力量的痕跡。只看你著重的是什麼地方。

因爲是到了新加坡之後，才給妹妹的孩子上班的地方打電話，打了電話也不知道她能給我做怎麼樣的安排。爲了萬全起見，我訂了三天北京的旅館。

三妹帶了她一家人來接我，聽說我訂了旅館，十分生氣。說她自從聽說這邊開放探親之後，就粉刷打掃房子，準備床鋪，我怎能去住旅館？而且旅館又那麼偏遠，那麼貴！

在海外訂旅館是先交了錢的。退房既不可能，索性請她跟我一起「住個夠本」。

於是，這頭三天的故土之旅，竟然是做了三天觀光客。連這三天的生活內容也只得因爲要遷

就公車的路線，而到了天壇、太廟與前門大街等等我以前看過多少次，並不準備這次再看的地方。所不同的是，這次是和與我最有默契的三妹在一起。我一切聽她，她一切聽我，我們擠北京最可怕（可能是全世界最可怕）的公車，在塵土飛揚，揮汗如雨中擠去擠來，又走那麼多的路。我無怨，她也無怨。我說不累，她也說不累。然後我們共同享受旅館裡那無人干擾的三天，重溫一年前我們在洛杉磯，四十年前我們在天津，那談笑忘憂的時刻。

我們沒有如一般人那樣的抱頭痛哭。她說，那糟蹋時間，我也這麼說。我們要把每一分秒的時間灌滿了終於又相見的快樂。我們已經浪費了四十年，誰也不知道誰的下落，天各一方地奮力讓自己活著，爲的是仍能有這樣的一天，讓我們重新攜手，從四十年前分散的那一點上起步。讓過去的四十年成爲一夢，成爲生命中的一次「號外」。不讓它妨礙我們當年那年輕生命所應該有的正常腳步。讓我們毫無理由地堅信——四十年，沒有什麼，我們都可以忘記；中斷的，都可以重續。讓我們只要想忘記歲月的刻痕，就可以忘記；只要想回到年輕，就可以回到年輕。讓我們還是當年那未曾被現實鞭打過的孩子，在同一溫暖家庭的呵護下，無論日子過得是豐是儉，爲了孝順父母，爲了互相照顧，都可以有歌聲幫我們忘憂；都可以有友愛幫我們驅寒和醫病。我們唱所有會唱的歌，讓歌聲幫我們找回歲月，重新走那生命中最可貴的一段行程；幫我們就這樣越過這四十年史無前例的悽傷——那是一夢。我們今天都還健在，我們有權重新走過這一程，不再走那一條通往哀傷的歧路。

我們這樣感覺，我們這樣相信。

擠公車算什麼?又不是沒擠過!

觀光旅館的豪華，應當是努力過的人們，今後都可享有的權利。而三天之後，正式回到三妹辛苦爭取來的五樓住處，告訴我的是，你只不過是回到了從前。

這三妹的住處，面向陽台的一間，大概有六坪吧?容納了一張雙人床，兩只沙發，一個茶几，一個被電視機佔滿了的書桌，一個衣櫥。晚上，再搭一張行軍床，就是容納我們兩個和從南京趕來的小妹的空間了。

昆明的小弟是接到電報之後，坐飛機趕來的。他住另一間，和三妹的兒子去擠。

窄小的空間，不便的起居，都不妨礙我們相聚的快樂。小小的陽台，曬上我們自己洗的衣服，北京乾爽的天氣，一下子就乾了。大家的衣服輪流曬，用不著洗衣機與烘乾機。入晚陽台上很風涼，敞著門睡。熱的時候，有扇子可以搧。八年抗戰，我們在天津，可不也是這麼生活?不要想到彼此臉上歲月的刻痕，不要記著心上和身上的創痛。三妹說：「讓我們把農村與牛棚，把知識分子當年所受的侮辱與殘害，都當成一本書。記著它，但不要讓自己在心情上回到那年月。」讓我們希望，中國人已經醒過來，不再捲入那瘋狂。

這住處，內容雖然有待進步，從外觀看卻是房高樹大。紅磚外牆的公寓，襯著綠意盎然的樹群，題名「柳蔭園」，旁邊有齊白石墓。

海淀區，是北京的文教區。北大、清華、中央科學院、圖書館、友誼賓館，都在這裡，文教區的吸力不是在於你可以就近參觀這些地方；而是在於它所形成的氣氛。你隨處可以看到三三兩兩的學生或中外學者，在高大的行道樹下緩緩踱步。在這裡叫不到計程車，買不到東西的種種不便，也就因爲這由於是文教區而形成的樸實氣氛，產生了一種平衡。

三妹每天上上下下爬五樓，拿糧票去買糧食，打公用電話、接信、寄信、爲我接洽出租車、託人買火車票，種種大小事，都要上下五層樓。而每當我要表示心疼，她就引經據典：「斯是陋室，唯吾德馨……孔子云，何陋之有？」說：「你到城裡去看看，就知道我這陋室，比別人住的大雜院可好得多啦！」

# 八、故土夢重歸

我沒去看北京「城裡的大雜院」。

我急於去看的是天津。

未曾重履天津以前，我一直是「河北省寧河縣蘆台鎮人」。我出生在蘆台，長大在塘沽。這兩個地方，過去都屬寧河縣。我一直以爲，天津只是我唸書的地方；抗戰期間，受苦受難的地方；勝利之後，失望灰心的地方。它寫的只是十二歲到廿九歲的我。

而這次，我重履斯土，卻發現，蘆台和塘沽都已鄭重其事地劃入了天津市。我也才發現，在心情上，我是如此的屬於天津。當我在與它闊別四十年之後，再次由北京坐火車抵達「天津北站」——我少年時，每個春假、暑假和寒假，都從這裡回家與回來的車站，記錄著父親的慈愛和我的成長的車站，啊！它竟然還是和以前一樣的小巧精緻又方便！使我立刻投入了「時光隧道」，回到了從前。摒除了出站時，因爲車站附近整修而變窄了的道路所帶給我的嘈雜與迷惑，

當我居然就在一拐彎的地方，叫到了一部出租車，聽到那司機一口天津話：「上那兒去？大姑？」的時候，我就立刻「找回了自己」，找回了那個名叫靳佩芬的、從塘沽久大精鹽工廠，父親的辦公室出發，來到這裡上學的那個得寵的女孩。我恍然明白，我實際上等於是個天津人。這裡，記錄著我最繁華的青春。

我如此熟悉這地方！上車走大經路，旁邊首先出現的是律緯路，再一條顯眼的大路是黃緯路。「啊！先別去找旅館，前面往右轉，我的母校在天緯路！我四十年沒回來啦！我要去看看！」

司機和我一樣的興奮：「你從台灣來呀？台灣很好呀？」他高高興興地把車開到天緯路——「就是這個門！」

門上已不是「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師範部、中學部」的字樣，它是「天津美術學院」。沒關係！習慣了一生的人海滄桑，接受過各式各樣你所願意或不願意的變遷。我們這一代，早已把一切的「變」看成了常態。而無論那一種的「變」，在我們這些人的心中，都永遠存在著一個永恆不變的記憶，一個永遠鮮活的生命歷程。我們曾從某一個點、某一條線、某一個面走過、停佇過、徘徊過。那一點、那一線、那一面，就會永遠在心中停格，變成不朽。「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師範部、中學部」，那匾額在我心中生存著，現在的「天津美術學院」，就立刻和我的記憶重疊起來，合而爲一。它，依然是我那寫滿青春與活力，夢想與愛的學校。

我往裡走，對面是當年我們親眼看著它蓋起來的「學院大樓」。右邊是體育館，左邊是圖書館。中間是「大院」，種著花木。小路兩旁還是同樣的傘狀的小白燈，丁善德和勞景賢兩位音樂老師那明明滅滅的香煙星火，曾在這裡閃爍。曹禺曾到這裡來上課，李霽野那時還沒譯出《簡愛》，我們在看的是《孤女飄零記》，同一本小說的另一譯名，譯者是誰卻未曾注意。

我往右拐，通過那條小彎路，就可以到達食堂。那每年冬天氤氳著火鍋味，夏天有我極力逃避的炸醬麵，使我非常想家的地方。

一位身材健壯的中年人，從後面叫住我，笑容可掬地問：「請問你找誰？」

「我呀？抗戰以前和以後，我是這裡的學生。我是師範部畢業的。抗戰勝利之後，我在音樂系唸了一學期，然後，我去了台灣。」

他感染到我的興奮，立刻表示歡迎：「校友回來了，我要帶你去看看。」

我快步往右走，反客爲主地向他介紹，「這是食堂，我小時候最怕進來，又不得不進來的地方。它不是溫馨，而是——溫暖。」

現在，這食堂變成了美術學院的展覽館。裡面正在展出應屆畢業生的各種作品。

從食堂再往右走，當年的宿舍已經不屬於現在學校的範圍。從體育館背後繞過來，再右邊，就是音樂館了。

音樂館變成了現在的招待所。

不知是他陪著我，還是我帶著他。這位自我介紹，是教美術的黃老師的中年人，倒比我還更加上一臉的迷惑，彷彿在極力想要弄明白，我，這來自台灣的陌生客，是從怎樣的一種時光隧道裡走過來，所指認的每一個地方都對，卻又都不對。

沒有關係。音樂館是你多年來的未醒之夢。今天，你又夢遊到此。你將被允許住進去，兩個白天，兩個夜晚，讓你去浸沉在那並不曾改變的，四十年前的、五十年前的音樂聲裡。而你，你還是當年那個十八歲、二十八歲，最有權作夢的你。

黃老師帶我到圖書館。圖書館已經變成辦公大樓，迎門卻是兩個大字——「廁所」。奇特的感覺，是每一個夢遊的人所一定會有的，夢；有時是不合邏輯的；但它眞好，飄忽虛渺的那麼一種美。就因爲它不合邏輯，所以才這麼美。

黃老師和其中另一位女老師熱心地商量，請我一定要來住住這邊的招待所。

我答應兩天之後來此地尋找我今生不可能再去完成的夢。

別離了好熟悉又好陌生的校園，回到自我介紹名叫「藍吉普」的計程車，他主動帶著我，直放「利順德」。

他怎麼知道我應該住「利順德」呢？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在夢遊。

我沒有意志。

我沒有一點決定力。

可是我知道「藍吉普」是對的。我該去住「利順德」。那是當年在英租界很典雅的一家大旅館，一九〇〇年就有它了。英租界的建設不僅是「英國」，而且是如今的「世界」。那個國家是很奇特的。它善於經營與規劃，格調極高。當年，它到處去侵略與佔領，使自己成了一個「日不落國」。把他們經營與規劃的天份也就散佈到了整個的地球。連古老陳舊的中國，也被迫加入了他們的呼吸。英租界，使中國人在國恥與榮耀之間矛盾不已。

那不是「崇洋」二字所可涵蓋；你也不能因此就說人們忘記了「國恥」。它時間越久，越成了「恥辱中的收穫」。不說那戰時發揮的「掩護作用」；就單說它多年來，所提供給中國人種種層面的「示範」，就已爲古老的中國注入了新血。何況如今！

如今，英租界早已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被我們的敵人——日本所收回——唉！你能想像到日本人收回英租界的事嗎？許多事，是很有「定數」的。你在這邊欠了我們，你會在冥冥中的另一邊來償還。日本人！在做了那麼多壞事的同時，你總得做些好事。

當然，日本人以爲他是可以永遠佔領中國的，所以要把英租界一起佔領。他沒想到最後是連英租界和其他中國國土一起還給中國。他沒想到，可是老天爺是想到了的。

現在，英租界所有的路名都變了中國的，達文波道？狄更生道？三十二號路？英中街？它們

是今天的大沽路、南京路、台兒莊路、解放路、泰安道，……你要從方向和位置去認路，而不能倚靠路名。英租界的老式小洋房還在，你只是覺得它們比你記憶中的變小了。

帶著英租界種種的記憶：「謀得利琴行」、「羅辦臣琴行」、「永興洋紙行」、「歐洲鞋店」、「起士林」、「大光明戲院」……它們是我年輕歲月的許多點，這些點，記載著一份靜謐與華麗。但好像其他的「點」都流失了，只有大光明電影院在我的眼前喚醒我。啊！英租界，對我來說，是聽音樂的地方，談音樂的地方，認識音樂界朋友的地方，以及在戰時貧困的生活中，在這附近散步，也能找到心靈的提升的地方。

我撥開了生命中那最值得我翻開的一頁，暫時，先把夢遊者的感情投注在眼前的海河。

司機「藍吉普」停下車來，「利順德」就在這裡了。

就這樣，我投入了闊別四十年的天津市。

「藍吉普」是一個什麼樣的使者呢？他怎麼會幫我做到我已想不起來要做的事呢？

夢遊者有一種權利，這是上帝賦予的。祂讓夢遊者不必使用他自已的意志力與判斷力，而卻可以走得正確又安全。祂讓這夢遊者全憑下意識和環境的導引，而能夠看到他所要看的，去到他所要去的，找到他所要找的，得到他所應得的。

我的房間，五五六號，面對著海河。

你相信不相信？這海河的這一段，正是當年我搭和順輪啓程，獨自飄離大陸，來到台灣的碼

頭一帶。而現在，碼頭已經搬去新港，海河這一帶長達數里的河岸，已經建成了一條綿延不斷的帶狀公園，一路是亭台樹木與繁花。海河沿著欄杆所形成的豎條形的邊。人們在這裡散步、閒眺、游泳、釣魚。

我沉沉入夢，好夢正酣。我用夢遊者的心情，在這裡踱過兩個清晨、兩個白日、兩個黃昏、兩個夜晚。

# 九、為何不回家？



來到天津，我和兩個妹妹，一個弟弟，立刻去看多年不見的二弟。不但是我，同樣都住在大陸各地的弟弟妹妹，也和他多年不見了。

他住在「南開區」。

一路想的都是他「小時候」。

他是個幽默的男孩。一天到晚，笑話連篇。輕鬆的個性，使他從小就「與世無爭」。家庭情況好的時候，他功課也好；家庭情況差的時候，他唸最爛的學校，功課就差。他不計較父母兄姐對他的要求或批評。快快樂樂地我行我素。他喜歡做使別人覺得光榮與快樂的事。如果由於他的功課成績不好而顯得大哥或二姐更加得寵，那就也是他的快樂。他這種個性有時會使自己被人忽略，因爲他對一切都無所求，別人就不必覺得他也應該得到應有的關心與照顧。所以在我們所有兄弟姊妹中，只有他是「最不明顯的一個存在」。我們甚至都不記得他曾經哭鬧或生病過。在我的記憶中，是直到他忽然以令我十分驚奇的姿態，從最爛的中學考進第一流的大學，而他的英文

會話足以和學校的外籍神父無話不談；他在進入機械系以前，還自修了德文。在抗日時的淪陷區上中學，所學的日文也足以致用。那時，我才對這二弟刮目相看。而當時我的感覺卻是——忽然不大認識他了。

和他分手，正是在這段時候。誰也未曾留意，他是怎樣的掙脫了戰亂給他少年時代的摧殘與枷鎖。他自己決定從私立工商學院的機械系轉入國立工業大學的電機系，成爲一個很活躍的學生。他的俄文也必然是在那段時間學成的。

「他會五種語言，是蘇聯專家特別培植的一位工程師。反蘇的時候，他因病失去了工作，直到如今。」

當他的女兒以讚美又遺憾的語氣，這樣告訴我的時候，已經是四十年後的今天。二弟前途急轉直下的時候，他這女兒還未讀小學，弟媳沒念過多少書，誰也無法詳細告訴我當時的情形，我就在一片茫然中見到了闊別大半生的二弟。

這當年的大二學生，如今六十二歲，垂垂老矣。

這「與世無爭」的二弟，如今更是只得「與世無爭」了。

當他出現在我眼前時，長髮蓬亂，面色黝黑。一八〇左右的身材，瘦伶伶地，撐著寬大不合身的藍布衣褲。

他伸出手來和我這四十年不見的大姐握手。我看不出他那雙深陷的黑黑的眼睛裡，所流露的

是喜悅還是悲哀。他重重地握手，然後淡淡地走開。口中說：「我去那邊走走，你們先上樓。」

我以為他是去買菜，準備招待我們。

弟媳卻知道，他只是「出去走走」。

「多年來，他一直是這樣尋尋覓覓。沒有了工作之後，他整個人都變了。誰也不知道他出去找的是什麼。」

弟媳的表達能力有限。但從這一兩句話，也已道出了失業三十年的二弟，滿腹經綸的二弟，是怎樣度過他的每一天、每一天無望的日子。

我們坐在他三樓的房間裡等。這有廚有廁、有暖氣的住宅，是地震把舊屋震毀之後，分配到的。條件已經是很不錯的了。但它無法醫治二弟內心的失落。我們聚在這兩個房間中的一間，有一大一小兩張床鋪，一個飯桌，一個書桌，一張長沙發，幾把椅子。我坐在長沙發上，看見旁邊有一本厚厚的俄文辭典，破舊不堪，書背用大針和破布縫著，一望而知，是二弟自己的手筆，說明這失業三十年的人還在唸書。

我們等了一個多鐘頭，二弟居然還沒有回來。

是因為自己的落魄，而不願見我們嗎？

是精神上有問題嗎？

這快樂善良的二弟是怎麼了？

弟媳只顧絮絮地說著他們生活的苦況，責怪二弟不體貼她。眼看晚飯的時間快要到了，我們人多，不能留在這裡吃飯，決定今天先回旅館，明天再來。

就在我們剛要踏上巷口公共汽車的時候，二弟回來了。

幸虧我們沒走，否則他一定非常失望，他手中提著一包花生米。

「我到那邊去靜一靜。」二弟向我們解釋，淡淡的語氣，好像這根本不值得驚奇，他只是要「去那邊靜一靜」。但我卻非常了解，我們的突然出現，是何等地使他震驚。

再度回到他的家，氣氛輕鬆熱鬧起來。大家這也才有心情打開帶來的飲料、啤酒與零食。二弟不但有新買的花生，把他自己抽屜裡舊存的也翻出來，請大家分享。我們從來不知道二弟是這麼會招待人的。他不斷地讓每一個人吃這喝那，連他的妻子兒女及孫輩也不冷落。我們把大家小時候的趣事，一樣一樣地從記憶底層翻出來，彼此敘述著、笑著，忘記眼前這六十二歲的老人爲什麼如此地頭髮蓬亂，衣衫不整；忘記一生的折磨與殘害；忘記大半世紀以來，中國人的生途爲什麼是如此地崎嶇險阻又悲哀。我們要抓緊的彷彿只是這一刻。這一生都將過盡之前，夢一般的重聚。妄想它是一個不會消失的永恆。讓我們不去想到再分手，也不去想到夢醒後的幻滅。我們但願仍是蘆溝橋事變之前的那一群無憂無慮的小孩，親愛的手足之情不曾被任何的戰火所摧殘。讓我們依舊是當年父母都還健在時的那一群得寵的小孩。我們有圍著圓桌吃飯，圍著火爐談天，攜手在窗前唱歌的歲月。讓我們眼前的零食和酒，仍然是往昔每次過年時的零食和酒，苦日子也

會被親情友愛所點亮的那放懷的談笑與吃喝。

「二弟，你記不記得每年過年，你最喜歡偷吃爺爺供桌上的點心？而你說，『只要給爺爺的遺像鞠一個躬，爺爺就答應了』？」

二弟溫和地笑著，他當然記得。

他也記得小時候聽我和大弟討論小說《鏡花緣》，把裡面一段君子國咬文嚼字的笑話拿來背誦：

「酒價賤之，醋價貴之，其所分之，在其味之……」而二弟只偏愛這段每句一個「之」字的笑話最後一句，「跑之跑之，看你怎麼了之。」每當他和大弟打鬧，敗陣的時候，二弟就落荒而逃，一面笑，一面有腔有調地大聲唸著：「跑之，跑之，看你怎麼了之。」

他也記得十二歲那年冬天穿著棉袍到「下瓦房」去買「夜壺」的笑話。為了怕被人看見沒面子，把「夜壺」藏在棉袍大襟底下，在路上被警察盤問，卻發現原來如此，把警察逗得大笑的事。

還記得小時候貪玩，晚飯遲到，反而跟父母開玩笑說：「你們好大膽，居然不等我！」的事。

我們每個人都在這些記憶的重現之中，回到了童年與少年。

二弟！你還是以前的那個與世無爭的小孩！讓我們相信你還是！我們也還是以前的我們。大

家都沒有經過這漫長的、詭譎的大半生。讓我們今天的相聚就在這裡成爲一個永恆。

我要不再讓二弟尋尋覓覓，我要給他一個「定點」。

「二弟！你這俄文辭典都破了，我給你買本新的好不好？」

二弟珍惜地翻看他一生的「學問」，輕描淡寫地說：

「你給我買本牛津辭典吧！我需要再溫習一下英文。」

我答應著，不但要給他買牛津辭典，還要給他買一架英文打字機，使他腦和手都能有事可做。

「一邊打字一邊唸書，最快樂不過。」我建議著。

二弟欣然同意。

有了許諾，給了他希望，我們可以告辭走了。次日清晨，這是我的第一件事。

我先向旅館職員打聽好了何處可以買到英文辭典和打字機。感謝天津這商業都市，過去的餘蔭猶存。而且各商家大清早就開門營業。也慶幸我自己對天津的熟悉程度未減。出了旅館大門，往北步行，記憶中的路名雖然改變，方向卻清晰如故。不必別人指引，直接找到了要找的地方——這邊是父親當年辦公的久大精鹽總公司；那邊是我寫入小說的國民飯店；在桂順齋的老地方買幾塊北方最普遍的「槽子糕」，站在店舖裡，和自己帶的蘋果一起吃，就簡簡單單地解決了早點。再走不遠，就是勸業場。它的右側有外文書店，斜對面有打字機行。如此順利，我不覺得意

外。因為，因為，它本來就應當如此。

我們四人，我，來自台灣；三妹，來自北京；四妹，來自南京；小弟，來自昆明。在打字機行各自打開皮包，湊上五百五十元人民幣，買下那架嶄新的、義大利製的英文打字機。然後，我們四人聯袂奔赴南開區，把它送給在天津落戶的，會五國語言的，被認為最優秀，卻失業三十年的電機工程師——二弟。

我們這五個，小時候親愛的兄弟姐妹，長大後天南地北，如今白髮蒼顏，卻仍然童心未滅，親情依舊。總算總算，有這麼一天，聚齊了。

二弟接過那包裝得工整嚴密的、全新的打字機，細心地打開。那金紅色的打字機，一定點亮了他的心情。他試試鍵盤，滿意地說：

「這回我可闊了！」

他把牛津辭典放在破舊的俄文辭典旁邊。我逗他說：

「以後你可以做『個體戶』，給人代打文件賺錢。」

二弟換上我給買的內衣和襯衫，四妹給買的西裝。找出梳子，把頭髮梳了又梳，在鏡子前面照了又照。然後說：「走！我們照相去！」

二弟一定曾經非常瀟灑過。他寬寬的、飽滿的額頭，應該是越老越顯出智慧。老家「靳鄉善堂」的傳統，他一定是很有欣賞力的。

他帶著我們往外走，照相要找風景好的地方。

柳樹蔭下，百花叢前，公園裡，我們隨著二弟轉。他走，我們就走；他停，我們就停。

「這兒好，這兒好，這兒有樹風景好。」

二弟說話還是那麼合轍押韵，出口成「歌」。

照完了相，他的三兒三女湊錢，堅決請我們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飯。

臨別我問二弟：

「弟妹說你天天都出去亂走，不回家。你去做什麼呢？」

二弟的回答仍然輕描淡寫：

「我是去找靳佩芬呀！她爲什麼出去那麼久都不回家呢？」

……

# 十、坎坷歲月，一世浮沉

和弟弟妹妹一起重訪天津，時間短，行程緊鑼密鼓。我一心想多駐足看看這久別的第二故鄉，卻因時間限制而顯得匆匆忙忙。

弟弟妹妹總提議要坐公共汽車。我卻為了要看得清楚一點而情願走路。頭一天從南開區看二弟回來，沒吃晚飯，夏天午後，顯得日子很長。郊區公車一進市區，到了熟悉的牆子河，我就堅持下來走路。我知道這條路怎麼走。從前，我帶學生去廣播電台，從特一區走到南市，就是經過這一帶。這已經快到我們的住處了。從前沒有這些公車，我們都是走路。

三妹、四妹和小弟，當年都是我帶大的。一向對我百依百順。我說什麼，他們做什麼，從不違抗。

我們在夕陽下走著。

天津這一帶的街道比台北寬。洋味十足。沿途居然還是可以看到有些人家的保母帶著小孩出

來散步。中國小孩，圓圓的臉，不像受了西方影響的我們這裡，嬰兒們都因爲趴著睡，而變成窄長的臉型。大陸的小孩還是傳統的睡法，仰著睡，臉不會變窄。所以個個是小圓臉，笑意盎然，特別好玩。

我沿著記憶中熟悉的路走，路名全改了，沒有關係！我完全知道英租界這一帶的路。

一路上，三妹說過兩次：「先找地方吃飯吧！」

我沒把她的話放在心上，「急什麼？我又不餓！」

我沒想到這趟路並不似我想像的那麼近。

不知是因爲記憶錯誤，還是因爲我自己多年不走遠路，已經不習慣這距離，走了半個多小時，還沒有到我們要去的地方。

天還沒黑，可是已經八點多了。

當我終於明白，儘管我不餓，弟弟妹妹也該吃晚飯了，這才提議找地方吃飯。可沒想到，我已經晚了。

原來這裡的餐館過了中午一點半，下午八點，是一律打烊關門的。這裡不是台北。

這我才恐慌起來，不敢再自作主張。逞能多走路的結果是沒地方吃晚飯，豈不害己害人？

這也才知道，自己這「外地人」，不能不虛心聽從「當地人」的建議。

「三妹，怎麼辦？」

三妹一向不敢反駁我，儘管我爲自己的有欠考慮而十分歉疚，她也仍然一切包容。

「找找看吧！也許有個體戶。」

現在比以前好些了，有「個體戶」可以「救急」。

我們又走了一陣。這一陣，顯得好長。我這才感到是應該累了。好不容易在大路的右邊，看見了「馬場道」，這路名居然沒改。路角上，有一家開著門的小小餐館。我們趕緊走過去，看見門口豎著的廣告牌子上，寫著「紅燒魚、醬燒茄子、辣子炒肉」等北方菜。心中竊喜——總算找對地方了。個體戶餐館貴一點，又有什麼關係？

興沖沖地走進去，繞過一地要洗的鍋碗，走到裡面一張圓桌坐下，向堂倌點「紅燒魚」。

「沒有了！」

「醬燒茄子？」

「沒有了！」

「那你們還有什麼？」

「只有包子。」

「有沒有湯？」

「有酸辣湯。」

「有沒有青菜豆腐湯？」

「只有酸辣湯。」

我們無奈，那就吃包子和酸辣湯吧！

「包子要幾斤？」

我目瞪口呆。包子怎麼論斤？

三妹內行，不知她點的是「幾斤」，反正很快地，包子就上來了。一大盤，拿起一個來，咬了一口，涼的。

酸辣湯也上來了，一大碗。舀了一勺來嚐嚐，也是涼的。

我很餓，而且對這「自己的家鄉」，也是存心原諒——「有什麼關係？涼的也一樣吃呀？何況是夏天，要那麼燙做什麼？」

我很「負責地」吃了五個包子。湯可以不吃，沒關係！吃完之後，才發現，弟弟妹妹都不如我胃口好。有人只吃兩個，有人只吃三個。一大盤涼包子剩在那裡。正在不知如何是好，餐館老闆倒是很通達的：「你們叫多了，可以退。」

帶幾個回旅館去吧！萬一半夜餓了呢？

三妹勉強用自己帶的油紙，包了幾個包子帶著。走出飯館之後，她才說：「我們都不敢吃，你怎麼吃那麼多？」

誰知道？也許我這台北人習慣了一年到頭在外面吃東西，反而對口味與衛生條件都沒有那麼

多的警覺。我以爲「大陸同胞」應該是比我們更不挑剔的。絕沒想到居然是他們自己不敢吃，我反而最無所謂。也許是因爲我到處旅行慣了。做爲一個旅客，當然是隨遇而安的時候居多，一切由不得你自己主張，只好隨緣。

在回旅館的路上走著。兩個妹妹已經累得筋疲力竭。這我才想起，她們平常出門，是騎腳踏車，而很少走路。何況四妹今天穿的是皮鞋，三妹膝關節有風濕。眞怪自己只顧要重溫四十年前這些曾經走過的路，而忽略了她們辛苦。當然也省悟到這裡不是台北，你走累了，休想叫到計程車。「錯過了這個村，就沒有了這個店。」眞應了舊小說上的警句。累了也得走吧！

歉疚的心情中，這一長段的路總算走完了。

回到旅館，三妹打開她行前從北京家中帶來的「口糧」。有饅頭，有煮好的茶葉蛋，有肉鬆和花生米。還有那一陣青黃不接，物稀爲貴的、經過冷凍的梨和蘋果。她帶的時候，我曾經很不耐煩：「出門只要帶錢就可以了！何必這麼累贅！」

旅館裡有很好的香片茶袋。叫一壺新燒的開水，泡上三杯茶。三妹一向任勞任怨，很好脾氣地說：

「咱們還是過武俠小說裡的日子吧！出門要記住，『飽帶乾糧，熱帶衣裳』。大姐，你陪我們再吃點！」

「你剛才爲什麼不讓我們乾脆回來吃？」我責怪三妹。

「以為你喜歡吃館子呀？」三妹認眞地說。

燈下茶香親情暖。在我這四十年闊別故土的旅人來說，那五個包子雖然是涼的，也照樣甘之如飴。我不挑剔，是因爲我根本不覺得應該挑剔。對家鄉，不知怎的，內心充滿了一種「客氣」的心情。覺得這譬如到別人家去做客，對主人提供的任何招待，你總是由衷地覺得自己應該毫無異議地接納。

也難怪這幾個在對我盡「地主之誼」的弟弟妹妹，反而比我更不能適應他們「本鄉本土」的「個體戶」。他們是主人，對自己難免苛求一些。

矛盾錯綜的心情中，我們在旅館的燈下聊天到夜深。

天津，天津！是我的家，又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在寧河蘆台鎭上。它不但早已人去樓空；而且大地震之後，連舊址遺痕都無處尋覓了。

我的家，在塘沽久大員工宿舍的「新村」裡。我們早已搬離了那寄居之所。父親也已去世了。

我的家，在天津特一區吉林路卅五號，打仗的時候，我們在那裡住了八年，它其實是我們的「難民收容所」，現在也不再是我們的家。

眞奇怪！盼了四十年，回來了，卻發現，「小鳥歸去已無巢」，沒有家了！

撲奔家鄉的我，竟然只能住在旅館裡，暫時享受一下手足之情。

這一天，過得好長！

我們爲了趕火車，是清早四點多就從三妹北京海淀區的住處出發的。到了天津之後，就一路馬不停蹄。看二弟、看市區。找路。緊張乏累又興奮的一天，在我們久別的天津度過。這裡寫著我悽傷又繁華的青春，寫著他們三個幼小又孤苦的童年與少年。我曾是他們的老師、長姐，又兼代了去世的母親，在戰時艱困的生活中，照顧他們的衣食起居與學業。這四十年後的重聚，他們都已五十多歲，卻每人都記著我當年所敎給他們的每一首歌。

是那些歌聲，使我們當年艱苦的歲月，至今閃著亮光。

是那些歌聲，使我們在經過了一生滄桑之後的重聚，仍然是如此的心靈相通。

當我們重聚，我們仍然有心情重溫那戰火下，每一個年長與年幼的中國人敵愾同仇，衷心的呼喚：

同學們，大家起來！

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聽吧！滿耳是大衆的嗟傷，

看吧！一年年國土的淪喪。

我們是要選擇戰？還是降？

我們要做主人去拚死在疆場，
我們不願做奴隸而青雲直上。

……

五十三歲的小弟，瘦瘦高高。他是我《飄雪的春天》小說中的「小建邦」。在我心中，他仍然是那個凡事輕描淡寫的小男孩。我所唱的歌他都會唱，包括那不適合他幼小年齡，而他卻最喜歡唱的：

人生過隙駒，今日朱顏，明日憔悴，
人生過隙駒，今日繁華，明日非。……

讓我們，讓我們，在這一切悲傷與繁華均已過盡的一九八八年的夏夜，在這當年我們不敢仰望的大旅館的客房裡，面對几上的茶香和窗外海河上的夜色，讓我們，讓我們一起，低聲重溫那當年記錄著我們坎坷歲月，如今反映著我們一世浮沈的歌：

——人生過隙駒，今日朱顏，明日憔悴，
——人生過隙駒，今日繁華，明日非。……

我們眞不該是如此心情蕭索的。

在這樣的茶香，與這樣面對夏夜美景，舒適無比的旅館房間裡。

# 十一、離亂生途長短調

我不是教徒，卻總覺得冥冥中，有一位很公正慈愛的造物者。在我這很傳統的中國人來說，上帝也是負責計量因果的，和佛陀的工作十分相似。

爲什麼我會這樣想呢？

因爲我在這幾十年的人海浮沈中，常會發現，當年自己以爲被剝奪了的，會忽然很輕妙地得到某些償還。當然，我也一定會發現，當年自己虧欠了別人的，也將會在不知不覺中，被科以「罰鍰」或「服勞役」。

喜歡得到獎賞，是人的天性，所以我常特別留意到「獲獎」的部分。

四十年闊別大陸，五十年離亂生涯，所被剝奪了的何止一端？而對我來說，最殘酷的，實莫過於讓滿懷夢想的我，被摒棄在大學門外，和所最愛的音樂宣告分手的那愕然的一刻了。

它使我這一生做事，都不得不付出比別人多十倍、百倍的努力。

它使我在許多機會面前，被迫止步逡巡。最後還是得另闢蹊徑，自創前程。有如當年歐亞之間的航海者，在既無飛機可以凌空跨越，又無穿越陸地的人工運河，可以縮短航程的情形之下，只得「繞非洲，走遠路」，從生活中去埋頭教育自己。

它使我在音樂面前，始終是一個單戀的情人，而無法成爲與它併肩攜手的同伴。

它使我不得不把滿腔的歌與樂都寫在文章裡——像是單戀者的情書。

我一直未曾修煉到讓自己肯原諒這一份剝奪。

直到這次，四十年自我放逐，五十年悽惶奔走，之後的一九八八年，我忽然有機會回到這一生的一個朦朧起點。「你，當年，就是在這裡做夢，也在這裡被剝奪。現在，我請你回到這裡，你應該得到這份補償。」

我似是聽到這樣一個平和冷靜的聲音。它來自我所不知道的地方，那是一種奇特的允諾，說：「你可以回到那悽傷的、久遠以前的一個點。」

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的音樂館，就是這樣的一個「點」了。

我對它做過多少絢麗的夢？你應知道。它們都寫在我的散文和小說裡。

它滿載著我那被戰亂剝奪了的青春歲月。

奇怪呀！怎麼會是這樣的一種愛情！

十八歲的女孩，愛上的是這樣一座建築，只因爲它裡面容納了那麼甜蜜的、音樂的聲音！

在那以前（或許也包括了以後）；我沒有戀愛過。我覺得，這，都是由於那一刻，殘酷的剝奪。

「你還給我！」那剝奪者殘忍地說：「我不給你這樣的恩典！」

於是，我很錯愕地看著那些其他的人，不受環境改變的影響，進入他們要進的學校，從地面起飛，奔赴前程；然後回到一些我再也無緣去認識的地方，活過了屬於他們的一生。我不知道爲什麼造物者奪走了我的機會。我也不知道自己該不該抱怨。我所能做的，只是伸手接過環境所遞給我的，不想問它爲什麼要給我這樣，而不給我那另一樣。

我只覺得自己一生都在繞很遠的路，才能到達別人轉瞬間即可到達的地方。

當然你會說，一切遠路都不會是白繞的。

一點也不錯，我也常常這樣勸慰別人。

只是，當自己繞路繞得那麼累的時候，那辛苦而茫然的心情，只有自己才知道。

我一定要聲明，這不是抱怨，而只是「說明」。說明自己是過了這樣「繞路」的一生。當然，它使我比不繞路的人豐富些，有耐性些，感情也不一樣些。

「感情不一樣」的意思是，我會對著這四五十年歷劫之後的天津女師學院音樂館，用悲憫又興奮，快樂又感傷的心情，「享受」它的簡陋破敗與變形。

造物者說：「現在你可以回到它的身邊，投入它的懷抱，得到你的補償。我讓你在裡面住兩

個白天，兩個夜晚，就在你當年被選來參加『個別指導』甄試的鋼琴室裡，我給你充分的時間，在這裡入眠。」

造物者眞是慈愛又細心！祂竟然從來不曾忘記時代對我的剝奪與虧欠。牠爲我珍重地收存著這樣一個地方，一個夢；耐心地等到這一天，趕在我一生都要過盡的這時刻，把該屬於我的，交還到我的手中。

時間的灰塵積滿了世紀之夢。這音樂館儘管在造物者仔細的收存之中，竟然也是悄悄地蛻變。它已年華老去，燦爛的樂聲不需要了！青鬢的歌者都將遠逝。所以，鋼琴室裡不再有琴，練唱室裡不再有樂譜。像是在說：

「你這旅人，奔波了一生，你需要的是一個宿處，這裡有床。你需要的是一些口糧，這裡有合唱教室變成的餐廳。你需要的是一些淡遠的情誼，這裡有比你晚起步半世紀的，和你講著不同時代語言的人們來接待你，讓你有權在這裡重圓你那一生的未醒之夢。」

這是天津市立美術學院的「招待所」。它的「前生」是我青春之夢的織造者——女師學院的音樂館。

裡面不再有丁善德老師、勞景賢老師、張洪島老師、李恩科老師……不再有裴依雲的抒情、韓冬菊的爽脆、王恆樸的柔婉、池麗貞的奔放；不再有戰時中國少女的繁華歲月，不再有古老校園的清朗歌聲。它，出現在我面前，似陌生，又熟稔。院長、主任、教授、同學，都用接待校友

的心情接納我、招待我，給我溫暖的歡迎。而他們都是屬於現在的「天津市美術學院」。他們不認識我記憶中的一切「當年」。

這樓上，圍繞著方形大廳的是好幾組套房或房間。它們是以前的教室、琴房或辦公室。也許你不該說它簡陋。在天津目前的學校來說，它可能已經是很不惜工本的了。它肯定可以爲學校發揮很多其他的功能。我的錯覺只是因爲它當年是嶄新的，站在全市教育設施最尖端的一座音樂館。歷經了半個世紀，你怎能希望它還是風采不減當年？

我接受了這造物者給我的補償。

造物者太忙了，能記著一個渺小的我，已經是非常了不起，你豈能希望祂老人家從古老的櫥櫃裡珍惜地取出來、遞給你的這寶盒，是嶄新而亮麗。

感謝的心情，反而更是加倍的了。

二樓朝南的這套房，一邊窗子朝西。外面有大樹，入晚但覺涼風習習。六月初的北方，還是那麼清爽豪邁。三妹、四妹和我，在這臨時又多加了一張床的套房裡，共享我的靑春夢。小弟被招待在另一間單人房。

明天清早，將有爲我們特備，而且由我們選擇的早點。然後我們將要外出，在擴大了的天津市，去「尋根」。院長還特地爲我聯絡了校友，她們比我高班，將在明天下午見面敘舊。

套房浴室有大大的白色浴缸和抽水馬桶。浴缸的水管有點漏水。

夜風中，套房裡，我醒著。一生的苦樂都在這如夢似幻的音樂館裡飄浮著。這房間，豈不就是當年，抗戰勝利之後，二十七歲的我，重來投考音樂系，報名的地方嗎？豈不就是我終於只唸了一學期，就又在失望中與它道別分手的地方嗎？

四十年遠離故土，我未曾夢想自己會再回來。而我尤其未曾夢想會在這音樂館裡留宿，接受陌生同胞親切的招待，讓我再一次進入這曾是歌聲盈耳的建築。陪伴著我的是當年我被迫放棄學業，分擔起家計，幫助父親在艱苦生活中慢慢帶大的弟弟妹妹。我愛他們，不下於我愛音樂，如今我重見他們，我的欣慰勝過我如果有音樂。

一個人的「愛」是很難索解的。所以你不用問我爲什麼那麼愛音樂。也不用問，假如我當年未被剝奪，我會不會比現在快樂。

因爲我並不能給你答案。

連我自己，也不知道那答案。

我只能說，我很欣慰自己這一生被迫所選的遠路。它們有時是捲地的悲風，也有時是繁花似錦；有時是漫天的冷雨，也有時是一室爐火的溫馨。人的一生也許永遠不能界定成任何一種「必然」。我被迫這樣走，其實我也是主動這樣走。我被剝奪，其實我也被賞賜。我失去很多，所幸！既然那是失去，我也就無從知道它們究竟是什麼。我在失去的荒涼中，創造了一些收穫，它們倒還比較具體些。因此，我對它們有一份同甘共苦之情。也因此，它們和我關係比較密切。

也許，造物者的意思只是指著這音樂館說：「你不是要追尋嗎？這便是了！」

我領受造物者的仁慈與指引。崇服祂的智慧與幽默。

浴室水管漏水的聲音，竟然也是屬於音樂的聲音。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用國語把它們寫上樂譜的話，它們是青春響亮的大調：|33 33|3-|33 33|3-‖

我愉悅的聽著，眞奇怪！這滴水的聲音講的並不是國語，而是極富特色的天津話。如果你聽過天津口音，是怎樣的可以把第一聲讀成兩三種不同的抑揚頓挫，你就會知道，爲什麼這「滴滴滴滴滴」的天津水管所唱的是：「底迪底迪底」。

「底迪底迪底」。寫在樂譜上的話，它們就成爲感傷懷舊的短調：

|63 63|6-|63 63|6-‖了。

你不能說那一種是你較喜歡聽的，你只能說，它們把你帶到不同時代，那不同時代的焦點之外，是你自己的身世與年齡。

# 十二、海河的水，慢慢流

我極愛這孕育我、陪伴我、滋潤我、載送我，今天又重新來呼喚我，展臂歡迎我的這條河。它，叫「海河」，是我《飄雪的春天》小說的重要背景。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日至四日，我在這裡——天津海河畔，舊英租界，一家頗有歷史的旅館，和弟弟妹妹，在七樓兩個房間，度過我重履斯土的兩個白天，兩個黃昏，兩個夜晚。由這裡做出發點，我去看了散居天津各處的家中長幼；也由這裡做出發點，坐計程車去數十里外的濱海小鎮「尋根」。找到了所有我要看到、要尋訪、要憑弔的地方。

父親已在一九七二年淒涼晚景中故去。悲抑的心情中，我已初步完成了探親尋根的心願。我不要再去購物，再去趕路，擠公車；也不要再趕在飯館收市以前，急急忙忙去吃那難吃的飯。我要留點時間與心情給我自己。我要找回四十年前那個自己。要問明白，你是誰？你當年是曾經用怎樣的心情，怎樣的生活內容，和自己的愛情、學業，以及前途在掙扎、在浮沉，在戰勝與戰

敗。

我忍了很久，才告訴妹妹，我要自己再去一趟天津。我要去把那記錄著我一生悲歡的土地，一步一步的「走透」。我說是要「走透」！不是浮面的隨意走走，而是要把每一分、每一寸的時間與土地，和自己的感情，仔仔細細地揉在一起，讓它發酵，讓它化開，讓我凍僵了四十年的感情恢復知覺。告訴我，這返鄉的心情，究竟有多少是痛，有多少是甜美。於是，六月廿八日，我隻身一人，再一次來到了天津這海河畔，住進了同一家旅館這面對海河的房間。

當年，我和別人的心情是不一樣的。

我不知道究竟自己置身在時間之流的那一個點。不知道自己是由什麼樣的周圍所塑造；不知道所要去的地方會遇到什麼事與什麼人。而我就那樣雙手空空地飄走了。就那樣和故土斷絕了聯繫。

我沒有想過，那樣的放逐，在本質上，就是希望把過去的一切都剪斷的。我沒有眞正想過，那「剪斷」，所意味的是什麼。我只覺得，爲自己，我應該換個環境，好讓自己擺脫那沉重拖累我、沉埋我，一味阻擋著我的過去。我沒有意識到那樣的放逐，本身的意義就是隔絕。

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我是如願以償了。

這隔絕，史無前例的徹底。不但是形體與音訊上的隔絕，不但是感情與觀念上的隔絕，而且是，連一點點輕微的思念，都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之下，由於覺得「有罪」而自動斬斷的那種隔

絕，你不「敢」思念什麼人；你不「敢」思念什麼土地；你不「敢」使自己有對過去的任何牽戀。

你逐漸把「愛」的範圍重新界定，並逐漸把所愛的對象重新衡量，它變成很難適當付出的東西。於是，最後你發現，既然那麼難以付出，只得切斷它了。

正如同，許多小說中那本應相愛的一些戀人，不知怎麼，他們的愛情，就變成了那麼難以付出。不是他不要，也不是她不想給。而是他們忽然就會在那某一種自己也難索解，太想保護自己的心情之中，只願用最無情的方式切斷它，讓對方替你痛苦。你拒絕對他表示任何的善意，也不要表示自己還有什麼本質上的善良。你會冷然地用一個惡劣的自己去回答他善意的邀約。你不知道自己是爲什麼，而只知道一個受傷的自己，爲了避免自己傷口的痛，而先去刺傷別人，讓別人也知道，什麼是痛。

人，常常是在互相報復，彼此傷害的情形之下，相愛著的。

愛情如是，許多其他事情，也如是。

我們愛，我們有罪，因此，索性互相傷害。雙方都受傷之後，這愛，就平衡了；就不必再因爲互相牽纏而又無緣同在而悲傷了。我們不相愛了，讓我們敵對吧！

如果你是我的敵人，我就不會爲愛你而這麼惆悵了。

愛既不能，就在口頭上，行動上，用仇視與敵意去療傷吧！

沒有比恨更容易的了！

它使夜間無夢，使白日清冷。

它使你覺得自己非常理性，你最成功地武裝了自己，你變成鋼筋鐵骨，穿上最堅固的防護衣，你刀槍不入，你沒有感情。不是有人在批判「溫情主義」嗎？人性裡何必有情？無情是輕便多了！

我就是其中之一。它使我就這樣，在四十年後，眞的做到了輕輕便便地、冷冷靜靜地、清清醒醒地，飄瀟而冷漠地，回到了這土地，這國家、這城市、這河流，這岸邊。

讓我看見海河的水，這樣的澄碧！這樣的載走了我一生的悠悠歲月，讓我卻又能在這裡，目不轉睛地注視它，感覺到它悄悄注入我心中一分又一分的感情，像是久病者在接受注射那喚回生命力的點滴。我在化冰吧？我在復甦吧？我在懷念、在感傷、在惋惜、在惆悵、在追尋，在等待吧？我覺得自己再一次有了一個生命，可以爲了什麼而付出吧？

四十年後，重履斯土的這個黃昏，孤獨又陌生，陌生又熟稔的我，像一個從天外飄回來的孤魂，用周圍那些不相識的鄉親們所完全不知道的心情，沿著海河，慢慢地走。海河好平靜！她曾是我的母親，養育我、滋潤我、維護我、載送我，而她現在好像不認識我，儘管我是這樣想要投入她的雙臂，告訴她，我的心情。

我沿著海河邊一整條都是公園的花木葱蘢，夢遊一般地信步走。然後，我轉入一條橫路，再

一轉彎，走過一個大大的十字路口，茫然中，我認出了「小白樓」，那寫著抗戰勝利之後，「日本亡國賣大袍」的精緻商業區；寫著抗戰期間，困窘的年輕歲月裡，我用全部年終獎金，去買一雙心愛的鞋的地方；寫著我和某一個人初識不久，在那裡走過，又在那裡最後一次見面的地方；寫著我逃避自己卻終於無法逃避的地方。

「小白樓」，殘破一些了，陌生一些了，其實，當年也並不是那麼熟悉。我並不認識它的全部，我只記得一兩家鞋店，和那可以走走的街道而已。我對它的記憶，只是一些心情，一些生命的創痕與傷痛。

似乎我對每一個地方的記憶，都無非是些心情。海河曾是這麼綠嗎？記憶中，它是白白亮亮的，襯著黃土岸。荒涼的感覺，記錄在一些草叢間。它是沒有那麼多樹木與花圃，岸邊更不是公園的。是心情上的荒涼嗎？那暮春時節，我從這裡登上「和順輪」，和自己廿九歲的生命正式道別的那一刻，就是我對海河記憶的，最廣遠，最清冷的聲音了！

「海大道」也是。我非常知道「大營門」，十分記得「海大道」。那是我八年隨家避難，飢餓寒冷中，朝夕經過的地方。那一帶，寫著我去小學教音樂，帶學生走路去廣播的心情；寫著我和談得來的女友相偕走路，買一點小小的零食，都覺自己囊中羞澀的心情；也寫著和青春告別之後，獨自走過泥濘地面的心情。

我冷然穿過已經變成「杭州道」的「杭州路」，我教了六年小學音樂的地方。那所小學還

在，正在招考新生，多少代的孩子們長大了？多少代？

摒開了這記憶所帶來的失落，我走上了「中街」，現在它叫「解放南路」。不管它叫什麼路，我對這地方的心情是春天槐花香滿街，而使我覺得天特別藍的心情。以及冬天凜冽寒風裡，和全校師生一同「晨跑」的心情。那是一種既絢麗又清冷的艱苦卓絕。曾被生活無憂的那位大男生羨慕與讚美過的。

我也記得和愛情告別之後，自己每天繞遠路，走這條「中街」上下課，只爲了它的路樹和兩旁人家偶爾流瀉出來的琴音。

大概從那時起，我就懂得武裝和凍結自己了。我就知道「不付出」是何等的一種對自己的優待了。

理性的生活是很清楚的，它有一定的框架，一定的格式，一定的路線，一定的反應。你會訓練自己，把一切的感情冷凍爲透明的實體。你從中得到清朗的分析和結論，你會非常熟練地把濃稠的感情，凝結成一條一條冷硬的理智，告訴自己和別人——這沒有什麼。人生，就是這個樣子的。它開始、它進行、它消滅。那是一條一條的化學方程式或物理習題。你絕對正確，你的分析與判斷沒有錯誤。誰也駁不倒你，你不會失敗，就不會痛苦。你沒有感情的干擾，你就不會失去邏輯的導引。你，永遠是對的。你對，你就得到肯定與聽從。

我教完了音樂，看到了勝利，換了好的工作，賺錢多了，生活內容豐富了，穿得時髦了。

心，冷了。

兩小時的走路，走「透」了小白樓、海大道、中街、與海河。我不用再去我眞正住過的地方，不用再看那每一扇門和每一扇窗。我知道了，我知道自己是誰了！我是那個被自己摒棄了的靳佩芬。

我帶著用糧票和少量人民幣買來的「槽子糕」。糧票是一位萍水相逢的宗親，好心送我的。眞難得！遇到的這第一位交談的人，竟然姓靳！人民幣是妹妹給我的，我要用當地人的心情去買「一斤」蛋糕。試試看，很好奇又很悽惶地。然後我去那家朝鮮館，買一罐比外面特別貴的天津啤酒。回到旅館，我讓自己坐在五樓房間的窗口，在那非常舒適的小沙發上，茶几旁邊，冷氣撫慰中，專心注視海河。凝望它，在心裡擁抱它，直想投入它，跟著它流過去，爲了去切身了解一下，四十年，你這海河都記錄了什麼，帶走了什麼，上游還有些什麼。你爲什麼如此的澄碧，如此的豐盈，如此的滔滔滾滾，而又如此的深沉又平靜？你知不知道我？知不知道我父親？我母親？我的愛與我的痛悔與憂傷？你知不知道許多人都已成爲東逝的水？你知不知道你還將帶走的是什麼？是誰？你知不知道有一個人，在用這樣一生的感情在凝望你？愛你，欣賞你，直想投入你？

海河無言。時間是一九八八年，六月廿八日的下午，六點多鐘。北方夏日，天色還未到黃昏。河水如此澄澈，下班的人們陸續來此乘涼。有人在游泳，有人在釣魚。有人坐在對岸的欄杆

上，享受他的年輕。有人倚在這邊的欄杆上，享受他們老年有伴的溫馨。他們都是我的同鄉，而他們沒有一個人認識我。

暮色悄悄地在對岸掩至，天色勻靜，海河由澄碧轉爲灰白。

右手那邊的對岸，有一棟大樓，格外莊嚴。它首先亮起幾盞燈光，透過窗格。下意識地覺得，那樣的一種莊嚴與穩健，應是父親這一型人們的工作處所。驀然間，我猛省到，那四十年前的春暮，我孤身一人，從這樓窗外的碼頭，登上那三千噸的「和順輪」，讓它載著我，航過海河的黃土岸。沒入蒼茫的海天。卻在大沽口外停佇，爲等潮水，直至次晨，才再啓航。那從昏夜到黎明的停佇，似是專誠讓我在淒寒的海上夜風裡，用我冷硬的心腸，做一次永難忘懷的回顧——那遠遠岸上人家的燈火裡，有我父親爲他遠行的孩子，點起的一兩盞盼望的燈光。而他的孩子，卻始終未能在他的有生之年，回到他的身邊，爲他在嚴冬暮色中，燃起一爐可以爲他驅寒送暖的爐火。

# 十三、你看那樹！

一九八八年五月底，我帶著一世的憂傷，無奈地辦了登記，經過第三國，到了北京、天津和北戴河，去探親，見到了叔叔、妹妹、弟弟，以及他們的下一代。住在三妹的「國宅」「柳蔭園」裡，適應大家所公認的「落後三十年」的生活。

所謂「落後三十年」，是沒有衛浴，沒有電話，沒有計程車，沒有現代化的廚具，沒有衛生紙，沒有超級市場，……沒有我們所引爲自豪的一切。當三妹的同事，客氣地對我說：「我們這裡實在相當簡陋」的時候，我的回答很直率——「這有什麼關係？我們三十年前也這樣。」

此地的朋友聽了曾笑我說：「你這不等於是當面說人家比我們落後三十年？」

一點也不錯，我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三十年前也這樣，沒有一切現代化的設備。

我們三十年前也這樣，因爲沒有那麼發達的商業環境，人們也沒有那麼貪錢，所以還容得下

許多樹。

也許每一個人都難免如此，出去的目的是看看自己所沒有的，也羨慕別人有而自己沒有的。大陸同胞羨慕我們的繁榮。

我呢？羨慕他們的樹。

北京的樹眞是值得自豪！

一出機場，通往市區的公路上，夾道都是樹木。不僅是一行、兩行；而是許多行、許多層。不是樹木，而是樹林，不是樹林，而是樹海。它讓你看到經過人工規劃之後的天然；也看到不妨礙天然的人工。

三妹住處的海淀區，魏公村，等於我們這裡的國民住宅。紅磚外牆的住宅群，安排在一些花木襯托之中。入口處，題名「柳蔭園」，毛筆書法，字體飄逸。我給她謅了一首打油詩：

我家住在柳蔭園，
地無一壠房兩間。
蒙古風沙不汙染，
安步當車最天然。

三妹說：「大姐，你只看光明面。」

當然啦，在人家做客，怎能只去挑剔人家缺這少那，而不揀好的讚揚讚揚？

「蒙古風沙」使人們住處的衣服、器物，攤販售賣的食物上，一會就是一層塵土。但這種「塵」，比起核子塵如何？比起油煙雨又如何？現在盲腸炎是小手術，肝炎也不是絕症，大陸同胞也會治。而癌症就不那麼簡單了，他們的中醫也還在苦苦研究之中。

而那些「柳蔭園」的柳，「芙蓉園」的芙蓉，卻是眞的有滿園的柳和芙蓉，不是掛個名，說說好聽而已的。

這大陸「國宅」的一些樹，當然是小意思。北京眞正的「樹」是在路上。從前，我會專程坐火車從天津到北京「太廟」去看樹。當天往返，不耽誤晚上的廣播工作。現在有機會住海淀區，就不用專程去「太廟」了。街上的行道樹就夠你流連啦！從魏公村一拐彎，走路去大範圍的「友誼賓館」。一路上大樹參天，外面一排是白楊，裡面一排是槐樹。這兩種可能是最代表北方特色的大樹。白楊高聳挺拔，整排地遮天蔽日。遠看路盡頭與天盡頭相接的地方，你會以爲那密密層層、高與天齊的樹巔，是遠山或雲層。而槐樹的細葉婆娑瀟灑，襯在白楊的裡層，所提供給行人的，卻是親切、靜謐與安閒。

這四十年來第一次返鄉，三妹一見面就怪我，「不早來半月，你小說裡寫的那一到春天就香滿人間的槐花剛開過。」

其實，有花沒花我不在意。在意的是那無邊的綠意與濃蔭。遠看，它們是最美的、裝飾地球的大畫。走近之後，它們是最解人意的朋友，給你遮蔭，給你防塵，給你擋雨，還給你指引前

程。並且，如果你喜歡去體會，它們還會在一路上告訴你許多人間興廢事。讓你從現在，想到久遠以前；從久遠以前，想到以後的無限。你頭頂上是遮天蔽日的濃蔭，身旁是讓你有穿花拂柳之樂的密葉；腳下也是各式葉子爲你鋪的最天然的地毯。你在葉子的簇擁之中踱步，那份幽靜與安逸，使你就自然而然地忘了自己已經走了很遠。

北京的樹是沒話說，太多了。連商業都市的天津，以海河沿岸的帶狀公園爲例，也已給人間準備了不少的綠意。弟弟所住的「國民住宅」也綠蔭掩映，近處還有公園。更何況，我忽然有機會去了一趟北戴河，單是那住處附近一條名叫「鷹角路」上的行道樹，就使我把行程延長了十天。這條路上，東側種的是松樹和楓樹，想像秋天來時，蒼松襯著楓紅，不知該有多美！西側都是松樹和白楊。白楊那臨風特立的性格，越往北方，越顯得孤高豪邁，比旁邊的松樹高出一倍，直與天齊。眞是最美的景觀。何況風來時，一片蕭蕭的海潮音，成片地傳過來，使你立刻體會到，什麼是天籟。

其實，何必到北戴河？你從北京坐火車到天津，兩個多小時的路程，沿途就有看不完的樹，成行成陣地列隊迎你，使你看得忙不過來。

我和三妹、四妹與小弟，走在一起，無論到什麼地方，注意的焦點幾乎百分之百全是樹。所以到了後來，只要我用手一指，還沒說話，三妹就已搶先替我說了：

「你看那樹！」

三妹就是這麼可愛！她在我心中永遠「十歲」，也就是因爲她這份幽默、調皮與善解人意。這以後，三妹每次要遊說我出去走走，不必說是去什麼地方，只要說：「大姐，我帶你去看樹！」我就如響斯應，立刻欣然動身了。

**附記：**

不過，眞正聽了我的這番話而想要到海淀區去看樹的人，可要另有一番心理準備。因爲你或許會發現，當地人引爲自豪而向你誇耀的並不是他們的樹，而是那代表現代科技的「電子一條街」。

# 十四、長風萬里，一睹關山



從北京到天津，是我返鄉之後的第一次火車之旅，然後就是去北戴河了。

如果你只以北京火車站外的人滿爲患，剪票口毫無辦法的「擠」來判斷大陸的火車，眞會使你把在大陸坐火車視爲畏途。你完全不能了解爲什麼北京火車站外的廣場上會有那麼多人席地而坐或席地而「卧」；你也不能想像爲什麼剪票口會那樣地擠做一團，而當你拚命擠了進去之後，卻發現，站台上十分輕鬆。

那種「擠」是十分「壯觀」的。人們把包裹箱籠舉在頭頂上，「卡」在進口處那窄窄的欄杆中間，大家一起陷在進退不得的困境。於是迫使你以「如不成功，便要成仁」的緊張心情，使盡平生之力以求「過關」。一面要極力防衛自己，以免被擠窒息，或擠斷肋骨。

也許，我們如果每次都找到軟席候車室的進站口，就可以逃過這一關。但在不同的車站，不要說我這陌生旅客不知道東南西北，就連久居當地的三妹，也得東問西問。結果還是在時間緊迫

的情形之下，找個可以進站的地方就照直往裡擠了。北京如此，北戴河也是一樣。天津較好一些。

不過，到後來你會發現，「擠剪票口」的緊張刺激，其實是你要享受火車旅行所應該付的一份代價。因爲事實上，只要擠過了剪票口，你就立刻覺得海闊天空。站台上並不是那麼人山人海，旅客都很容易地各就各位。而當火車開行之後，窗外都「弧形全景大銀幕」的山川與平原，毫不吝嗇地展現在你的面前，任你欣賞，這時，你就知道，它是何等的「値回票價」！何況，從北京到北戴河，這一段的北國之旅，軟席座位的票價，才九塊錢人民幣。五小時車程，讓你安坐車內，一睹老大中國一角的蒼莽大地，古老關山。你說那濃濃的收穫，化開了，該是多少！

這次去北戴河，是我自己事先絕未想到的一個臨時動議。我對北戴河的印象，來自十幾歲時。每年暑假，坐火車回家，必會看到車上有不少穿大花洋裝的西方婦女，到北戴河去避暑。卻從未想到，有一天，我會親自去看看這地方。這次只是因爲天氣忽然熱了，住在北京海淀區的三妹家裡，偶然會停水或停電；而返鄉探親的一些主要項目，也已大致告一段落。一時動念，想帶著兩個妹妹，到北戴河那避暑勝地去住上幾天。於是，在三妹任勞任怨的安排之下，訂了車票和招待所，開始了這趟夢想不到的旅行。

「北戴河」的勝景不是「河」而是「海」。它距離「天下第一關」山海關約一個半小時車程。北寧鐵路從北京經過這裡，然後穿越山海關通瀋陽。另有鐵路支線到北戴河海濱的金山咀。

這地方，自從清光緒十九年，修建天津至山海關的鐵路時，被英國工程師發現了它的美景之後，大事宣揚，吸引了許多外國傳教士及中國有錢人到這裡來興建別墅。光緒二十四年，清廷又正式把它開闢爲「各國人士避暑地」。於是，西方人在這裡購地建屋的絡繹於途，形成了北戴河濃厚的殖民地色彩，各種建設十分西化，成爲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中國裡的外國」。你可以說，它記錄了另一種形式的喪權辱國，是沒有正式條約的一種中國民衆和外人之間的不平等。但是，它也和天津的租界一樣，多年之後，再去回顧，你會發現，它也使中國因此擁有了一個現成的、現代化的避暑勝地。現在那些佔地廣大、花木葱籠的西式別墅，已成爲大陸各大產業系統及各單位的職工療養院或休養所，也是舉行重要會議所經常使用的地方。

北戴河屬河北省。據說北京曾想要爭取這個地方做爲「夏都」，但河北省不答應。想像北戴河的觀光收入一定很好，因此捨不得出讓。

且說這天，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四日，我帶著三妹和四妹（小弟已銷假回了昆明），上了火車，找到由「軟臥」代用的「軟座」車廂，開始了我返鄉之後，唯一的一次純旅行。

上次的天津探親之旅，火車有空調，路程也近。感覺上，和我這些年在外面出門旅行，沒有什麼太大的兩樣；甚至也沒留意到車上有空氣調節而車窗密閉。直到這次，上了這列去北戴河的火車，開始一直只覺得風大，讓三妹把電扇關了，還是風大。出城之後，經過曠野，那風就立刻變成呼嘯作響的「哨子風」。這才發現，原來這車是沒有空調的，所以開著窗子。起初你會覺得

這風把你吹得心神不定，待要關上車窗，卻又十分悶熱，只得還是開著，忍耐那撲面而來的，不客氣的野風。但不久之後，你就覺得自己開始投入並欣賞這份長風萬里的豪邁。那是一種「勢如破竹」、「所向披靡」式的奔赴，使你覺得自己也成爲這列車的一部分。啊！很多年未曾這樣地奔赴過了！那「哨子風」豈不就是火車們所特有的，銳不可當的氣勢嗎？自從有了空調，改用了電聯車，火車們的這份氣勢就快要消失了。我們也逐漸忘記了這項交通工具所特有的豪縱。

這哨子風，加上了火車本身的呼嘯與飛向遠天的汽笛的長鳴，再加上火車裡所播放的音樂的大聲，三者合而爲一，迫使你不得不放棄了一切的顧慮——頭髮嗎？皮膚嗎？書頁嗎？……都隨著這風聲與車聲的交響，「撲刺刺」地從意識裡遠颺。

以爲這還是小時候坐過的那趟北寧路線，要經過天津、塘沽、蘆台與唐山呢！沒想到，火車一起步就往通縣方向跑。糟糕！看不見塘沽與蘆台老家了！也看不見抗戰期間，我在「廟裡」教小學的那小站——漢沽了！這是另一條開往山海關的新路線。這條線走的是「弓弦」，北寧路走的是「弓背」。也許這班車是從平漢路開過來的「直通車」，曾聽到播音器播報「謝謝你們搭乘鄭州鐵路局的列車」，我的地理知識還停留在北寧、平漢、津浦，三條鐵路主線的階段，鬧不清自己有沒有聽錯。

火車不管我心裡想什麼，它理直氣壯地往前奔馳。頭一站是「雙橋」，然後是「通縣東」、「北劉庄」、「燕郊」、「大廠縣」、「李旗庄」、「三河縣」、「薊縣南」，……一處也不認

識，一處也未到過。這時才想到我這大陸人，我這「京東八縣」之一的寧河縣人，當年所看過的大陸河山怎麼那麼局限？

火車呼呼地開，大平原景色變化萬千，沿途阡陌綿綿，樹也不少，卻未像上次從北京去天津那樣，被兩旁的樹木擋住了幾乎所有的視線。正是農曆五月，麥熟時節，一片收成不錯的景象，使我放棄了只想去看看塘沽、漢沽、蘆台等「老家」的狹隘願望，甘心讓這火車帶著我跑。好像在天津偶遇又有緣的計程車司機「藍吉普」所說的：「難得能回來了，還不擴大心胸多看看！」

說的也是！從前只知道有同學是玉田縣的，有同學是三河縣或薊縣的，可從來也不知道她們的家鄉是什麼樣子。這次這列不講理的火車帶著你跑，讓你看見她們家鄉的房子，那些紅磚灰頂，排列整齊的老屋，該是她們所熟知的吧？

過了玉田是豐潤，居然就是沒經「唐山」。讓我未能一窺大地震後的唐山近貌。

火車不問情由，似箭一般，「咻！咻！」地往前「射」。心裡還正疑惑著唐山今天該是什麼樣子，一瞬間，火車已捨下了那些有房子的村落，景色變得開闊粗獷，地名「銀城鋪」。再往前是「狼窩鋪」。地名與地形都有了邊城色彩，使我想起了許多小時候看過的武俠小說裡的情節。

外面野風呼嘯，而車裡播的音樂卻是另一種頹廢吶喊式的「恰恰」。服務員強作「現代」地報告說：「這是一組午餐音樂」，歌詞在車身震盪中，上氣不接下氣地反覆。

唱的是「我親愛的小花……」聲音喧鬧，詳細歌詞聽不清楚，卻使我覺得這好像給「關西大

漢」頭上強戴上一朵紅絨花，可笑又多餘。唉！如果讓我給這樣的一列火車選音樂，我會選「將軍令」。如要大衆化一點或「童心」多一點的話，我會選那首讓你想到「大蟲下山」的打擊樂——「老虎磨牙」，那才合適哩！

車過豐潤與狼窩鋪之後，就看見山了。遠處樹林綿延不斷，這邊土壤卻是紅色。火車經過不少的「立交道」，遠遠路過的都是貨車，車頭燒煤，「突突突」地冒著黑煙，鼓勇前進，後面「一拉溜」五六十節車廂，煞是壯觀。

過了「坨子頭」站之後，車上出現了一個小插曲，好像是特爲乘客們安排了一段「橋劇」。只聽得那音樂聲忽然停了，換上了服務員的臨時插播，播報的是：

「一號車廂，三十八號座位，有一個小女孩，上肢脫臼（她先說是『脫節』，後來再報告時，才謝謝有人指正，應是『脫臼』），車上那位旅客是醫務工作者，請幫忙治療。」

幾年前，我在雜誌上看到一篇小說，題名〈八號跑道〉。飛機上的正副駕駛一起食物中毒，緊急請求旅客中有那一位會開飛機的去幫忙。結果只有一位二次大戰期間，飛過老式飛機的乘客，勉爲其難，聽著塔台指揮，驚險萬狀地度過難關。

這列車上所發生的情節當然沒有那麼嚴重，但也造成了一陣懸疑。半小時之後，這服務員播報說：

「已經有一位女醫生，把這小女孩醫好。這位旅客不肯留下姓名，只說是湖北黃石人，很感

謝她。」然後又加上一句：「我們要向她學習。」

車行迅速，沿途小站不停，經過一帶盛產木材的地方，有一處寫著「批發市場」。細看時，火車已經慢慢停站，原來這是灤縣了。

灤縣是大站，「灤縣站」三個行書字，在站台上靜靜地懸著。我給它拍照留念。想到開灤礦務局的煤，一直是我們從前過冬時，取暖的燃料，也是父親服務的久大精鹽工廠最重要的動力來源。有專供運煤的鐵道，直通工廠。開平與灤縣是我國當年最大的煤礦所在地。開平煤礦曾被英國人佔據，後來和英人訂約，兩礦合併，成立開灤礦務總局。北方這一帶，從鐵路到風景區，到租界和煤礦，我國和英國人之間的瓜葛，實在不少。至今英國人仍不忘情我國的西藏（清光緒三十（一九〇四）年，英國曾攻陷拉薩），直接間接，仍在製造事端。

車過朱各庄、昌黎、留守營，就到北戴河了。我們將住北戴河的「外國專家休養所」。一切都是三妹安排。下火車後，也是她一馬當先，叫出租車，講價錢，抵達「外專休養所」之後，應付守門人及向櫃枱辦理登記，一路勇往直到，而我卻一直說是我「帶著」她們。當了大半生小學老師和教導主任的三妹，完全不以為忤，高高興興，替我照料一切。四妹更是反而感謝我，說，如果不是我「帶著」她們，她至今還沒機會看到大海。

好吧！就算仍然是我在「帶著」她們吧！

# 十五、我這「台胞」

北戴河的「外國專家招待所」正在裝修。我們和另一對洋人夫婦是早到的客人。正式開幕要在兩三天之後，那時將要有很多人從北京趕來參加典禮。

我用遊客的心情來此小住，也用遊客的心情看待這十分現代化的招待所。它佔地寬廣，花木繁茂，套房設備相當高雅。除了主樓之外，大約有二十幾所別墅式的獨棟房屋，錯落在林蔭深處，供各地來度假的人使用。各套房有衛浴，另有公用淋浴室、醫務室和理髮廳。後門直通海水浴場。一座容量很大的餐廳供應三餐。團體有團體的伙食。我們是單獨來的，特別有一個單間，讓我們在那裡進餐。從旁邊繞廚房的過道進去，要經過很雜亂的工作處所，腳下油溼滑膩，走的時候要十分小心。餐廳負責人很客氣，親自招呼，菜式比大廚房的要多一些。但是一餐下來，索價十五元人民幣，三妹就開始盤算，她覺得不值這些錢。

我沒意見，手上帶的是在當地兌來的外匯券。心中的錢幣單位是台幣。十五元人民幣，折合

台幣一百二，說貴也不算貴了。我們曾主張菜式少一點，因爲實在吃不完，但好像一切都不由你自己主張，有時雖然說是爲你單獨調配的，卻根本就是大鍋菜。我們三個都並不挑食，只是希望別浪費，既吃不完又花那麼多的錢，就覺沒有必要了。

曾經有兩次，我們只是買幾個饅頭，帶到房間，和花生米一起吃。

當然，這不是很好的打算。

離招待所不遠有個市場，三妹去買了一袋奶粉。但這奶粉非常稀薄，沖出來像糖水。雖然袋子上寫的是全脂奶粉，但顯然沒有什麼「脂」，也沒有什麼「奶」，倒是有不少的糖。

六月份，在大陸北方，是水果青黃不接的時候。即使在盛產水果的北戴河，這時也只得忍受那很貴的香蕉和品質沒有保證的西瓜。我這經常旅行的人，對食物向不挑剔，只要能讓我吃飽，不致損失體力就行。沒想到在這裡卻發生「多的太難吃，少的吃不飽」的問題。於是，當我這「布爾喬亞」（三十年代作家筆下的「小資產階級」）在一次坐公車去市區的途中，一眼看見了「起士林」的時候，那種喜從天降的心情，可真是別人所無從想像的了。

「起士林」，很早就是北方有名的西點麵包店，附有西式餐飲。從前在天津，「起士林」是我常去的地方，沒想到北戴河也有「起士林」。

這天早上，我和三妹四妹說：「我太餓了，得找個地方吃雞蛋。」

三妹照例精打細算：「自己買回來，讓廚房給煮煮，不就行了？」

我說：「算啦！別厮煩啦！差不了多少錢，我帶你們去『起士林』。」

「起士林」有台北「福樂」的模樣，只是比福樂顯得「結實」些，也許是所使用的建材和餐桌椅質料比較傳統的關係。門前還有個雅致的庭園，簡單清爽，而且有西式的洗手間。門上的TOILET 寫的是 TOILfT，看起來有點奇怪。我們先在門市部買了六塊麵包（在這裡買麵包，一樣要糧票），再到餐飲部來叫煎蛋和牛奶。這邊四人一組的餐桌，很是悅目。年輕的男服務員，雖然不算精神飽滿，但是態度和氣。我叫了一客煎蛋，三妹四妹堅持只吃麵包和牛奶。

煎蛋是一客三個，很不合常規似的，因爲我所到之處的早餐煎蛋都是一客兩個。我說我只要兩個，服務員說，一客就是這麼多。我要兩個妹妹和我分食，她們卻都說「不喜歡吃煎蛋」。

無奈，我只得剩下一個，就請服務員來結賬了，服務員動作勤快，一面收錢，一面要把盤子撤走。三妹連忙制止，抱怨我說：「別浪費呀！吃不完，把它和麵包一起帶回去，餓的時候再吃。」

說實在話，在離開大陸好幾個月之後，我才慢慢想起這件小事背後的意義。它使我逐漸明白，「吃飯別剩碗底」的幼年教育，在過慣了豐富繁榮生活的我們心中，已經逐漸不再那麼認眞遵守。我們日常飲宴，那一樣不剩？剩了當然撤走了事，誰還在乎一個雞蛋？但是，在樣樣都要配給的大陸同胞生活中，雞蛋也是要用「蛋票」去買的。記得當時我問過三妹，他們是肉有「肉票」，油有「油票」，糧食有「糧票」。雖然日常都已足夠，而且外面有「個體戶」可以補充，

但那一切都有限額的生活習慣是不變的。

其實，毫不誇張地說，我這「台胞」，在消費觀念上，已經自以爲是非常能屈能伸，最可隨遇而安，很不主張浪費的了。不過，也許正因爲對自己有這麼一種自信，才有時還是疏忽了和大陸同胞在生活習慣與思想觀念上的差距。

有件小事，在當時覺得平常，事後想來，卻覺得相當嚴肅。那是在我們住進外國專家招待所的第四天下午，我和三妹、四妹到海邊去散步乘涼。回到招待所之後，坐在樓下大廳沙發上休息，一位服務員走過來對我說：

「你房間空著一個床位，我們有一位同志已經搬進去了。」

我當下覺得十分意外，而且有點生氣，就問他：「爲什麼？怎麼會搬到我房間去？」（而且有那麼多房間都空著。）

他向我解釋，因爲這裡的規定是二十元人民幣一個床位，每個房間有兩個床。他們是用床位算錢，而不是論間算錢的。

我仍然覺得不能接受，和他爭辯說：「那你也應該早告訴我，我的東西都敞著，寫的日記和信也都在桌子上，你總得讓我收拾收拾。」

服務員一面說「對不起」，一面就要走開，彷彿就這樣定局了。我急得叫他先別走，說：「二十塊錢一個床位，我出四十，讓我一個人住一間，比較方便。」

三妹本來坐在旁邊一聲不響，這時才把我按了一下，說：「別急，我去問問。」

三妹到櫃枱去問的時候，我開始冷靜。想到這「招待所」雖然一切設備和觀光飯店沒有兩樣，但究竟不是一般的旅館。說不定是三妹好大面子才可以住進來的。以一個客人的立場，人家有什麼規定，你總不能毫不考慮地就亂抗議，尤其不應該生氣。就在這心中有點後悔的時候，三妹平平靜靜地走回來，說：「好辦！我跟他們說了，我大姐是從台灣來的，和我們同志不熟，住在一起不大方便。我搬過來，讓那同志和我妹妹去住一間，這不就解決了嗎！」

我心中正在歉疚，當然不再說什麼。在樓下坐了一會，估計這時間，那「同志」已經搬好了，我們才上樓去。來到房間門口，卻見四妹的房門敞著，一位男士手中拿著一包東西，從四妹房間走出來，我心中第一個反應是：「啊！怎麼搬進來的是一位男『同志』？」那人似乎也看出了我這「台胞」心中的問號，趕緊很客氣地對我們說：「我是來幫剛搬進來的那位同志拿東西」。

我忍住了滿心的問號，沒敢再亂發問，三妹在旁邊已經急得直扯我的衣襟了。

這件小插曲，在當時，過去也就算了。但日久之後，它在我腦中逐漸發酵，變成了一個值得深思的課題。它似乎並不只是意味著一次偶然的不相了解。它所說明的可能是海峽兩岸隔絕四十年以來，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不同思想觀念之下，所造成的一種歧異。也可能是海峽兩岸的「同胞」在日後眞正想要同步相處時，一項需要正視的問題和需要克服的障礙。它可能並不是容易發

現，因此也不是容易調適的一個歧點，但它比日常生活條件上的是否現代化，似乎更重要一些。

以我來說，我是北方人，我一生過的是很樸實的生活。我的觀念是很「中國」，也甚至是很「大衆」的。我一直自認爲我不喜歡以美國爲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與個人主義的生活態度。我以爲自己是相當能夠不把「個人」看得那麼重要的。

但是，回想一下當時自己對有人住進我房間時的反應，我是在爲自己的「隱私權」被侵犯而生氣。我說我情願多花二十元，來享有一整個房間，而覺得那是理所當然。來自西方的資本主義與個人主義的色彩，無形中早已成爲我們意識型態的一部分。我那直覺的反應，其實也就代表了一種小小的「金權」——金錢是可以超越某些事情的。多少年來，我們習慣生活在這樣的觀念之下，而不曾意識到，大陸即使在某些措施上，爲了迎合外界，而在改革之中；但實際上，他們仍然是一個一切公有，沒有私權的「主義是從」的社會。

尤其是我們這在大陸時即已成年的一代，我們記憶中和觀念上的大陸，只是傳統的中國。當我們見到了久別的家人，幾乎完全可以把這四十年的日子一筆勾消。無論在心理上或感情上，我們都毫無困難地回到了過去。生活條件是否「落後」，並不在我們念中，因爲我們明明知道，自己也曾從艱困貧乏的戰亂生活中掙扎過來。那不是問題。問題是發生在那我們以爲可以一步跨越或一筆勾消的四十年。在彼此分道揚鑣，接受不同的外來思想與觀念的過程中，所塑造的是與以前不再相同的我們。以後我們對事情的反應，會在不經意之間，發現許多的歧異。

「外國專家招待所」的規模與設備，和世界各地的觀光飯店沒有兩樣，所不一樣的是觀念。他們一切公有，不分你我，並不重視什麼個人私秘。

其實，即使對我們來說，「隱私權」一詞，也是外來語。在傳統的中文裡，「私祕」並不是很光明的用語。是自從有了自美國輸入的這個字——privacy 之後，我們把它譯成中文的「私祕」或「隱私權」，才逐漸改變了人們對這兩個字的印象。但它仍然帶著濃厚的外來成分。相信直到現在，也只有都市裡的知識分子經常使用它。而且我一直都還記得二十多年前，首次聽到有人使用 privacy 這個字的時候，那種帶點反感的心情。也許正因爲當時第一次對這個字的印象是來自英文，所以直到如今，聽到有人談他的住處有沒有 privacy 的時候，還是有點覺得他們「洋裡洋氣」。心中隱然的反應是：什麼「私祕」不「私祕」，我們才沒這一套！

但是，從這次在北戴河遇上這一段小插曲，我才不得不把自己重新予以「定位」——原來你也久已習而不察，變成如此的「西方現代化」。這也就難怪天津老家住處附近的攤販，老遠地朝我喊「哈囉！」而其他的鄉親們居然爲「你怎麼也和我們說一樣的話？」而驚奇了！

而我這「台胞」在回台之後所寫的文章中，提到大陸的人們，下筆最方便的寫法，仍然是「大陸同胞」如何如何。

我和兩個弟弟，兩個妹妹，四十年天各一方，如今重聚，手足之情絲毫未減。我們是名副其實的「一母同胞」。而我的「官稱」卻是「台胞」，他們是「大陸同胞」。

# 十六、北戴河的日子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至六月廿四日，我和兩個妹妹，住在北戴河「外國專家招待所」裡。距離我們一同住在天津市特一區吉林路三十五號，那德國式的破舊大樓裏的日子，四十多年了。

那時，我們在日軍侵略之下做難民。母親故去了，父親不肯給日本人做事。我在做小學教員，多多少少，幫父親負起一部分照顧家庭的責任。

我是被戰爭從種種屬於少女的美夢中推醒，從幸福的生活降落在一個陌生無情的現實。而幼小的弟弟妹妹，對好日子的記憶卻像是剛剛到手的珍寶，還未來得及把玩，就被奪去。他們生活的場地，就實實在在地屬於那無情又困苦的新式大雜院。

有時候，長長暑假的下午，他們睡著了。淡漠又酷熱的陽光，從長窗外透過來，照著他們。有時候，淒冷的嚴冬清晨，結冰的房間裡，無溫的煤球爐火，是幼小的三妹從外面升好之後，提

進屋裡來的。不到十歲的她，天天學著和我一起做事。

四妹太小，缺少照顧，營養不良，畏寒怕熱。天天也要分擔許多家事。我們幾個人有充分的默契——互相靠緊一點，讓我們彼此壯膽，絕不把痛苦與抱怨去煩擾已經夠煩的父親。

抗戰勝利之後，弟弟妹妹隨父親「復員」，回到他們應該過的，正常的生活。我則獨自留在天津，爲了想要重新找回一個自己，而來到了台灣。

我和這兩個妹妹共同的生活記憶，就因此一直停留在那戰爭期間的艱苦歲月。

四十多年之後，當時十歲左右的三妹和四妹，五十多歲了。

探親還未開放之前的某一天，我忽然接到四妹從香港打到台北來的越洋電話。聽到她清脆的聲音在那邊叫我：

「大姊，我是佩華！」

我的反應，任何一個寫小說的人都想像不出，我這四十年後第一次和家中的一員取得聯絡時的第一句話，卻是：

「嗳呀！你的國語眞好聽！」

然後我問她：「你幾歲啦？」

儘管她在那邊笑我說：「大姊，你忘啦！我比你小十二歲，整整『一輪』。」我還是在興奮

不知所措的心情中又問了另一個奇怪的問題：

「佩華，你多高啦？」

隔絕了大半生，我只記得她們是尚未長大的小孩。

這樣的接觸之後，我們終於在有生之年，看到了現在的彼此。我們都已步入老年，而在心情上，卻都並未老去。這四十年史無前例的隔絕，反而意外地使我們很容易地抹去了那一大段彼此無從分擔的、艱苦的人生過程，而可以就從當年分手的那一刻，重新把晤。

現在，我們在這避暑勝地北戴河的招待所裏，分住兩個房間。她們的朝東，海就在她們的落地窗外。我的朝西，先以為這朝西的一間一定很熱，卻未料，北戴河的朝日從海上射過來，是朝東的那一間最先灌滿了陽光。到了下午，陽光威力減弱，海風漸起，加上西窗外的樹叢，使這房間持續地擁有涼陰陰的舒適。

我有時叫她們到我這邊來午睡，而我醒著，好像當年，她們小的時候。

六月中旬的北戴河，十分的舒適與閒逸。常常使我忘了這是我四十年後，首次的返鄉之旅。更常常使我忘了海峽兩岸四十年在不同的政權下，所產生的種種差距。渺小的我們，像是頗為輕易地就重溫了手足之情，彷彿這中間只隔著一個噩夢連連的黑夜。而現在，我們在黎明的號角中醒過來，驚訝地發現，我們是置身在從未到過的一個海濱別墅裏。「黃粱一夢」似乎不是神話，而變成了我們的眞實。這夢，只不過如此短暫的一瞬，而那每人夢中一生的掙扎與痛苦的嘶喊，

那些與疾病和死亡纏鬥的片刻，那忽然變成睡牛棚的罪犯的日子，或在饑餓邊緣，踩著豬糞，等待開釋與平反的日子；那不知如何才能找到平靜的、可怕的、人與人間的傾軋與仇恨，……剎那間，都在這陽光耀眼的海濱被擠扁，成爲一連串不再糾纏著我們的「黃粱一夢」。

我們醒過來，在陽光下、海風裏，暫時無憂地相視而笑。

「這是眞的。」三妹說：「我在被窩裏就看到了日出。」

「這是眞的。」我當然知道。北戴河的海水這麼淡淡的灰藍，灰藍，接向遠天。我不但在朝東的這房間裏看，而且去外面那寬平整潔的海邊馬路上走。我把每一瞬間的美景記錄在日記本上，照相機裏。記著那極美的落日，如何一下子染醉了密林，又從林後透過來，照射到「開灤礦務局休養所」樓上窗子的一方玻璃，使那窗格倏然像是點起了一盞橙紅色的燈光，然後那橙紅色又漸漸隨著落日褪去。這時，海風就會涼涼地把空間吹成一片淺灰，海水就格外的平遠與悽愴了。

聽我說了幾次，黃昏的海水和海風，使我覺得淒涼之後，三妹就在散步的時候，故意避開海邊，繞道而行。但是我又反對，我說，淒涼是因爲它寫著我當年和幾天之後的離愁。如今我在這裏咀嚼這離愁，讓我感覺到自己是在這裏，眼前，現在，知道什麼是痛，什麼是淚，又什麼是淒美，什麼是夢醒與夢中。

讓我有機會在這樣的傷痛中，去問那廣闊無邊的海水與雲天，爲什麼我們這渺小的人類，要

給自己製造那麼多的紛爭與傷痛。

我要好好把握這時刻，讓我眞眞實實地相信，我們是從四十年的噩夢中醒過來，發現我們重逢在這樣的海濱。

希望不要再讓我們發現，這重逢卻是一夢。

這是我們三個人共同的一項無言的誓盟。讓我們彼此爲憑，彼此作證。我們在這裏醒來過。我們曾從一個年少的日子，走進悽惶的夢，而在年老的時候醒過來，發現那夢只是一個個朦朧的幻境。而現在，在這一九八八年，六月中旬的海濱，涼爽湛綠的日子，才是夢醒後的眞實。

這海濱的日子點綴著許多輕靈親切又平凡的小事。我們買八角錢一斤的西瓜，不好吃不要緊，它是我們重聚的時刻買的。我們買一塊錢一根的香蕉，貴不要緊，它是我們重聚的時刻買的。我們買極美又非常便宜的貝殼粉做的珠鍊，代表著我們這重逢時刻，五顏六色的繽紛。我們一起在陽光中醒來，發現自己仍然在這樣響亮歡樂的「眞實」裡。我們三個，淸晨相約跑去看日出，白天一起去散步。細數那條「東經路」上，淺綠與淺橙組成的欄杆，以及上面那玲瓏的卡通圖案和深淺相間的鮮花。我們坐在石階上默默地看海，這右邊的海十分平靜，那左邊的海萬馬奔騰。白亮的浪頭，一排一排地撲奔過來，消失在海灘上，然後又有許多排，奔湧而至。

我們到各處去找比較可以滿意一點的餐館。而我們發現，它們是令我們「好也滿意，壞也滿意」。當小館的老闆娘，在端午節那天，附送我們一只糯米粽子，來補償她那只有幾條肥肉的白

水麵，我們就只記住那粽子的香甜。我們更不忘金山賓館那家餐廳的炒蒜苔和煎溜豆腐，以及風味絕佳的香片。十一元人民幣一餐，是我們三個尋訪得來的大收穫。市區一家「雙樓餐廳」的木樨肉和炸花生米，配點啤酒，也鮮美異常。

我們會在散步的時候，發現小時候塘沽老家院子裡種的「大麥熟」。那粉紅色野野的花朵，就使我們回到了童年。我們也會爲那一連串滿載著紅磚的、兩匹騾子拉的敞篷車，目不轉睛地一路跟蹤，覺得這樣就回到了更幼年時，在蘆台老家的日子。

晚間累了，涼爽的海風在窗前輕拂，讓我們怡然入夢。而我們相信，醒來時，不會再是天津吉林路三十五號的炎夏，當然，也應該不會再是文革的恐怖陰影和做貧農時的無望生涯。

那天，六月廿三日了。明天，我們即將離去。

下午的時候，她倆在午睡。

彷彿她們仍然是小時候那麼不知愁的。我也仍然是那願意等她們睡穩之後，才有機會審視自己心情的、當年的長姊。

我獨自悄悄出來，沿著「鷹角路」，往「鴿子窩」的方向走。我要向每一株路樹——白楊、楓樹，或蒼松去話別；也要向路邊無數的小花道聲珍重。我心中起伏著那首好像只有在這感情最豐富的時候才最想唱的歌：

**五月的風，吹在花上，**

朵朵的花兒，吐露芬芳
假如那花兒卻有知
懂得人海的滄桑
……

不過，我並不太在意「花兒」是否「有知」，也不希望它們「懂得人海的滄桑」。我知道，只要它們年年歲歲，按著季節開，那就是大宇宙的豪華了。

我要走了。

三妹不只一次地問我，「為什麼你說『回來』，你又說是『回去』，究竟那一邊是『回』呢？」

誰知道？「回到故鄉仍是客」的心情並不十分困擾我。因為我是這樣地知道，「我們生長在這裡」。我是這樣地知道，「每一寸土地都（仍然）是我們自己的。」

無論人們過的日子是豐是儉，我們至少已經不在任何外來侵略者的鐵蹄之下被屈辱。我們也將有理由盼望，大家都可以不再飽受自己同胞的欺凌。

我慢慢地、細心地走到高高的「望海樓」去看海。那裡有比「弧形全景大銀幕」還要寬上三分之二的遼闊視野，讓我細看故國的雲天，細聽歷史的足音與迴響。

下午的海邊，一片空寂。使我想到每晚在枕上聽海潮，都會記起「**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的詩句。

故國總有一份詩意的寂寥。

這份寂寥，也許正是歷朝歷代，憂國憂民的中國人們，在無限低迴的心情中，廣遠的嘆息。而現在，有情的中國人在覺醒，外侮在中國人堅強的抗拒下，漸漸遠去。挾外力以自重的、變相的內憂，也終將被眞正的愛國者所摒棄。

河山如此壯麗。我們的愛，應是一種許諾與奉獻，在這廣漠的河海與雲天之間，永恆的瀰漫與升騰。

明天，我們三個將要再度搭乘那長風萬里的火車，經過莽莽的原野，回到古老的北京。然後，我要暫時再一次揮別故土，踏上另一個「歸途」。

我「回來」，我又「回去」。而我們都已知道，河山屬於我們每一個人。儘管彼此還要各自奔波，但我們的心，都將不再寂寥。

# 十七、萍踪偶聚，長幼有序

從北戴河回到北京，新舊朋友知道我快要走了，很熱心地問我：「要到什麼地方看看？我們陪你去。」而我都婉謝了。

不是我不喜歡北京那些風景名勝，北京是我舊遊之地，故宮、北海、中南海、太廟、天壇、景山……以至於西郊的頤和園，我不是不懷念，但我此行更重要的目的是「探親」。我不想做遊客，而只想和家人相聚。

還有什麼比和闊別大半生的家人再度相聚更快樂？

在三妹那五樓公寓裡住著，過的是家居生活，一種「回到從前」的心情，是那麼溫馨又甜蜜。

我們四個聚在一起，眞是「萍踪偶聚」。怎麼也料不到，各自飄流了四十年，會有這樣一段時間聚攏來，靠得這麼近。好像這四十年什麼也未發生過，沒有經過任何譎詭的政治遊戲，也沒有被迫天南地北，各自東西。

除了小弟這「男生」，住在另外一個房間之外，我和三妹、四妹，住一間。三妹睡行軍床，四妹和我擠在三妹日常睡的小型雙人床上。她睡靠牆，我睡「靠道」。爲怕吵醒彼此，兩人都各自睡成一條直線，照樣是一覺到天明。四妹多年的失眠症，竟然這麼輕易地就好了。她的解釋是，「見到了大姊，一切壓力都已消失。」眞好！我們都回到了輕鬆不知愁的少年歲月。生活的壓力對少年歲月不發生影響——那年頭，就是如此。

每天晚上，安安逸逸地聊完天，不知不覺地入睡。早晨醒來，先是怕吵到其他兩個而不敢出聲；後來，會先是三妹，「哧」地一笑，我也笑了，彎彎手指，算是向她打個招呼。四妹在旁邊伸過手來，拍拍我的後背，原來我們都已經醒了。於是，我們三個，就像當年，一個窩裡的小鳥，吱吱喳喳地開始了這一天的日子。三妹仍是領先下廚，四妹跟著做幫手，我呢？長幼有序，「你別動，你是大姊！」不許我做任何事，只管坐在那「唯二」的塑膠皮沙發上，喝她們遞給我的熱茶。跟著，牛奶也來了，煎蛋、麵包也來了。然後，她們一個坐沙發，一個坐櫈子，聊天。

水泥地被家具佔去了百分之九十，剩下的那一長條，可以掃，可以不掃。家具上擺滿了東西，剩下的那零星空間，可以擦，可以不擦。電視在書桌上，除了新聞以外，可以看，可以不看。北方乾爽的天氣，衣服也不忙著洗。三妹任勞任怨，笑口常開，所有的聰明都用來招待我們，使我們一點也不覺得給她增加了負擔。你不知道她什麼時候跑下五樓去，是爲了買菜；也不覺得她曾經把你放在一邊，而她去下廚房。各式各樣的菜，就好像自動地出現，使你也想不到要

問那些菜用了她多少錢。一向不太關心生活瑣事的我，尤其覺得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日後回想，才後悔自己怎麼也忘了當地的「物力維艱」？

而在當時，我是只享受那四十年不敢妄求再度擁有的天倫之樂。我們唱所有會唱的歌，回憶所有從前苦苦樂樂的生活片段。我們是同一本人生大書裡的主角，我們共同走過分手前那一大段人生之路。現在，我們有機會回過頭去溫習，居然，居然，在心情上，我們都沒有變，而就這麼容易地回到了從前。

我們談父親——的慈愛，談繼母——的改變。也談去世的二妹，和她們所熟悉的，我小說裡的人物。只有偶然，我們才談起別後的這四十年——「你在台灣也曾苦過嗎？」「你怎麼會去北戴河那麼漂亮的地方做貧農？」

「你是大學裡的校花呀？看你現在瘦成這個樣子！」

極少觸及這方面的話題。

也許是因爲怕痛，不敢去碰那傷痕。

也許是因爲不同的遭遇，很難彼此想像。與其去碰那些痛，不如且當它從未發生過也好。

眞正的原因可能只是——時間這麼寶貴，還是盡量把它塡滿了快樂吧！

人，有記著快樂，忘記痛苦的本能。

人，也有把痛苦化爲成就感的天賦。

我們苦過，但我們終於活下來了。那說明，我們幸運，幸運也是一種成就，是不是？何況，能越過險阻，豈不也是值得歡呼？

就像那些當過兵的人，一定會把當時所受的艱苦磨練，當作日後值得誇耀的勇敢與堅強。我們就是如此——既然還活著，「活著」的本身，就是一項偉大的成功。

能在有生之年，回到一個溫馨的歲月，重溫那心情，更是一次可驚的「勝利」。

我本來只打算在大陸住兩星期的。

後來延長爲五個星期。

我誇耀自己並沒有像大多數返鄉的人那麼覺得艱苦，一小部分原因是我把返鄉之旅盡量在最單純的「點」上定位，不貪多，不苛求。而大部分原因卻是這份不變的手足之情。使我無論在日常生活上，還是在感情上，都受到最親切自然的照顧。

誰不希望時光能夠倒流呢？

誰又眞能使時光倒流呢？

而我此次的返鄉之行，卻是看到了這一夢想的實現。

忽然間，我夢遊一般地就降落在「北京城」

忽然間，我找回了失散四十年的、親愛的幼弟與弱妹。

忽然間，當早晨醒來，我會看見四妹睡在我身邊，看見三妹在行軍床上，正在等待我醒來。

看見我一有動靜，她那邊就「哧」地一笑，好像小時候，她十歲，早就醒了，不敢動，怕吵醒大姊，「現在可以了」。那童稚的一笑，就是她快樂一天的開始。

眞好！三妹、四妹、小弟，都回到了我的身邊。而且都還像從前一樣，親愛的手足之情，絲毫未減。

「大姊，明天我們做什麼？」一向效率非凡的「好學生」三妹，每晚臨睡前，就會拿出筆記本，鄭重其事地問我們明天的計畫。

而我也照例是不耐煩地回答她：「嗳呀！睏死啦！明天的事，明天再說！」

「是！大姊！」三妹無奈地收起紙筆：「我又忘了你是個『計畫不如變化多』的大姊。」

本來呀！計畫有什麼用？你什麼時候計畫過我們要在一九八八年六月相聚？我在從台北出發之後，還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見到你呢！

於是，我們不計畫明天。我們只享受「今天」。當下一個天亮到來的時候，發現我們又是在同一個房間裡醒過來，四妹拍拍我的後背，我摸摸她的頭，三妹在行軍床上！「哧」地一笑。醒來啦！天亮啦！我們唱歌吧！

我們享有，我們存在，我們在一起，我們歡笑與唱歌。

這一切，不是昨天計畫的。但它存在，它進行，它留住——在我們快樂的記憶裡。

去北戴河也不是計畫之內的。時機到了，心情有了，事實許可了，我們就去呀！

至於說，那分手的時候，我們暫時不必去想。

既然許多事都可以不經計畫而產生或不經計畫而改變，渺小的我們，也許只需保存一份在萍蹤偶聚的時候，那點永恆不變的、相愛的心，也就是了。

所以，當我們相聚，當我說，去看樹；當我說，去天津，去北戴河；當我說，趁著晚涼，在我走以前，再去一趟友誼賓館後園，看一看那故土夜空上的繁星，我們現在能去，我們就去。

說不定，再過一天，我眞的要走了。說不定，那天以後，我們又只得各自東西。說不定，我會再來。說不定，我再來時，有些事情不一樣了。

誰知道？

我只記住我們曾這樣快樂地相聚。我也讓三妹、四妹、小弟，和那讓我深感無能爲力而又心疼無比的二弟，讓你們記住，我們曾經這麼幸運，在歷劫之後，看到彼此仍然是如此地手足情深。

# 十八、明日水村煙岸



寫「故土之旅」寫了一系列，什麼都說了，卻總還是覺得並沒有完全說出自己內心這滿載、超載著的感情。它們漲在心頭，擠在心底，每當我要分析，它們便不問情由地在一刹那之間，統統化成眼淚，使我不得不放下筆，專心去安撫它們。

而當我終於再可以提筆來寫的時候，它們便都暫時擠在一道感情的閘門背後，寂寞地等待著，等待著我又不知是那一刻，突然想起了它們的時候，它們就又會不問情由地衝出來，化作滿溢的淚，直到我再不得不放下筆，把它們趕回閘門的那一邊去。

我似乎總是要靠那一道無情的閘門，才可以使自己在日常的軌道上，奔馳得合理些。

這已經發表的一系列「故土之旅」，寫的是這次返鄉的我見我聞和我走過、我到過的一些有關的土地。我用盡可能輕描淡寫的筆調來給那五個星期留影。我希望，那就是我四十年後，終於能重返家園的全部記述，寫完之後，應該感到輕鬆，對這樣一次四十年從未夢想過的返鄉之旅，

應該感到滿足。

但事實上，我並非如此。我覺得自己這發表在報刊的「故土之旅」，全部都仍只是繞著圈子寫。這圈子，也許越繞越小，但它絕未觸及一個核心。我不是那種喜歡兜圈子的人。但是這次，我卻一直圍著一個圈子轉，在已發表的二十多篇記述之外，我曾試著寫了三四篇，每篇三千字左右，但那三四篇都只使我自己感到心緒紊亂。寫到一個程度，就會碰上了那道無形的「閘門」，它攔住我的筆，讓我停在這邊；它攔住我的感情，讓它們停在那邊。好幾次，我想衝過去；好幾次，我想讓它們衝過來。但終於我還是只讓我和我的感情，在這閘門的兩邊止步，讓我暫且用「好像我沒經過這四十年」的心情，寫我的「故土之旅」。

這種寫法是很「認命」的。

我習慣了活在這樣一個只有一半可以正視、可以觸及的天地裡。我習慣了不想「閘門」那一邊的事。我覺得這樣比較正常，也比較安全。

於是，我打算就這樣先結束這個系列了。

眞無奈！四十年離鄉在外，自己和家人飽受政治的隔離，再相見時，大家都已老去，父母都已過世，家鄉祖產也已蕩然無存。父祖過去的理想、功業，奮鬥的成果，忽然全部成爲泡影。由妹妹口中所敘述的那避居北京王府井大街陋巷小院中的父親，竟然使我那麼不敢想像。不僅是因爲父親晚年的貧困，更是因爲我未能分擔他的艱苦，扶侍他的病痛。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也應該

仍然因此而爲自己慶幸，躲過了一個譎詭的時代；還是應該讓自己決心踏進這「核心」，問一問，究竟我們這隔離，這痛苦，這無數生命的踐踏，前途的葬送，除了意味著在政治的監控下，從互相敵對到彼此自詡「我方」的成功，和「對方」的失敗以外，還有沒有較深一層的意義。

如果「我們」的成功是如此地值得歌頌，那是不是說，就因爲這樣，所以那許多寫不完的痛苦與眼淚，就都算是有了代價，而可以抵消？

我們這許多的傷痛與損失，是不是就在這一聲「成功」的歡呼中，被滌清了？歷史的鏡頭是不是也應該像美國人回顧自己的南北戰爭那樣，拍攝到那些被犧牲了的、叫作「中國人」的「同胞」？

我應該讓自己明明白白地正視，我爲什麼在一九八八年七月，在再一次告別北京之前，還又獨自坐出租車，冒夏日冷雨，跑一趟天津。我應該讓自己明明白白地正視，在回到台北的這將近一年的時間裡，我放下了其他一切的稿約，專心來寫這故土，而總還是覺得未能寫到核心，什麼是這內在的動力或阻力？

在一生的迷茫中，我要用這篇〈明日水村煙岸〉來寫下我第三次重訪天津的那淡然的孤獨之旅。然後，我或許會讓自己在這屬於一個中國人的、歷經一世滄桑的、失落又興奮的心情中醒過來，讓閘門那邊的感情，有秩序的排列開，向我說明，它們那一些是親情，那一些是友愛，那一些是個人的惆悵，那一些是歷史的回聲。

那天，一九八八年七月一日，我清早五點多，悄悄起床，為怕吵醒熟睡的妹妹，我儘快地，輕手輕腳地走出房門，走下樓梯——外面在下雨。

北方夏天的雨，非常涼，而我忘帶外套了。

我雇一部出租車，直接去。讓我不僅重晤天津，也再一次細看這沿途的雨中村落與原野。冷雨淋濕了我整個的心情。而我知道，以後不會再有這同樣的心情。四十年，隔絕一個心愛的古老家園，卻終於能有機會回來看它，這心情，是史無前例的。

天津，並不是我的家鄉，但事實上，再沒有另外一個地方，比它更是我的家鄉。儘管那裡並沒有一個住處眞正屬於我，但它卻寫滿了我全部人生中最難忘的歲月。我在天津讀書，在天津做事，在天津做難民，在天津過我華麗又青春的日子，也在天津品嘗各樣的別離。

在天津，過去的親情吸引我，它讓我記起每一個和父母在一起的日子，包括直奉戰爭時的逃難，考初中時的火車，住在父親讀書時代住過的「泰隆棧」，看那如同武俠小說裡的佈景一般的舊式客舍。以及我居然就那麼自己決定要遠行了，和父親在久大精鹽總公司那短暫的話別。

我幾度經過位於舊法租界的這公司，遠遠地投注我的視線在它那大樓前門頂上的星形標誌，以前是白色和藍色，現在變成了單調的紅，但在我心情上，仍然不知不覺地相信，父親還是在裡面辦公，而我小時候隨父母在這裡避內戰，也避外患的日子，也像仍在眼前。

故土的風砂吸引我，在公路車站買到的「煎餅餜子」，明明顯顯地挾帶著風砂，我毫不介意

地把它吃下去，因爲我是在這樣的風砂中長大。它們看見過我的少年，我的青春；它們知道我的快樂，我的失落，與我的離愁。

無限的傷痛與感懷吸引我。它們使我渴望能沉潛在一些永不再來的歲月裡，讓我回顧那些至今難忘的人們。他們是我的同學，我的朋友，我的同事，記錄著我的一些如同過眼雲煙卻又濃密無比的感情。我們曾經一起度過內戰與外患，曾經一起爲國事熱血沸騰。。

那些去維斯理教堂或猶太會館以及大光明戲院聽音樂會的日子，一次又一次，記錄著我人生夢想的褪色，以及那不同的衣香鬢影，和屬於音樂的人們。

抗戰期間，做難民的生活中，仍有機會分享別人的一場電影，間接聽會了所有那一時代的流行歌的悽傷與甜美。白光唱的「寂寞的歌人」和「你不要走」，詩意的頹廢，爲我那與繁華隔絕的青春做了奇特的注腳。很不諧調，但很直接的那麼一種現代式的組合。

也許沒有人相信我會唱那麼多的流行歌，包括韓蘭根唱的那首「春天裡來百花香……沒有錢也得吃碗飯也得住間房……」那簡直是一首乞丐歌，而它所代表的時代意義卻是那麼鮮明，當時的年輕人對這世界抱不平的基本心態，可以從這裡得到一分說明。

高占非、王引、李香蘭演「萬古流芳」的時候，多麼神氣！他們把鴉片毒害和林則徐演得那麼逼眞，影片中的插曲又那麼動人。日本人藉這部影片反英反美；我們卻由劇情中體會到中國人一致奮起的呼聲。

我是多麼熱愛那在樣樣的國仇家恨中，被攫奪又被收回，被收回，又被攫奪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粒風砂，每一株從前的、或現在的樹木。它們都寫的是我們國家世紀的悲歡。而我們都曾奮鬥，都曾吶喊。我們年少時的遊行和請願中，沒有一絲一毫是爲了自己，我們深愛那土地，渴望戰勝強敵，恢復國魂。

我所愛的是一些人，而又不僅是一些人；是一片國土而又不僅是一片國土。如果不把我這麼深濃的感情加上去，我的反應會輕鬆些，冷靜些。但我是帶著身爲一個中國人的一生的感情，去重新審視自己與這片國土之間，一生的離合悲歡，我下筆要寫它的時候，是那麼難以使自己冷靜。

我的感情「超載」得那麼厲害，使我多少次，擲筆離開書桌——「不要寫了！你太激動，不要寫了！」

於是，我把所有超載的感情，慢慢地交給外面亞熱帶的春雨與春風，交給人潮與車陣，交給國父紀念館外，那長了一些新葉的楓樹，讓奔忙的現實歲月，來給自己的感情「降溫」。

也許，我就要這樣來結束這一系列的「故土之旅」；也許，我始終沒有辦法使我那「超載」的感情，化爲理性的文字；也許，我會只當我不曾那麼激動過，而掉轉筆鋒，先寫一些可以抽繹出來的文字。

但我仍希望你可以了解這屬於我們這一代中國人的、世紀的悲傷。它是千千萬萬種感情的混

合體，化作了千千萬萬種成份所匯成的淚。你無法分析，你無從追問，我只能告訴你的是：

如果你曾經向你中年的父母揮手道別，你曾以為自己有機會去追求一個夢，而你準備日後能把這份絢麗，完全地奉獻在你父母的面前……

如果你忘記了自己的白髮蒼顏已不允許你再像孩子一般地在歷劫後的父母膝前哭泣。……

如果你曾經愛過，又曾經失去過，而又有機會重新拾得，卻終於無法重拾過。……

如果你曾經屬於過，又曾經分散過，而又重新相聚，卻終於無法眞正相聚過。……

如果你有一生的感情要奉獻，卻終於發現那傾圮的心之殿堂已經無法容納你的奉獻，而你只能在外面的廊柱下徘徊，然後在西風殘照中離去過。……

# 我是過客



# 十九、螞蟻愛國

一九八九年，從二月開始，由零星的新聞報導中，開始嗅到了有事件在醞釀。

中國人對外力的敏感度比其他國家的人大得多。兩岸開放往來，不僅對中國來說是大事，對世界來說，也是大事。中國人本身所關切的是，這國家究竟能不能「分久必合」？世界所關切的是，萬一這國家竟然「合起來」了，對世界會造成怎樣的威脅。

不可諱言，台灣的財富與科技，加上大陸的人力與資源，會使這個國家太強，因此一定不能使外人甘心坐視。

「天安門事件」是逐漸的，多方面的；有心的與無心的、有形的與無形的、各種力量與因素所推擁而成的。天眞無辜的一些人在「捨生取義」，爲國家爭取福祉，不知道這愛國的行動會失去控制，會發展成或「被發展成」舉世矚目的慘痛事件。它的結果不僅是天安門廣場的血跡；也不僅是世界對這國家的大肆撻伐；它更是海峽兩岸關係的嚴重倒退。剛剛迸發出的一點希望之

火，瞬間歸於熄滅。台灣又把使用了多年的反共口號重新找出來爲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們鳴不平，捐錢、捐血，熱情洋溢，儼然要一舉把那邊的「政權」推翻。

有人說：「我們希望推翻那『暴政』，希望了好多年了。如今眼看可以『裡應外合』，豈不是大好理想的即將實現？」

但是，在衆人再一次的高呼「打倒」之際，不由我們不沉下心來靜靜考量，「如果眞的裡應外合成功，把那『政權』推翻了，誰去取代呢？誰可以去整頓呢？」不要忘記那一千多萬平方公里廣大的幅員，十一億的人口，複雜的民族。單憑一些天眞的理想就可以把它們「捏」在一起嗎？如果沒有人可以有效地去取代，那麼，這動亂的結果就不僅是「群雄併起」，「四分五裂」，而且將會是世界列強理想的大實現，他們要用實際行動來把這老大中國瓜分了。他們盼望了好多年了！

那時，高倡反共的人們是不是就可以歡呼慶祝了呢？我站在一切言論與行動之外，獨自惋惜與憂傷。

一九八八的好景迅速消褪。一九八九，我和許多人一樣，中止了返鄉的行程。

到外國去看看吧！看這世界是如何地在幸災樂禍之中。

我坐飛機去美國消愁解悶。

坐在我旁邊的一位來自新加坡的西方人，談起天安門事件，滔滔不絕，痛責中國政府用坦克

車對待自己的民眾。我聽他談論得夠了，不得不問他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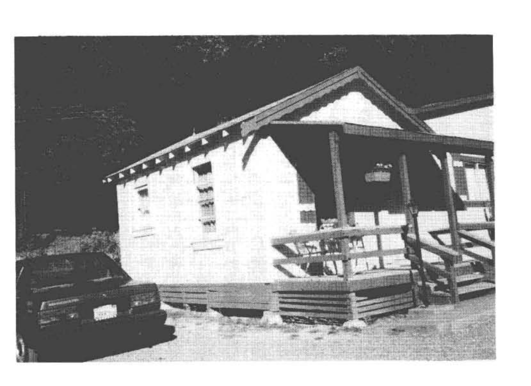
「你知道不知道為什麼在這次事件中，有些青年領袖人物可以那麼幸運地活下來，而且可以快速地拿到了美國或法國的簽證而逃往國外？」

他好像突然被我問住，驀地沉默下來。

我八月底到美國，九月初，女兒拿了兩星期的休假，和我一同去旅行了落磯山區十個州。日本製的 Nissan 小汽車，非常安全，盤山越嶺，毫無困難，一路從亞利桑那沙漠的酷熱到科羅拉多山區天候的「喜怒無常」；懷俄明州那杳無人蹤的公路上，三個小時使我們如同掉在海裡一般的傾盆大雨。蒙他那州明亮的北緯四十八度，花如綉，草如茵的醉人風光。巧「遇」黃石公園，從微雪到山路上的大雪。以及「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峰聚」的「愛達荷州」。我一路欣賞那純美國式的、如同聖誕卡或翻譯小說的異國山水之美；一路想的是我那苦難的，一直還在被欺負著的中國。我的筆記本上又是愛國詩又是愛國歌，又是從年輕時代記憶深處被激發出來的浪漫故事。我對旁邊的女兒說：

「你們年輕一代無法想像我們對那國家的感情。」

女兒點頭承認。她在美國十年了，工作愉快，福利又好，無憂無慮。她曾在來美國以前，從印度去過大陸。她對大陸的印象，從地理書上的「考古題」跳到唱歌教材中的「打倒俄寇，反共產」及「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大陸對她們來說，只是「共匪」，「落後與貧窮」。在去過



美國加州「紅木林」小木屋。

1989年，兩岸剛剛攜手又被分開，各種互相敵對的口號捲土重來。

唉！既然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只得把錢花在外國。

大陸以前，大陸在她們心中幾乎「落後」到「連馬轎車都還沒有發明」。兩岸開放以後，有一位代表少年體操隊的學生到大陸去，在答覆記者談他來到大陸的感想時說：「來到大陸，腳下踩的是地理，眼睛看的是歷史」。簡要而富機智的回答，引人激賞。也說明他所曾學到的關於中國的一切，都只是來自書本。而我們這一代不是如此，我們腳下踩的是鄉土，眼睛看的是滄桑。

和小女兒一同旅行是我最樂享的事，我們有相同的不拘一格的作風，喜歡到處跑，往往到了旅程將要結束時，會忽然發現「錢不夠了。」這次更是。她的信用卡不敢再冒「失信」的後果；我的現鈔只夠再住兩次汽車旅館和沿途簡單的便餐。在手頭拮据的情形之下，女兒開玩笑說，「我們就近到雷諾城去賭博，好不好？贏一百萬美金兩人分。」

我說：「好啊！你拿你的五十萬，我把我那五十萬捐給大陸。」

「捐給他們做什麼？」

「去蓋廁所，大陸最需要改善的是廁所。」

「那你可千萬別讓人家刻字紀念，說『這廁所是羅蘭捐的』。」

兩人大笑：「那好，我不捐了，咱們留著下次旅行。」

一番愛國心就此打住。

女兒後來才又加了一句評注：「你們這一代也眞是太愛國了！不抱怨那廁所，還想自己出錢去捐。」

我們這一代中國人眞是如此。

我們不是沒有心願，只是不知怎樣才能達成。

有時走錯了路線還會獲罪呢！

說的也是，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們在台灣的人如果說愛國，會有好幾種不同的解釋，也會有好幾種不同的罪名。如果你說你「愛中國」，那你是「愛共匪政權」。如果你說你「愛台灣」，那你是要「搞台獨」。

什麼也不要愛就好了。

其實，這也不難，有時我就想像自己是一隻螞蟻。由「萬物之靈」降爲「萬物之一」。然後我就明白，如果你看到有一隻螞蟻忽然說它要「愛國」，那你一定覺得這螞蟻是瘋了！

很好笑，是不是？

於是，我繼續準備把錢花在旅行上。

一九八九，我沒回大陸。

把錢花在外國，才不會得罪任何一個中國當局。

# 二十、「人民大會堂」開會小記

一九九〇年，局勢穩下來了，亞運在北京舉行，仍然在海峽兩岸同時受到關注與掌聲。

我用「隔了一年」的心情回去再看北京。三妹從「柳蔭園」搬到了「稻香園」。新申請到的房子，離頤和園近了，離「齊白石」遠了。這新居有電梯，三妹不必再爬五樓。缺點是失去了來自天然的風涼。

車輛多了，個體戶與夜市到處可見，街角兜攬換外匯黑市的人也增加，而且也公開得多了。旅館職員不再那麼客氣，來自外地的客商不再使她們覺得稀奇。一種說不出的由「發展經濟」而帶來的惆悵在空氣裡飄浮著。

我用在大陸收到的版稅人民幣坐計程車來回跑天津，這是我唯一可以用人民幣換來的大享受，很奢侈的。我是「台胞」，住旅館和買機票，依照規定只能用外匯，不能用人民幣。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我參加了大陸首次邀請的「婦女讀物與婦女形象研討會」。這會的主題

有點不著邊際，我想，他們主要的目的是要辦一次兩岸婦女作家與出版家首度的聚會。「會」的意義比「研討」的意義大得多。

剛好，我被迫離開了長達卅二年的廣播工作，既不必再爲出國請假或錄音；也不必再有什麼政治顧慮。而且以我那時的心情來說，我正是想要讓自己「有約必應」，盡可能把握機會，多做一點事情。

說也湊巧！我七月份離職，八月份去美國，九月份華航邀我參加他們首航南非。眞快樂！我要證明自己那「離職」不但不是損失，而且是收穫；不但不會消隱，而且是給我機會，讓我超越。我早就該超越了，我太保守了。

我們住在北京郊外的「龍泉賓館」。我把三妹找來陪我，言明她的費用自己負擔。我們應邀而來的除來回機票之外，是全程招待。

開幕典禮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得到這通知的時候，已是頭天晚上。

在「人民大會堂」？初聽有些不太習慣。但是，再一想，有何不可？

回想一九八八，首次返鄉的那一年，我還不能像現在這樣的「無官一身輕」。那時候，不要說「人民大會堂」會引起我敏感的反應；聽到「統戰部」也會使心理上的「警鈴大作」。那第一次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三妹說：「統戰部要請吃飯。」我立刻拒絕。過了一天，她說：「對台辦

請，去不去？」我說：「對台辦可以。」三妹笑了：「對台辦就是統戰部，什麼是統戰部。」這我不在意。回去可以交代才最要緊。我才不管什麼是統戰部，什麼是對台辦。

那是第一次返鄉，反應不同。這次連「人民大會堂」也不敏感了。眞是「世事多變化」！

次日從龍泉賓館出發，我們是一大一小兩部車，前面「哇啦哇啦」一路響著的是警車。我起先還以爲是湊巧碰上同路的，那知是爲我們開道的。「眞拉風！」我開玩笑：「這下回去可要發新聞了！即使優待台胞，也犯不上動用『警車開道』吧？」

接待人員解釋說：「這是因爲早上交通擁擠，而人民大會堂時間限制嚴格，又有要員應邀出席，所以必須抓緊時間。」

我們的時間「抓」得很緊。抵達之後，先在旁邊台灣廳休息，然後準時到另一個廳開會。

昨天晚上主辦者就告訴我了。開幕典禮上要由我發言。

提起這「發言」，有一段小插曲，不能不記。

我這作了三十二年廣播工作的人，對「發言」有點「掉以輕心」。同時也是因爲趕了一天飛機，見面的人又多，只顧交際，到了晚上，還要忙著和妹妹暢叙家常，已經非常累了，一心以爲，反正明天隨便應酬幾句，說幾句場面話，沒有什麼要緊，所以很輕鬆地睡了。

那知剛剛睡熟，就被敲門的聲音叫醒。我反應快，趕緊到門前去問是誰。外面回答說，「是醫生，要看羅蘭女士。」

我有點生氣，說，「我沒有找醫生，你弄錯了！」

外面說：「不是，我們是來給羅蘭女士量血壓。」

我認眞生氣：「我沒生病，量什麼血壓？」

「我們是上面交代，要好好照顧羅蘭女士的健康。」

我把門開開，鄭重其事，嚴肅地告訴那位年輕的女醫生：「我沒病，我不需要照顧。我不用量血壓。」

她擠進來，我把她推出去：

「我要睡覺，你出去！」

三妹走過來陪著笑，替我圓場：

「對不起！我姐姐身體很好，不用麻煩啦！」

「但是上面交代的──」

我客氣了一點，但仍然把她推了出去：「謝謝，謝謝，我要睡覺，太晚啦！」

她只得出去了。

每逢這種情況，三妹必定一面笑我，一面責備我，一面提醒我──「人家是好意，你不該這麼不客氣。」

我看看錶：「那有半夜一點來給人量血壓的？本來血壓不高的，也被吵得高了。人家剛睡著

嘛！」實際上，我的心理因素是：「憑什麼以為我需要量血壓？我又不老！」

抱怨著，三妹回到床上去睡了。我本來以為也可以倒頭繼續睡的，卻不料，明早的「發言」兜上了心頭。

「不對呀！這是北京人民大會堂。這是兩岸開放之後，我們第一次在人民大會堂開會，這是我第一次在人民大會堂發言。大衆傳播媒體會來採訪，我不能不謹愼些呀！」

這一「謹愼」，睡意全消。開始構想起發言的內容來。

光想還不行，怕睡一覺以後，明早當一場夢，又都忘了。索性起來寫大綱吧！

看看三妹已經睡熟，不敢開燈。只得起身走到放暖瓶和茶杯的木架旁，就著那一盞小小的「夜燈」，在筆記本上，寫了三條大綱和一小段導論。「立場」的問題不難。只要站在「中國人」的立場說話，就不會有錯：

「……四十年來，兩岸的發展雖有先後時間上的不同，但在所經過的歷程和所遭遇的問題上，卻還是同步的。特別是在發展經濟這方面……」

我引〈孔子適衛〉，《論語》上這段最切中兩岸的時弊：

「孔子認為，衛國的人口多了，要先『富之』。『富』了之後，就要『教之』。『教』什麼呢？教『義利之辨』，要見利思義，而不要見利忘義。君子愛財，要取之有道才不會發生問題。……」

我最怕我們的國家盲目追求財富，被金錢所汙染。在《天下雜誌》寫了好幾年專欄，談的是古人教訓和當前社會現象的對照。希望大家了解，我們為什麼要戒備金錢。在廣播裡，寫〈羅蘭小語〉，也是教人們戒備金錢。來到大陸，看見一九九一比一九八八大不相同，人們開始講究穿戴，到處開了歌舞廳和「卡拉OK」，我很憂慮。於是就把這憂慮帶進了人民大會堂。我提出三點：

**一、從事寫作的人和出版者都負有社會教育的責任，我們要社會責任掛帥，而不要商業利益掛帥。**

**二、我們不是否定商人的價值，我們可以讓商人為我們服務，卻不要被商人牽著鼻子走。**

**三、我們要做社會的清潔劑，不要做社會的汙染源。**

大綱寫好，明早只需把每一段略做引申即可，這才放心睡了。

果然，次日的發言獲得一致的認同。

我對三妹說，「昨晚那位醫生是老天爺派來提醒我的。祂說：『這兩岸婦女寫作者和出版者第一次正式的開會，由你發言，你不覺得有責任把它想得周全一點嗎？歷史性的呢！』」

其實，坦白講，我去參加這研討會，從開始就有點掉以輕心。因為他們發的請帖非常簡單，普普通通的模造紙，打上幾行字，加上一頁簡單的日程。使我以為那只是大家聚聚。而其他幾位從台灣去的，事先誰也不知道誰收到帖子，更不知道有誰要去。直到要出發的前幾天，才有人告

訴我，廖輝英和愛亞要去。行前湊巧在一個什麼集會的場合遇到，她們正在考慮要不要寫論文，因爲日程上好像只有「發言」，而沒有論文。我說，最好是寫了準備著，不要到時交白卷。

果然，抵達之後，發現要宣讀論文，而且主辦單位要出專集。

丹扉正在大陸獨自旅行，也應邀來參加。還有評論家鄭明娳和中央圖書館的辜瑞蘭女士。丹扉和我屬於「長輩」，應邀發言的機會多，接受考驗的機會也多。不得不使我們意識到在發言時不只是代表我們個人，而也是代表團體，更是在無形中代表著海峽的這一邊。因此特別要「謹言愼行」。

這首次兩岸婦女寫作者的聚會，在遊覽山東各大名勝之後，在濟南結束。以下的行程，你可以隨團回北京再解散，也可以自行安排到其他地方去探親或遊覽。

綜觀我們這次開會及遊覽的日程安排及大小各事，主辦單位十分周到，許多大陸出版界的婦女及新聞界工作人員，遠從東北或廣州與深圳趕來參加，團隊精神可圈可點，沒有凸顯個人的現象。我們這批台灣來客，除五位是作家以外，還有兩位出版界人士參加，大家相處十分和諧。十四天的行程，妥貼精緻，足見主辦者事先作業的細心，值得我們讚佩的地方不少。只是我在海外多年，對大陸同胞習慣上的「敬老」很不適應。在她們想來，對年長的人自然應該隨時服侍，而我們卻是飽受西方「不服老」也「不談年紀」的觀念影響，幾乎每次當她們要來「扶」侍我的時候，我都會覺得有如「芒刺在背」，對她們的善意避之不遑。

大概是我那「反抗」的態度太明顯了，害得我那既要代表我，又要代表大陸同胞的三妹，一路替我道歉及解釋。

眞是無奈！

沒想到，隔絕四十年，在這一點上也出現了如此明顯的文化差異。

其實，即連我自己，也不只一次在文章裡討論過，這種來自西方的不服老的生活態度，究竟有什麼好處或缺點。它固然會由於心理上的「不服老」而眞的可以延長一個人的「中年期」，摒除了過去中國式的過早「認老」，以致四十多歲即已暮氣沉沉的現象。但在另一方面來說，這也是工商業社會摒棄倫理照顧，形成個人孤立與操勞的一大缺失。

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在這方面無形中接受了歐美文化，獨立的年月加長，而老人與兒童享受天倫照顧的可能性就已相對地減少了。

只是這兩者究竟孰優孰劣，也不太容許你主動去做選擇呢！

# 廿一、「海」闊「天」空出版社

我接受對岸全程的招待，共有三次。

一次是前述的「婦女讀物與婦女形象研討會」，會後去山東各文化名城參訪，在濟南節目結束之後，又順道去了南京。第二次是深圳爲我出書的「海天出版社」招待我參觀深圳。第三次是去東北四個城：大連、長春、哈爾濱、瀋陽，也是「海天出版社」作東。他們的目的是「簽名售書」，我的目的是參觀遊覽。增加見聞。

我發現，他們一切行動都要經過「上級」層層審批，出版社也全部都是國營。「海天」遠在深圳，但出版社的社長也是由上面委派。我去的時候，正是剛換了新的社長，據說是因爲過去的社長經營有問題。換了這位從山西來的中年幹部，十分優秀。

由於我要從香港去，過羅湖到深圳。這趟路我沒走過，他們決定請一位住在香港的作家張先生在香港接機，然後由他帶我坐火車到羅湖通關進深圳。

我原來以爲這一定比坐飛機進大陸要簡便多了。其實不然。因爲我們出了機場要先坐計程車

到火車站，坐火車到羅湖。

這樣走法，要通關三次——進香港一次，出香港一次，進大陸再一次。平常坐飛機去大陸，只要在大陸入境時通關一次即可，所以這給了我一次經驗——以後別走這條路線。尤其如果你行李很多的話，那就更加麻煩。

我只有一個小小的提包，卻也已經使我不勝負荷。起初我還客氣，不好意思讓張先生幫我，後來一看，從羅湖過關要走那麼長的路，只得還是接受了張先生的好意。他幫我提著提包走香港人的通道，我卻要上一層樓，走台胞的通道。一切證件幸虧沒在那只提包裡，否則將很麻煩。尤其後來我想，萬一海關要檢查，那位張先生提著的可都是女用衣物。不知會不會很費解釋。

詳細情形我因爲匆匆忙忙，唯恐有失（和張先生走失），所以不太記得。大概以後萬一再走這條路，還是得從頭摸索。

出版社給我訂了「長城飯店」。套房設備相當不錯，使我賓至如歸。深圳的市容像台北近鄰的市鎮，街道卻很寬。

除遊覽風景之外，到出版社去參觀才是此行重點。

大陸的出版社、新華書店、版權公司等地方的建築格式都差不多。一口氣佔四層數十個辦公室的樓面，外加印刷廠，建築很寬大，但很舊。我所見到的包括北京新聞出版署和中華版權公司，以及搬到了六里台的天津廣播電台，東北的各新華書店，都是這樣，霸氣十足地佔著從上到

下的空間。國家管出版，我覺得這是很好的策略。只要不控制思想而又能控制品質，就會比私人辦的容易避免金錢的汙染。

我知道我這想法不合自由世界的尺度，但證諸目前的自由世界，肯自律的出版社時常打不過不肯自律的出版社。淸潔的出版社常常敵不過販賣色情，揭發內幕的出版社。這種反淘汰的現象是由於私人出版社，爲了求生存或求更多的金錢而不擇手段。影響所及卻是造成社會人心的汙染，道德的淪喪，當然非國家之福。所以我反而鼓勵他們繼續由國家管，不要問什麼自由不自由。

至於說，我的書銷路如何，版稅收入怎樣，我的想法是，如果中間有問題，只要國家上軌道，自會有人出面整頓。如果我的書本身沒有市場，我也不去責怪任何人。如果大環境有問題，那當然更不是我這台胞所能控制，所以一切隨緣而已。這次我到深圳來，看到新社長已經上任，舊社長調任總編輯。兩人都相當誠懇，沒有什麼商業氣。

我喜歡這單純的感覺。雖然有人說，那是因爲我自己本身的單純。但即使如此，我也情願保留這分感覺。至少他們做事的團隊精神和負責認眞的態度，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譬如說，他們請我到他們辦公室去聊天。談得十分高興。忽然一位「責任編輯」自動告訴我說，有一件事很對不起。因爲他們未經我的同意，請別人根據我的《羅蘭小語》寫了六本《羅蘭小語賞析》。後來新社長來了，說這樣不行，這是侵害了我的版權。我接過這幾本書，翻到最後



自深圳長城飯店陽台，看深圳的樓宇，這「特區」是非常的現代化了，時間是1992年5月初。

深圳為我出版《羅蘭小語》的海天出版社朋友在聊天中，聽我談到「無論黑貓白貓，只要它能抓老鼠」的名言，其中一人問我說「你看我們深圳是什麼貓呢？」

我一時不假思索的回答說：「花貓」，大家聽了，為之哄堂。

的版權頁，看見每次印數是六萬冊，而我自己的書卻是每次一萬冊。我說：「這確實是侵害了我的版權。否則我的書就不止是每版一萬冊。」對方很抱歉地主動告訴我，「我們要賠償你四萬七千元人民幣。眞對不起。」

我很感動，不是爲他們肯主動賠我四萬七千元，而是爲他們的天眞純潔而感動。當時我曾有一個念頭：「看情形，我書的銷路是非常好，如果版稅照規矩來，我這筆錢可以捐出來給教育界，或其他值得捐助的地方。」

我喜歡他們的單純，但我也非常擔心，以大陸發展經濟的速度與決心，恐怕不用多久，這份單純就會消失了。

四天的深圳之旅，備受出版社的招待。在參觀過後，照例在他們的辦公室裡，鄭重其事拿出毛筆和紀念冊，讓我題字。我已有過在山東沿途勝地名城被要求當衆題字的經驗，不敢再爲自己久已不用毛筆而遲疑，反正詞句現成，只要別太失常就行了。

我這次題的是：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他們似乎很接受這「一語道破」的幽默，拍手大笑著道謝不已。

《羅蘭小語賞析》的問題就此結束。四萬七千元的賠償在第二年經過版權公司，扣除百分之十的手續費及百分之二十的所得稅之後，進入我的帳戶。

我反而有點不忍心讓他們如此賠償。

雖然後來我在東北的各新華書店，都還看到有這《賞析》在架子上陳列著，但他們說還來不及收回，而且保證「現在就收」。

中國太大了，深圳在南方，距離各處都路途遙遠。也難怪有一次我請版權公司爲我抓盜印的時候，負責人說，「你要給我們路費。」

這就等於說，警察抓強盜，得讓事主出錢。

好在後來他們也沒再做此要求，大概是想起了那「百分之十」的代理費，而且著作權法也越來越訂得嚴格。多少產生了一些嚇阻作用吧？

# 廿二、海內存知己

離開深圳的前一天，海天出版社爲我安排的活動是在深圳市立圖書館的一次座談會。深圳這圖書館建築很新。我們在一間大廳裡座談，到會的有當地各界人士，圍坐在橢圓形的會議桌四周。另外靠著三面牆壁安排了許多座椅給臨時來參加的讀者。

參加座談會的人好像是各界都有。主持者是出版社的前任社長，現任總編輯。雙方致詞完畢，由他依次介紹來賓，然後輪流發言。大陸人們的發言很有特色，不但歷次在各地所參加的座談會給我這種印象，即連各種餐聚、茶點小聚之類，做主人的或當地來賓們的即席發言，也都有同樣的特色。他們每次講話都彷彿事先準備了講稿，站起來鄭重其事，一字不苟的大聲宣講。所講的內容一概是層次分明，有頭有尾，結構十分嚴謹。這次的座談會也不例外。主辦者和參加者在發言的時候，一致是清朗明晰，音韻鏗鏘，絕無廢詞或廢字，更不會「嗯嗯啊啊」。我覺得這非常不像當年的中國。他們彷彿是經過嚴格的訓練，只要發言，就必須如此鄭重其事，措詞嚴謹

而意義鮮明。

我實在很感訝異，不知道爲什麼連參加座談會的讀者們發言，也是如此的「精緻」。他們每人都好像在事先花了至少一兩小時的時間，來準備發言的腹稿。由於他們發言那麼鄭重其事，我這來賓反而有點像是專程來接受「讚美」，而不是來討論問題，因爲他們並不發問，而只是把他們對我作品的感想表達出來而已。由於他們每人都要「宣讀」五分鐘左右的稿子，反而使我沒有什麼時間發言。除去開始時的一段致詞之外，我就只有做個聽衆，沒有機會交換意見，時間就已到了中午。

當主持人想要結束這座談會的時候，我發現對面坐著的一位穿制服的軍人，一直很專心地聽別人講話。他周圍的人們都講過了，卻沒有輪到他講，而我覺得他彷彿很希望有所表達的樣子，於是就向主持人說：「爲什麼不請這位先生講話？」

主持人說：「時間恐怕不夠了吧？」

我說：「我們下午又沒有別的活動，時間有什麼不夠的？請他講講嘛！」

主持人大概沒想到我這來賓忽然反客爲主，「點名」請人發言。遲疑了一下，覺得也沒有什麼理由堅持，只得帶點無奈地請那人發言。

那人很高興地站起來，把他們「隊裡」如何愛讀《羅蘭小語》，如何人手一冊，以及他和隊裡人們對這本書的感想告訴我，同時也表達了對我來到深圳的歡迎和高興。同樣的，他的發言也

是音調鏗鏘，措詞嚴謹。

他是一位武警，在附近的皇崗檢查哨負責邊防。

我事後猜想，主持人大概因爲他是穿制服的軍人，怕我這來自台灣的訪客有什麼顧忌，所以不想讓他發言。卻沒想到我這做過多年教員的人，由於職業習慣，可以一眼看出下面座位上，究竟有誰想要發言或發問。

說實在話，我很爲他們的發言而感動。我沒有想到大陸有這麼多不同職業範圍的讀者在看我的書。而這位武警先生英姿煥發，表現出相當的自信。能聽到他的發言也是值得高興的事。

座談會後，大家走路到附近一家餐館吃中飯。飯後在回旅館的途中，主人忽然告訴我，那位武警先生剛才和他的部隊通過電話，部隊希望我能在次日清早八點鐘去他們那邊講講話。

眞意外！會有武警部隊請我去講話。這可是一個很難得而且很特殊的機會，我很愉快地答應了他們的邀約。

次日清早離開旅館，出版社的社長和編輯部朋友一行人坐車陪我去「皇崗檢查哨」的武警部隊。路上社長暗示我，「隨便講點輕鬆的話題即可」。

我知道，他可能是怕我忘記這是海峽兩岸少有的接觸，說話總得小心一點。

我請他放心，並且告訴他，我所要講的題目是「人人都可以是作家」。

車子抵達，武警先生和其他幾位官警在門口接我。上樓之後，在一間長方形的會議室入座。

深圳和香港緊鄰，經貿發展迅速，果然都已反映在各項建設上。這幢建築十分新式，家具質料也好，佈置相當高雅。長長的會議桌上擺著水果和熱茶，還有冷飲。

我的講題很容易發揮，而又絕對不帶任何色彩。大意是說，每個人都各有不同的生活經驗和感受。這生活經驗和感受，就都有可能使每一個人有機會成為與衆不同的作家。我的生活經驗使我寫出我的書。你們的生活經驗也可以使你們寫出你們的書。當然所謂「寫書」，它最初的動機也並不一定就是為了出版；也不一定是要成為作家。在提筆寫作的時候，可能只是為了要有所發抒而寫，目的只是把自己的生活經驗與感想忠實地寫下來。而在動筆抒寫的時候，你就會得到寫作的快樂。在你一面寫，一面回顧自己經驗的過程中，你會變得比當初身歷其境的時候客觀而理性，能從中發現它對你所產生的正面的意義。如果因此而進一步帶給讀者一些啓發，那就是更具有建設性的了。

話題雖然簡單，大家聽得卻很高興。一種以個人為出發點，站在全人類立場所出現的「一見如故」的感覺，在我這習慣走南闖北，到處認識新朋友的人來說，這感覺是十分熟悉而且是可以預期的。

在皇崗檢查哨和武警部隊一面吃水果、喝茶，一面不拘形跡的聊天，眞是難得的經驗。告辭時，大家出來送我，殷殷道別，輪流過來和我一同拍照留念。深感人生際遇千變萬化，難以事先預料。這在三年以前，豈是我們所可想像？不要說到他們部隊去演講，就是單單提到「武警」二

字，都唯恐干犯禁忌，而避之唯恐不及呢！

當天的講題雖然平淡，但也許就因爲這平淡，反而讓習慣了嚴肅話題的他們，覺得溫和而親切。想像在這以前，也不太可能有作家（特別是來自台灣的）到這裡來告訴他們「人人都可以是作家」。相信這些年輕人在聽的時候，每人心中都可能開始在尋找自己的生活經驗，看是不是可以寫出一些作品來表達一下。我深信這給他們帶去許多快樂及飛揚閃亮的念頭。

果然，回到台北之後，隔了一段日子，我眞的收到一篇來自上海的年輕人的作品。這位年輕人從當天參加這小型聚會的人們之中，輾轉得知我的談話內容，於是就眞的著手寫他自己的經歷了。不過，我並不想給他回信。雖明知他可能會爲了沒收到我的回信而感到失望，但我相信，許多事都最好是在適當的地方止步。作者與讀者之間也是如此，何況我們至今還是隔著一個台灣海峽呢！

寫文章的快樂確實不少，「**海內存知己**」，就是快樂之一。在一九八七以前，我作夢也想不到自己會有那麼多大陸的讀者，而且他們分佈得那麼廣遠。我收到的來信之中有廣西壯族的；也有新疆烏魯木齊的。東北當然更多。新疆那位愛國的、關心中華文化的讀者寫信來說，他把我的《小語》抄了兩百多條，分送給當地的人，認爲大家都有必要好好發揚自己的傳統文化。我爲他的熱忱十分感動，腦中所迴繞著的一個問號是，「不懂著作權的人們，眞的有什麼值得責備的地方嗎？」

中國大陸地方太大，許多現代商業社會的觀念，還不會很迅速地傳佈給他們而暫時爲他們保留下一份純潔與天眞。他們只知道把自己讀書的快樂分惠給別人，認爲這是最有價值的工作。這位讀者寫信給我的心情也是那麼單純熱情，而且十分代表著傳統中國人對「書」的看法，他的傳抄「羅蘭小語」，並不是爲了盜印圖利；而是自己花時間去謄寫，以便贈送，分惠別人。

我珍藏這些來信、文章，與照片。「四海之內皆朋友」，是寫文章的人最可貴的收穫，我用坦誠的心情對待家鄉的人，他們也以坦誠來回報。人之相處貴在心靈相通，即使相隔幾千里，即使有多少後天人爲的意識型態的不同，又有什麼不能超越的呢？

兩岸開放以後，這幾次應邀去家鄉訪問或參加座談，官方與民間主辦的都有。這邊朋友有時會問我，「你談話的時候，採取什麼立場呢？」

「立場不難，只要站在中國人的立場，爲了國家好，就是光明正大。如果劃地自限，自己先把自己定位在小圈子裡，那別人又如何能對你坦誠相待呢？」

# 廿三、野風呼嘯過關東

曾爲火車寫過好幾篇感想與素描，包括兩岸隔絕四十年後返鄉，從北京去北戴河的那篇〈長風萬里，一睹關山〉。自己覺得對火車的感受，寫得已經夠多了，卻沒想到，這一九九二年八月，從大連到長春的火車之旅，更是一次難忘的經驗。

大連，在遼寧省。感覺上，它旣然屬於東北，應該是天氣寒冷一些。其實，它隔著渤海灣與天津同一緯度。夏末秋初的季節，但覺天朗氣淸。如果不是強鄰侵略的遺痕處處，它的自然風貌是十分開闊而溫和的。

這開闊溫和的感覺，在我們上了去長春的火車之後，才被東北那特有的豪邁所取代。

大陸的火車，寬軌大車廂，車門的鐵階高陡，先天具備的那麼一分粗獷。起步時，卻好像鐵軌上塗著一層油，全無半點滯拗，說走就走。

原來這古老的大火車，還是和它年輕時一樣地舉重若輕。尋尋常常，就此上路。

關東風，越吹越豪壯。列車開出了市鎮，奔向無垠的大地，從此「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我這闊別大陸四十年，「回到故鄉仍是客」的他鄉遊子，這還是第一次來到東北。少年時，對東北的印象，除了地理課本上唸的「人參、貂皮、烏拉草」之外，就是老家鄉親們抽的關東煙葉。再往後，就是日本入侵，中國同胞人人會唱的那首「松花江上」歌詞中所說的「那裡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了。

長長的列車，迎著夕陽，「森林」看得見，「煤礦」看不見。這一切，都不再僅僅是一首歌，而變成了一望無際的「實景」。我的心情也不再是歷來的國仇家恨，而變成了一分嚴肅的關切之情。心中思潮起伏，想的是，這一大片歷盡劫難的土地，終於重回到我們自己的懷抱；這當年日本擅稱「關東州」的莊嚴國土，傲然堅持它屬於中華民族的版圖，依舊是我們自己的旅順、大連與金州。日本當年處心積慮，要使這片大地從僞滿過渡爲「天皇陛下」的另一皇權所在，以爲它眞的可以「蛇吞象」。最後結局卻是不得不偃旗息鼓，退居老巢。空留下一些規劃與建設，提供給中國人接收。天道好還，讓侵略者知道，「我們對這土地所付出的是愛與淚，關懷與珍惜；而你們的出發點卻只是利己自私的佔有與掠奪」。

隔著車窗，面對這片夢土，莽莽田野覆蓋了血痕斑斑的歷史紀錄。許多當年所唱的歌，隨著呼嘯的風，在空中隱現。那「**不怕死，不投降**」的宣言；那「**鎭山河，守四方**」誓與軍人們攜

手併肩的凌雲壯志，迅速翻過仍在我們每一個人生命中存在著的史頁。「**收回我，失地方，萬古美名揚**」。歌聲中，對每個中國人的期許，那麼遙遠卻又那麼眞實而堅定。心情上的欣慰與一生的惆悵交織著隨風而逝的流光，千頭萬緒。卻又明顯地想要告訴每一個人，這一連串織在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心中的奮鬥史。一眨眼，六十年了。這是我們整個的一生。而我們今天有幸來用平穩自信的心情，重新目睹這片大地，把當年「九一八」的少年情懷，倏地拉回到自己的白髮蒼顏面前——一切的辛酸，化作了欣慰。

這班車，二七五「直快」，從大連到佳木斯，斜貫遼寧與吉林。傍晚十八點二十分開出，到達長春時，將是淸晨五點半。列車還要再開行一整天的時間，晚上五點五十五分才可到達終點站。在地圖上看，東北，佔全國一個右上角。但就是這東北一角，邊區一線，火車行程也要開上一天一夜。離中俄邊境仍還有一段路程。

這班車，當地叫作「直快」，沒有空調。我們的軟席卧鋪，上下兩層，四個鋪位。四人各佔一席。

車行疾速，加上從各個窗口撲進來的野風，感覺上是山搖地動。小几上的杯子和水瓶，叮叮噹噹地互相碰撞，一路聲音不斷，與野風的呼嘯匯成一大樂章粗豪的交響。

旅伴們說，剛才上車時，服務員不讓我們從別的車廂走過來是有理由的。「不信你去看看，

各車廂早被擠得水泄不通，連過道上也站滿了人。你只要坐進位子，就休想再走出來。」

確是如此。

後來我發現，如果你要從這一節車廂到另一車廂去，唯一的辦法是先要看好時間，記準你想去的那另一節車廂的號數，在火車停站的短短一兩分鐘內，下車往那另一節車廂跑。當然這需要眼明腳快。如果你自問沒有那麼靈便俐落，那就只好乖乖地坐在原車廂吧！不要去「串門」了。

晚餐時，列車報告，可以去餐車吃飯。

餐車就在我們這節車廂緊鄰，不必下車跑去。但我們還是決定吃自己帶的乾糧，喝點茶水，既衛生又簡便。

慢慢地，天黑下來了。大家累了一天，各自躺在臥鋪上，試圖入睡。

車窗敞著，風太大，東北性格的強風，入夜之後會更增加了它的力度。我們把車窗關上，為了避免悶熱，先是把通往過道的門開著，以為只要臥鋪的燈關掉，就可以安睡了。

車行搖撼中，一時也無法入睡。但見過道上不斷人來人往。那些大個子的東北人，在臥鋪上看過去，顯得格外高大，難怪南方人戲稱他們為「東北虎」。他們有許多是佔用餐車座位的旅客，到這節車廂的尾端去上廁所的。

這我也才知道，我們這間臥車是緊鄰著廁所。又聽說，另一節車廂的廁所壞了，門鎖著，人們只得都到這邊來使用。

起先，是廁門開開關關碰撞的聲音。逐漸地，那廁所的臭味就不由分說地瀰漫過來了。列車的女服務員走過來，大聲責罵著說：「門怎麼不關？丟了東西怎麼辦？」「啪」地一聲把門替我們拉上，跟著又推開了一條縫，喝道：「從裡面把門『刬』上！」

我們遵命把門的插銷「刬」上。這一來，悶熱極了。不得已，一位旅伴和我一同用盡平生之力，把那沉重又銹滯的車窗推上去半寸，讓外面的風可以進來一些。沒想到，就這半寸，風也太大了。只得把車窗的窗帘下角，塞住這縫隙的一半。心中慶幸，這窗帘比車窗略長，否則就這也辦不到。

折騰半晚，門也關了，車窗也開得剛好了，風也不大不小了，杯瓶碰撞的聲音儘管依舊，但到底也無傷大雅，不必去擔心它們有什麼不良後果了。那節奏清清晰晰，開始和外面的風聲與火車開行的節奏融而爲一了。

朦朧入睡之時，慢慢地，所有的感覺就都集中在由廁所傳過來的臭味。起先勉強忍著，後來就開始尋覓這臭味的途徑——既然門關著，它從那裡進來的呢？

哦！明白了，廁所在前，我們在後，風帶著它的臭味，直直接接，就從車窗那半寸的縫隙吹了進來。

關上車窗嗎？不但失去了空氣，而且那臭味並不會因此終止，它反正是無孔不入的，你關不住它。如果眞能那麼密不通風，就更需要空調設備了。這列車，沒有空調。在大陸，我只坐過從

北京到天津的有空調的火車。

勉強睡了兩小時。

躺著一定是離那臭源更近，坐起來會好一些。

於是我索性放棄睡眠，起身靠車窗坐著。還好，我是睡下鋪，還有個車窗可以使我在心理上逃避一下。

我絕對不敢讓自己正面去想到那臭味，更不敢放棄心理上的武裝。我告訴自己——你不能讓自己承認你受不了，你要讓自己裝作若無其事。因爲我知道，在這種情況之下，你一旦承認被那臭味打垮，你將會無法善後，那是一種崩潰。假如你稍微「嬌弱」一點，你將戰敗，那是很可怕的。

車窗提供的畫面是一片夜色。八月下旬，是舊曆七月底，月黑風高，看不見風景。大地隱隱約約，在車窗外以悠然的速度，慢慢地轉著。路過寂寞小站時，那黯黯的燈光，告訴你，當地居民都在沈睡。小站上應當有值班的人，這不停小站的「直達快車」，趁夜經過此間，可能連值班人也對它視若無睹——「天天這時候經過啦！」

定下心來，盡可能在夜色中捕捉一些景物。但只見影影綽綽，有時是森林，有時像屋宇；有時經由列車那忽然轉爲「轟隆隆」的聲音，知道我們正在過河。也有時對面來車，呼嘯著，亮著一些小燈，「皇皇」地與我們擦身而過，像一場碎夢，映現出人間的奔馳如此匆匆，留下許多惆

悵，似幻以真。那驟然閃現又倏地消逝的另一些人的人生之旅，像是迸發幾點無終無始的流星，匆匆劃過宇宙的黑夜，隨即又讓一切掉落在無邊的黑暗與寂寥之中，剩下茶几上那杯瓶輕輕碰撞的聲音，爲人們那種種無奈的旅程，搖落下寂寞的注腳。

我是誰呢？我怎麼會來到這廣漠的、夜色塗滿的、陌生又親切的旅途上呢？假使冥冥中有一隻命運之手，祂爲什麼要把我安放在這樣的一趟旅程中呢？滿載乘客的這列夜車中，有多少心靈是不孤單、不寂寞、不負擔著整個人生的悲涼的呢？有多少人是在回家，有多少人是在飄泊呢？我呢？我是在回家？還是在飄泊呢？

……

眞能看清站名的時候，已經是「四平」了。

「四平」，寫著戰況激烈的地方。當時，豈僅是「多少英雄埋荒塚」；豈僅是，「屍橫遍凍野，血流成冰河！」而現在，它如此平靜！它是在台北可以買到便宜成衣的那同樣的「四平」嗎？我曾想到過當年在青春尾聲中，萬種失落的心情下，偶然從報紙上讀到的「四平」，這就是它眞實的位置嗎？現在它沈睡的樣子好平靜！

我怎麼會來到這裡呢？我怎麼會在這樣的時代，這樣的中國歷史階段，在這種情況下，來到這裡呢？

同一臥車的旅伴都睡著，只有我看見了「四平」。列車繼續奔馳，不捨晝夜。

四點了！

凌晨在漸漸推開夜幕，曙光已現，中國的黎明就是在這不顧一切地奔馳中來臨的吧？

五點半，我們抵達了長春。

兩個小時的睡眠，匆忙又緊迫的行程，使我們來不及「疲憊」，就這樣打起精神，踏上了「長春」那曉色初透的站台。

一切密鑼緊鼓。

當長春讀者問我，「你對東北的印象怎樣？」

我呀！照實說吧！它就像這列夜車。擠迫、緊張，無空調；老舊又粗豪。它讓我在與廁所爲鄰，奇臭難忍。長夜漫漫之中，感覺它拚出最快速度，不顧一切地向前衝。好像說，這就是它的號令：「管它什麼條件不條件！我們就這樣衝吧！」

老大中國不能不這麼衝向前去！

隔絕了四十年，才能到這老家鄉來親自看看的人們，也不能不這麼「衝向前去」。因爲你知道，你不能等一切條件都令你滿意的時候再上路，時間是不那麼仁慈的。你不能不承認，有時就是因爲遲疑與等待，永遠錯過了那疾馳而去的列車。

# 廿四、東北行

一九九二年八月這趟東北之旅，我去了四個城市，坐了三趟火車，實地看到這無邊國土最蒼莽也最富庶的一角。

一路陪伴我參觀遊覽的當地朋友形容東北土地之肥沃，說是：「大片黑土地，一攥一把油」。「攥」音ㄗㄨㄢˋ，是捏緊拳頭擠軋的意思，「黑土地」之肥美可想而知。從大連到長春，從長春到哈爾濱，從哈爾濱到瀋陽，都是坐沒有空調的火車。野風呼嘯之中，但見沃野千里，滿山遍野的玉米田。素不相識的同車旅客分給我們幾條煮熟的玉米，甜糯非凡。

發展經濟聲中，口號之一是要「學深圳」。其實這裡比深圳的潛力豐富萬倍。口號之二是：「拚搏三年，背水一戰，經貿再上一層台階。」一九九二年的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一汽集團」的十二萬員工，正在以「拚搏」的精神，年產五十萬輛汽車。與德國合作生產的「奧迪」，每部廿八萬人民幣。較大衆化的「捷達」，十五萬到十六萬一部。還有一種「解放牌」的貨車，四萬到五萬一部。

我此行是出版社以「簽名售書」的名義邀請；而我的目的是想親眼看看「東三省」。遼寧與河北只一關（山海關）之隔。我卻繞了四十多年才有機會來到。此行一切由主辦者安排，對我來說，當然是最爲方便。雖然別人曾以「挑剔」的口吻替我抱怨說：「其實有比較舒適的火車，他們爲了省錢，沒請你坐。」我卻並未把它放在心上。首先，我是初次來訪，一切陌生，沒有比較。心理上並不覺得這火車有什麼好或不好。其次，火車是我童年夢想的啓發者，我喜歡任何的火車。它們帶我馳過莽莽大地，讓我看山、看水、看田野人家，那就是我最快樂的事。在敞著車窗的車廂裡，和坐在過道窗沿上或暖汽管上的其他旅客聊天，欣賞他們的爽直與粗獷，才更覺得是回到了多年前的老家鄉。

所到的城市，都有當地主辦單位和新華書店的人們到車站來迎接。長春站上還有學生們的鼓號樂隊奏起進行曲，那正是我敎小學的時候，用來帶學生進出敎室常常彈奏的一首音樂。起先我以爲他們是歡迎什麼電影明星的，因爲當地正在舉辦電影節。後來才知道是歡迎我的，而且還遞給我一大把花。我這「台胞」穿著大陸同胞認爲最「土」的「條絨」（我們叫燈芯絨）米色長褲，上身是在南非野生動物保護區買的米色獵裝襯衫，頭上戴著旅行用的藍色寬沿帽。那鄭重其事來迎接「羅蘭」的人們找了好久，才發現這個一點也不時髦的「小人物」，就是他們要接的「主角」。想像他們是抱著那把花轉了許久才找到我，眞讓我抱歉。

我是來旅遊的，我不是要來被歡迎簇擁著的。我沒想過在我抵達之前，人家已經做了許多宣



哈爾濱青年排隊來買書。
「你們應該去排隊買股票，怎麼會排隊來買書？」
這些青年眞漂亮！

傳。後來我發現，不但新華書店掛起長長的布條，歡迎這寫《羅蘭小語》的人；連遊覽車上也是橫貫車身的白底黑字！寫了一大堆的歡迎詞句。（這還是我請來陪我的三妹發現的。我是只顧急於登車，找靠窗的、視野最好的位子，像我在世界各地旅行一樣）。

當地主辦單位對我這「主角」的穿戴很有意見。特別是女士們，因為她們穿得都很講究，而且天天都換新的。我卻是沒有什麼講究的衣服。起初是因為沒想到東北八月份的天氣，竟然比台灣還熱，幸虧當天由台灣出發的時候，所穿的是一件適合台灣風土人情的名店洋裝。在大連下飛機給了她們一個「尚可」的印象。第二天一早，當我要換上白襯衫，深藍套裝衣裙的時候，馬上就被她們善意地否決，說：「昨天那件才漂亮，上鏡頭才好看，別穿這件，這件太普通了！」原來不但要被電視拍攝，出版社自己也全程錄影。

無奈，為了不忍拂她們的好意，我從善如流，換上我的洋裝。以後的幾天，幾乎也只能穿這唯一的一件被她們認可的衣服，去參加「簽名」或「座談會」。好在我也不介意自己穿什麼。旅遊的時候再換吧！

她們眼中的「土」和我們眼中的「土」，不是一個標準。我往返多次大陸，也早已習慣了被我妹妹笑我「只有那幾件衣服」。

倒是每次座談會的內容，比我的衣服「多采多姿」。當地記者問的問題，也因為我比較慣於應付「機智問答」而有所發揮。使我頗有「居然沒被考住」的成就感。

某次座談會上，一位電視記者問我「你能不能用簡單的幾個字，來說明你爲人處世的心得與原則？」

我在回答了另外一位和他同時舉手發問的記者的問題之後，回答他說：「大概可以說是『無欲則剛』吧！」

在另一次的座談會上，有人問我「你離開大陸這麼久，在台灣飽受西方文化的薰陶，怎麼仍然會對中國傳統文化如此的信服呢？」

我回答說：「第一，台灣非常重視傳統文化；第二，我們中華文化是全世界最優美的文化，不能否定。所以雖然多年的歐風美雨，我仍然是只有『一個堅持』。」

全體爲我這「一個堅持」會心大笑。

有人問我此行的目的。回答說：

「借用你們的一句口號，『文化搭台，經貿唱戲』。我來，是給你們搭台。不過我希望你們不僅是『經貿唱戲』，而更是『文化唱戲』。」

有人問：「我們這裡條件不好，你有什麼感想？」

我重覆以從大連到長春的那班直快夜車做比喻，說：「做爲一個中國人，管它什麼條件不條件，能衝的時候就向前衝吧！」

「拚搏三年，背水一戰，經貿再上一層台階。」是他們當時最現成的口號。所到之處，我總

不忘把它引申一下，「經貿上一層台階」，「文化也跟著上一層」才行。

妹妹說我到處宣揚「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和「德者本也，財者末也」，眞「迂腐」！管它「迂腐不迂腐」！既然千里迢迢應邀來了，自己對這世界的憂慮及對國家傳統文化的想法總要有所表達。

兩星期的東北之旅，辜負了他們昂貴的海鮮席，因爲我只想吃白開水泡飯、鹹菜炒肉絲和茶葉蛋。也辜負了他們豪華的歌舞，它們太熱鬧「煩」「嘩」，吵得我無法說話。那首改編成「迪司可」節拍的「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是專爲我這「台胞」演奏的，主辦者遞給我一把假花，說「等一下你去獻給那歌星。」

我沒好氣地把花還給他，說「你要獻，你去獻，我才不去。」

他覺得有點不對勁，卻也不知其所以然地走去把花獻了。

倒是那樂團的年輕鼓手，快快樂樂地走過來，找我給他和他太太在《羅蘭小語》上簽個名。顯三倒四的感覺不一而足。樓上的餐廳燈火輝煌，霓虹處處。我們卻是摸黑爬三層樓梯，踩著又髒又舊又捲邊的地毯，跋涉上來的。後來我對一家廣播電台的訪問記者談到這件事，「從餐廳舞台旁邊摘兩盞燈，接到樓梯上，不就好了嗎？」

那年輕人點頭表示同意我的看法。

這是一九九二年八月。

兩星期的東北之旅，眞欣賞那裡的資源和建設的基礎與潛力。更欣賞那高大爽直的東北年輕一代，他們眞是英俊又善良，而且熱情洋溢，一點也不「酷」。

我對他們開玩笑說：「現在你們排隊來買書；過不了多久，你們會去排隊買股票。」

他們笑說：「不會！不會！」

誰知道？

經貿可不只是上「一」層台階，經貿發展的速度和它超越文化的速度，是同樣地使人來不及反應哩！

# 廿五、我的舅父



我應邀去東北訪問，頭一站是大連。訪問活動安排得十分緊湊，接待的人們之中，有幾位是出版社的熟人，其餘都是新認識的當地人。我為了藉機和久住北京的三妹多多相聚，每次有什麼活動都約她和我一起走走，這次也不例外。

因為主辦單位發了新聞，所到之處就都會擠來密密層層的讀者，行程也就顯得格外熱鬧與匆忙。每天黎明即起，跟著主辦者的安排，分秒不停地趕場，所看到的風景也就都只能一閃而過。新華書店門外掛出大大的海報，號召讀者來買我的書。連遊覽車上也扯開整幅的布條，密密麻麻寫著毛筆字。三妹細心，特別下車去拍了兩張照片，洗出來之後，才知道是在介紹這個「羅蘭」。

也就因為如此一陣哄揚，除了讀者之外，更為我吸引來一位夢想不到的最可貴的親人，使我大大地不虛此行。




八十八歲的舅舅眞帥，他和毌親很像。我在大連巧逢舅父，把讀者給我的花，獻給大舅。忽然想起打油詩「發配到遼陽，見舅如見娘……」，眞是快到遼陽了。

這位親人不是別位，他是我的嫡親舅父——李岱東先生。

那天上午，我在新華書店的座談會剛剛結束，門外由接待人員陪著進來一男一女，來到我的面前，叫了我一聲「表姐，我們是你大舅李岱東先生的女兒和女婿。」

「大舅？」我多年不見的大舅？他在這裡？

天下事就有這麼巧，「踏破鐵鞋無覓處」的大舅，竟然在這天涯海角不期而遇。

我們不僅是兩岸隔絕之後未再相見，我們是從抗戰以前就沒再見面了。而他是我小時候最熟悉的一位舅舅，那時他經常住在我家。

大舅是偶然在電視新聞上得知我來到了大連。

巧的是，他本來並不住在大連。是他在大連的女兒和女婿執意要接他到大連來小住，不得已，八十九歲的大舅才勉強答應的。他到大連剛三、四天。

表妹的模樣很像我母親當年。母親去世時也不過才四十出頭。正是表妹如今的年紀。表妹名叫李承苓，她先生叫范景理。

所有陪同的人都和我一樣興奮。我從十二歲離家住校，跟著是母親的去世和接踵而來的戰爭，我就沒再見過這位大舅了，他是我母親最疼愛的弟弟。

於是，我們邀上表妹夫婦一同吃過中飯（大陸的接待方式是你如有親朋故舊趕來相會，也都主動招待吃飯或遊覽。所以除三妹、表妹夫婦之外，沿途偶有讀者樂意隨著走上一程，也有我當

年的學生聞訊趕來見面，都很自然地成爲他們的客人）。

適巧當天下午的行程要經過大舅住的地方，不必另外安排時間，就浩浩蕩蕩大家一起去到了他們清幽的海濱住宅。

我想像著八十九歲的大舅一定彎腰駝背，步履維艱了吧？那知抵達之後，就見這位清癯的老者站在門口相迎。濃密的白髮，剪得整齊俐落，髮型現代，配著他開朗的額頭，瘦高的身材，寬寬的肩膀。身穿淺藍條紋的襯衫，淺藍長褲。

白皙的膚色，眉目之間，簡直和母親當年一模一樣。比承苓更使我想到母親——好時髦的一位老者！

我把剛剛讀者送我的兩把花獻給大舅。

「不知道會在這裡見到您。」我含著眼淚快樂地向大舅問好。

大舅引我們到客廳坐下，人多，有人必須站在外面，客廳裡的一組五人的沙發和四張椅子都已坐滿。大舅坐在中間長沙發上，讓我坐在他旁邊，他拿著花，和我照相。一面不斷地說：

「我說奇怪呢！這兩天，我心裡總覺得好像有什麼喜事似的。沒想到是你來了。」

八十九歲的大舅，笑起來露出他的年紀，上面的門牙沒有了，說話不太關風。

大舅只表達他的高興，並不像一般老年人那樣儘管問長問短。只說他從晚輩剛剛給他買來的我那小小的作品裡，知道我喜歡道家。

「和我一樣。」大舅說：「我天天看《老子》和《莊子》，而且我比你能幹，我會打太極拳，你一定不會。」

大家跟著他笑。

他指著牆上掛的一幅國畫老虎：「這是我畫的。」

很有神采的一幅立軸。

我知道大舅從前就畫國畫。我小時候也曾跟著他畫過瓶子和梅花。

「我還在練書法。」大舅把他的一疊書法拿給我看，好工整的小楷！「等一下我送你一幅我抄的〈岳陽樓記〉。」

大舅有說有笑，一點也不多愁善感。見了面就盡量把值得快樂的成績找出來大家分享。我百分之百感染到他的輕鬆與靈活，也就完全忘了大半生的顛沛流離。

我們時間有限，半小時的談笑，瞬間就又要分手。告辭的時候，大舅堅持要出門送我們。我看他在門口換上外出的鞋子，那一彎腰就把鞋穿好的動作，比年輕人還要俐落。

大家一一和他握手，道著「再見」。然後魚貫上車，我走在最後。這一陣道別，從頭至尾，大舅沒有一點笑容。他那像小孩子一樣天眞的「不高興我們離去」的神情，使我一上車就掉下了眼淚。

次日，我們坐火車離大連去長春，表妹承苓到車站送行，帶來了一袋字畫，是大舅給我的。

其中有〈岳陽樓記〉，有兩幅國畫山水，一張老虎，還有一幅用西洋油彩在中國宣紙上畫的花卉，旁邊自己寫道：

「油畫從未試過，不知葉脈如何勾色，一笑。」

這幅畫極富創意，我最喜歡，三株黃菊挺立居中，一排小樹和遠山反而在菊花背後腳下，成爲矮矮的背景，設色溫潤生動，眞是別出心裁！

我和大舅開始通信。他無所不談。特別是關於我的老家和我的父母。他少年時在我老家住過很久，許多往事比我淸楚。這位老人家記憶力之好令我驚奇。多年前的小事連人名都記得十分正確。還記得我小時候喜歡吃「大糖」和醬肉燒餅。說「下回你到北京，我買給你吃」。

我在回台之後，曾給表妹承苓寫信，隨便談起「大連山明水秀，氣候適宜，不知能不能在這邊買個房子定居，可以天天看見大舅。……」

承苓回信告訴我，大舅對這件事的意見是：

「這孩子胡鬧！」

眞想不到自己做了一輩子「火車頭」，忽然又有機會被稱爲「孩子」！好笑之外，由衷感到溫暖。

今年六月，我又特地帶著我的大男孩回去看大舅。這次大舅已回到北京，住在他的兒子我表弟家。

我的時間緊迫，在北京只有兩天半的逗留。抵達之後，先打電話去問候，說等我把在城裡不得不辦的事務辦完，就來看望。不知道這一通電話過去，大舅就立刻開始叫家人準備接待我。我可是在外面西化生活過久了，絕想不到老家待人如此隆重。等我好容易把瑣事料理清楚，坐出租車趕到大舅家的時候，他們三代人已經等我多時了。

一大桌精挑細選，費了不少功夫的家鄉菜，老老少少三代「外婆家」的人。大舅坐在首席，我和三妹分坐他的兩旁。大舅對著一杯啤酒又是談笑風生，說到高興處，自發自動唱起京戲來。一面唱，一面給我們講解「板眼」示範。第一齣唱的是「捉放曹」——「聽他言，嚇得我，心驚膽怕……」不但蒼涼有味，表情深沉，而且中氣十足。第二齣唱「空城計」——「我本是，臥龍崗，散淡的人。……」

第三齣換唱青衣「武家坡」——「寒窰內，又來了，王氏寶釧……」字正腔圓，絕無老人家斷斷續續，上氣不接下氣的弱點，使我們激賞不已。

然後他提起剛「解放」的時候，我們老家大地主，怕被清算，各房紛紛藏起細軟寶物，四散投親靠友。他在旁邊「觀賞」：「好東西咧！」大舅說：「你們家的古玩玉器可多啦！」

於是他一樣一樣地告訴我們，那一間有什麼擺設；是那一朝那一代的，屏風及牆壁上掛的字畫是誰的眞蹟……

我們眞聽到目瞪口呆。

大舅連說帶唱，我們邊聽邊吃。飯後，我們怕他累了，不敢要求他多說多唱；儘管意猶未盡，也只得半認眞、半安慰地請大舅休息一下，我們「下次」再來。

大舅很「認可」地放我們走。從容輕便地跟在我們後面走下三樓，來到院子，我們雇的出租車在等。

又一次珍重再見，又一次看見大舅收起了笑容，神情嚴肅地站在一旁看我們走。又讓我們看到他那像孩子一般從心裡不高興，卻又不得不認可的自制的表情，使我心痛不已。

揮別站在路旁的大舅和「外婆家」的人。車子無情地往天津的大路上開。

「我們能不能不分手呢？大舅？」

手上帶著大舅特地給我和三妹一人一張的簽名照片。大舅簽名時，握筆的手一點也不抖，鄭重其事地寫下每一個字，那張五×七的半身單照，神情肅穆。好像說，「這也同樣是我眞實的一面。」

回到台北不久，就又收到大舅的信。滿滿的兩頁，用他勁健的字體寫著，因爲他兒子現在的房子要裝修，他必須搬到另一個兒子那邊去暫住；而那邊的房子不久也要拆了改建，所以他屆時還要再搬一次，到老家那邊的蘆台農場去投靠第三個兒子。

「反正我身無長物。標準的窮人一個。上了出租車就等於到家了。只要保持『殘軀不殘』，活著不拖累別人，就是福氣了。」

大舅對自己這典型的現代老人生活，輕描淡寫。

「**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似乎正是大舅心情的寫照。

而我卻是很怕想到大舅送我們上車時，那孩子一般無奈的、委屈又自制的神情。他給我無限人生哲學的啓示；卻也引起我所有未及表達的，對早逝的母親、晚景淒涼的父親的懷念與哀思。他使我回到一個久已逝去的童年，也使我全心湧現一世的滄桑，種種的奔波與無告。

我感謝大舅把一切的無奈都化作引吭高歌，所賜給我們的歡樂時光；流露著對我們無限的疼惜與關愛，又彷彿讓我們一次又一次讀到他對人間苦樂的注解——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而當我與大舅再一次分手，心中所徘徊不去的更是他那中國哲人式的對人間興廢聚散的無奈與淡然——

**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我好想多學學大舅的豁達與自制；但是，寫著寫著，我還是掩面痛哭起來。

# 廿六、不甘認輸

一九九二年，十月四日。這已經是自一九八八年，開放探親之後，我第八次到天津來了。照例，我住在海河畔的那家古典又現代的旅館。

這旅館的職員都認識我了。不用我提出，即使在房客衆多的日子，他們也會自動給我選個面對海河的房間。

我的目的本來是北京而不是天津。北京才有事要接洽，天津沒有一點事。而我就是要選擇在天津入境，次日再到北京去接洽事情。儘管自香港飛天津的班機有時會誤點，但我不介意，我喜歡從天津入境和出境，我也不介意在香港轉機的麻煩。

香港機場熟悉而混亂。往來的次數多了，我逐漸知道用候機室的第幾號門來記住一些「點」，換錢的地方、打電話或打電報的地方、發傳眞的地方，洗手間的地方，以至於其中兩個餐廳之中，比較沒有煙嗆的一處。

通常，我是選那沒有煙嗆的餐廳一角，來給我做候機時的「家」。在那裡，我可以喝杯啤

酒，吃點花生或自己帶的水果。一面塗寫一些雜感。

等到可以登機的時候，就更是離我要尋覓或是要投奔的地方近了。

這次的天津機場擴充了一些，入境時，燈光暗暗的，要經過一條較長的通道了。機場的職員還是那麼周到，熱心地帶我到出租車的地方，幫我把行李放上車去，幫我開著車門，幫我記住車號，囑咐司機：「這位客人要去利順德。」

好像他是來專誠接我的。

溫暖啊！大半生離家在外，所要投奔的就是一分溫暖。不管這溫暖是來自什麼，也許它只不過是一種氣氛，也許它只不過是一種心情。

這心情，是家的溫暖和朋友同學的溫暖，久遠以前那些工作處所的溫暖，以及那早應隨著時間逸去卻仍徘徊繚繞著年輕夢想的溫暖的「多次方」，相乘又相乘地累積起來的。

總不甘心承認，父親就那樣的不在了。

總不甘心承認，那間「回民餐館」真的就不再是「東興文具店」了。

總不肯承認自己就必須是那麼蒼老，因而應該是成熟又理性，不必夢想在河畔或路上遇到那久已失去的笑容了。

「不承認」是一場悲劇的不甘收場；「不承認」是對時間與空間的抗議；「不承認」是對自己的鞭策——你去努力呀！你去追尋呀！你不是一生都在自己的鞭策下，如此地努力追尋過來的

嗎?你不是從來也不放棄的嗎?

一向，我對失去的東西，是不放棄要把它找回來的決心的，我找回過失去的手套，失去的毛衣，失去的相機蓋子，找回過失去的友情——我會用各種方法去找。甚至我曾因爲在不可能找到的情形之下，卻居然找到了我堅持要找回的失物，而使自己相信有一種「必成」之力，常在冥冥之中幫助我。

我也曾堅決地相信，在有生之年，必可回到大陸。而且一定可以一睹我所嚮往的美麗的「北戴河」。這分「堅信」，在我能重返故土，住進我曾那麼喜愛的地區和那麼喜愛的旅館之後，在我親近過曾經載送過我多少離愁的海河之後，得到了證明。

這樣的一分「堅信」，使我從一九八八年開始，來來回回地跑到一九九二。年終歲暮了，我爲手上還有一張香港的來回票，而仍然想要再去一次。

再去一次，爲了什麼呢?只爲了那氣氛與心情嗎?

大概是吧!不問那氣氛與心情何等昂貴，我都不會放棄去尋找那許多由於歲月和戰亂而使我失去的。

或許，你會說這是徒勞。但如果你知道，我是個從不承認自己會是「徒勞」的一個人。你就會比較同情我，而或許願意幫我去找了。

住在北京的三妹來信說，父親的墓園要繳費了。三妹眞好!她能有辦法把父母的骨灰遷葬到

那只有當地政府要員才能安葬的墓園去。

我一面答應繳費，一面不放棄天津「海大道」和舊法租界花園旁那一帶，那記錄著父親事業的巔峰與谷底的地方。我不承認任何的命定。我不是那種沒有理智的人，我的理智有足夠的寬容來放任自己的感情。它不太限制我那來自感情的固執與堅持，它比較肯相信我有把不可能變成可能的堅持之力。只因爲，我一生都在竭盡心力地給它獻上我的證明。

我眞正是很「奮鬥」的。

在沒有任何背景，孤身一人登上台灣這島嶼的情形之下，我遭受的挫折就從來敵不過我的奮鬥與堅持。

被幸福環繞著的人們，是不會懂得我這奮鬥與堅持之中，是含有著多少不同的成份的，它不是一般的奮鬥與堅持。

我從要證明自己，到不再有必要去證明自己；從小心翼翼地檢討自己，到明白有些挫折罪不在我而要由環境去負責。這過程，我是很足以自豪的。

也許，這造成了我今天一次又一次回到我生長的地方，去尋覓那許多在歲月中流失了的事物的決心。我是不甘認輸的。

你不要嘲笑我，我是不甘認輸的。因爲，我每次去，都比上次更多找到一些——那屬於氣氛與心情的，那令我惆悵的，那眞正需要一個像我這樣不甘認輸的人去證明的。

# 廿七、一拐彎就到

從台北到大陸，要從香港「拐個彎」，不能直飛。我也早已習慣，反正一拐彎就到，沒有什麼困難。

一九九三年四月，這是我第九次到天津。

回來的次數多了，新聞界的朋友再問我感想的時候，反而有點無從說起。第一次回來，是茫然中的興奮，覺得一切都是從前，一切都沒改變。我對一切都理所當然地那麼熟悉。天津北站還那樣，一下火車就有洋車來問：「上那兒？大姑！」河北女師還在天緯路，一拐彎就到。過金鋼橋，走大胡同，過東馬路就是東南城角，日租界旭街就在前面，然後是梨棧大街，接著就是英租界的花花樹樹，一片幽深，我最愛的地方了！

熟悉的感覺一直維持到我那第一次返鄉的第三十三天。夏天的涼雨中，擺脫了一切周圍的關切，我自己走一趟「大局子花園」，忽然之間，發現了自己在涼雨中的狼狽。

我能回家去換件較爲保暖的衣服嗎？家就在那「一拐彎」的地方。

我能回家去吃頓簡單的中飯嗎？家就在那「一拐彎」的地方。

「大局子花園」在雨中，寂寞又幽深，它的對面就是杭州道小學，我教過六年音樂的地方，我能去找到當年的同事們嗎？

我的頭髮被雨澆得又濕又直，我忘穿外套了，披著司機前座的大毛巾。

當我在「一拐彎」那間小店買一瓶飲料，而被店員追上來要我付瓶子錢的時候，她那大驚小怪的神情也把我嚇了一跳，「怎麼拿著就走？嚇死人啦！」她說。

「怎麼啦？我不是給錢了嗎？」我不知道瓶子要押金。

「無辜」的感覺，不是氣惱，而是失落。哦！對了！我是外地人，所以不懂老家的規矩！

眞慶幸我在這之前已經用完全「不拿自己當外人」的心情做了許多重要的事。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居然一下子就找到了位於梨棧大街的可以買到外文書的書店，「一拐彎就到了。」買了要給四十年不見的二弟的牛津辭典。我也一下子就找到了賣打字機的地方，給二弟買了一架意大利的全新的打字機。

眞奇怪！從那以後，就一切都不再在「一拐彎的地方」了！

梨棧大街原來已不叫梨棧大街，海大道也不叫海大道，中街也不叫中街，牆子河道也沒有牆子河。雖然我每次還是那麼像回家一樣快樂地回天津，但「一來二去」的，我越來越不認識路。

到了今年，索性每次一出旅館大門，都得問那久居北京的妹妹：「究竟往左是大營門，還是往右？」

不但問，而且每次都問，妹妹覺得好奇怪——「你第一次來，不是那兒都認識嗎？而且都是你帶著我們走呢！」

不知道！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那年從「紅旗路」回來，還會坐公共汽車呢！其實，從前那有「紅旗路」？但是，我就那麼理所當然地會坐那趟車，而且堅持到了某一站要下來，可以走路回旅館，而且居然就分毫不差地走到了。只是感覺上遠一點，兩個妹妹都走累了，我都沒累。

現在？你問我那趟路怎麼走？我可不知道了！

心理上的吧？

那時是忘了中間隔著四十年。我還是當年的我，腦子裡都是當年的事，所以一下子就接上頭了。心理上覺得沒問題就是沒問題。

四年來，一次又一次地往回跑，以為是越跑越熟悉，結果卻是越跑越陌生。於是，沒自信了——「你熟什麼？你那兒也不認識。」

不知道別人返鄉是不是也像我這樣？我想大概不是。

大概這原因是在於我的記憶力太好了。把從前的事，從前的景物，都記得一清二楚。於是，當發現竟然不一樣的時候，就統統失去了自信，把過去的印象全部推翻，該認識的也不認識了。

這一九九三年的第九次返鄉之旅，或許是我有勇氣用全新的眼光認識故鄉的開始；不過，也許是我仍然甘願不問眞實的天津是如何，讓自己就這樣停留在一個記憶中的天津裡。只因爲我曾經在那樣的歲月裡生活過，我就只相信那樣一個眞實。所以我還是會一次又一次地再來，不管認識不認識，我也還是要自己一個人，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去找。找回從前走過的那些路，證明給我自己看：「你沒記錯！它們都還是那樣。」

這次只住了一星期，我對家鄉的朋友說：「你以爲我走了，我也眞的是走了。但是，我的心還在那每一條『一拐彎就到』的路上。所以不定那天，如果你在路上碰見我，請不要驚奇，久後你就會習慣，有這麼一個人，剛走，就又回來了；而且，剛回來，就又走了。」

# 廿八、這樣一種徒勞

我不明白我今天
爲何這樣悲哀
從前的回憶
怎也不能驅開
萊茵慢慢流去
暮色漸漸襲來
那落日金影
方從山頂下歸
……

我心中不斷地迴盪著這首「羅勒萊之歌」。整個的早晨，心情陷入一種異樣的低潮，卻又滿

溢著來自一生的感情。

我剛從大陸南方的「深圳」回來，腦中殘留著那麼多拔地而起的「海市蜃樓」，虛幻至極。而這邊，一切夢想忽然陷於無限期「暫停」的窒悶，像預示著又一代中國人的徒勞。

我不明白我今天
爲何這樣悲哀
從前的回憶
怎也不能驅開
……

很久以前，唱這首歌的那年月，應該早已從記憶中消失了。

但是，它今天忽然像來自山谷的霧，不知因何而聚攏，而升騰，成爲一大片迷濛。而在這大片的迷濛中，這首「羅勒萊之歌」就那麼空靈縹緲地向我襲來。

在這世界上，我做旅客已經很久了。從幼小時候，純純粹粹的，古老田園的中國；到少年時代，海風獵獵的，工業起步的中國；到西方的一切新奇，排山倒海而來的，新舊雜陳的中國；……焦距集中在我那悲歡錯綜的青春歲月。環境給我的。或並不是「給」我，而只是掠過我或襲擊過我的，就都那樣無法抗拒地織在我的生命裡。

「羅勒萊之歌」，是大戰方酣的那年春天，天津市立合唱團那位女高音團員唱給我聽，而讓

我也跟著她和合唱團的指揮一起走進了這首歌的浪漫與悽傷的。她叫姜敏婻。

姜敏婻，很靈秀的名字；代表了每一個時代做父母的人們對孩子的疼愛與讚美。也代表了在那一段戰亂的歲月裡，注定要被埋葬的青春。任憑你是何等地渲染著憧憬，彩繪著前程，仍然是無法抗拒地踏過那佈滿荆棘的悲歡歲月，未能見到繁花，只能目睹飄落。

「……從前的回憶，怎也不能驅開。……」

這「從前的回憶」，在當時，只是一首歌。到了今天，它是生命中一些飛散又聚攏的史頁。

那二十三歲的年紀，那沈重而又輕靈的，對現實生活的感覺。愛情正以迅疾的速度向我們襲來；又把我們的悲歡更迅疾地席捲而去。姜敏婻並不知道我的生活內容。她只是一個愛唱歌的女孩，帶給我一段萍水相逢的友誼和一串歌。

英文歌「回聲」ECHO，是那合唱團的指揮用他那富於宗教之美的男低音唱給我們聽的。

這首歌，多情的邀約，動心的許諾，伴隨著搖曳生姿的三拍子，宛如童年校園裡的秋千，載著花色衣裙的我們，飄飛而起。也如同那全無阻擋，向前奔赴的寬軌火車，昂揚的節奏，藍天白雲的日子，卻是從許諾到無奈，劃出一道長長的弧，走向低調的結尾和分手時的悵然。

「從前的回憶，怎也不能驅開。」

「萊茵慢慢流去，暮色漸漸襲來……」

長長的生途上，離開了生命中那淒傷又浪漫的春天，看過了眞實的萊茵河，感覺到正在由四

面八方襲來的暮色。這世界，曾給過每個人一些苦樂悲歡；而我只不過是其中之一。也許，我們承載的重量會彼此不同一些，但實際上，它們都只是一些不同調子的歌聲。當它們從時間濃霧中隱約浮現，都同樣地會使你感動又感謝，感謝又感傷；使你忽然了悟，原來，原來，你從未失去過什麼；也從未掌握到什麼。你那一切的追尋與失落，都只不過是生命本身早已注定的一種必然。

世界永遠還是一樣地擾攘不寧，只因爲，生命本身就是如此。命定地要重複著同樣的，無法超越的輪迴。

……

那江上的船夫，聽得如此地忘神
他只望著山上，而不顧水中
船衝到石岩上，從此人船俱沈
這全是爲著羅勒萊的歌聲。

是呀！今天，這被感情淹沒了的早晨，正如那曾被感情淹沒了的一生，原來都只是爲了某一些蠱惑的歌聲，那麼無法抗拒，那麼使你把虛幻當眞，癡癡地，就付出了苦苦樂樂的一生。

歌聲並未遠去。隨時，它都證明給你，讓你如此輕易地被歌聲承載著，回想起那——

未經世故的，

並不眞的知道什麼叫「悲哀」的，
總以爲事情會慢慢好起來的，
理想是值得追尋的，
付出生命也在所不計的，
那悽傷而浪漫的青春。

# 廿九、這樣一種揮霍

一九九三年四月，乍暖還寒季節，電視上看見家鄉人還都穿著厚厚的風衣，強風吹倒廣告牌，行人瑟縮，春花未開，我卻已開始確認機票，準備單憑運氣，來家鄉迎春了。

果然，才一抵達，就迎來了艷陽天氣，像是讓我專誠來重溫一下故土的春花似錦，伴著滿城風絮。

讀者當不會再問，「為什麼你變成了一隻候鳥，不辭辛苦地來來去去，做如此奢侈的旅行？」你不會再問，因為你已經了解，「回家」的人就是這樣，帶著幾場人生戰役的收穫，做一次又一次倦旅時的投奔。

而我，這在外奔波了一生的旅人，只是要體會一下這心情。無論它是辛酸苦澀與寂寞，也無論它是興奮、溫暖與多情。我不批評自己，也不問別人對我會怎樣批評。像我，這樣一個在當年，孤身南飛的人，一生的辛勞，各樣的奮鬥，種種的不被同情與不被了解，我太習慣了。如果

你知道，做為像我這樣一個「台胞」，當年在基隆下船時，那四顧茫然的感覺，和四十年之後，重返故土時，那同樣茫然的心情；如果你知道，當我正式認可，那同樣是一場又一場，必須全力以赴的硬仗，必須我自己去面對；你就知道，我是多麼樣地習慣了那種種的「打拚」。

當一個人，習慣了一切由自己負責的時候，他就會發展出一種精神上的強硬。學會認可由自己去創造夢想中的樂園，而且就相信那是一種眞實；也學會接納一切挫折，不屑呼痛。在自己的鼓勵之中生活下來，不問自己是在谷底，還是在波峰。

我這「候鳥」並不希望在家鄉築巢。習慣了一切都是「臨時」，人生本來「如寄」。那麼，既然要住旅館，就盡量住個好一點的吧！至少可以使自己賓至「如歸」。奔波終日之後，回到住處，能夠很方便地洗卻風塵，酣然入睡，那就是倦旅者最感安適的了。

這旅館，我也住慣了。雖然我仍是過客，心情上卻也時或出現一點「家」的感覺。天津的友人，看見報紙上說我來了，都會自動打電話到這家旅館來找我或寫信留言。因此也略能提供我一種「回家」的心情。

雖然我知道，幾天之後，我就又會回到我台北的住處，但我也知道，回去之後，我還會再來。

現實一點來說，我是很揮霍的，揮霍的是金錢。

浪漫一點來說，我也是很揮霍的，揮霍的是感情。

去年，在津京公路上，來回三趟長程的計程車之旅，只爲要呼吸一下那從遠天邊撲飛而來的家鄉的空氣，多看一看那藍得透明的天宇；所揮霍的既是金錢，又是感情。

只是你不免要問：「你眞的那麼富有嗎？無論是金錢上或感情上，你準知道你不會超支嗎？」

坦白講，也許我知道，也許我不知道；我一點也不願去想。

我要享有的就是眼前這份天風海雨的豪縱。

我在坎坷的生途上奔波得已經夠久了。做了一輩子這樣的中國人，不是要面對外患，就是要面對內憂；不是要面對戰爭的封鎖，就是要面對政治的禁忌。「今朝有酒今朝醉」是我樂觀的勇敢，演變爲經常、經常，出現的，心情上的豁達。難得把握住一兩次被環境忽然放鬆時，那倏然閃現的，揮霍的可能，成爲另一種不計得失的進取。

我不知道自己帳面上究竟有多少可供我如此揮霍的金錢。我只知道，它們在這資本主義社會、金權政治之下，實在微不足道。它們注定是會迅速地貶值。與其存著，不如在它們最能給你價值感的用途上，使它們發揮你最樂意看到的效能。

我也不知道自己血液中究竟還有多少可供揮霍的感情。我只知道，我能付出的那些「感情支票」上，全部都是既沒有「抬頭」，又不曾「劃線」。它們是即期的，但它們也像我的金錢一樣，在隨著歲月，迅速地貶值。

當然你比我更加知道，這些「感情支票」由於兩岸並未通匯，而並不具備使用價值。它們和我的金錢一樣，一放手，風飄飛絮。有些黏在了地面，化作春泥；有些投身江水，隨著滾滾浪濤，漩浮而逝。

值得欣慰的是，我是如此地習慣了櫛風沐雨，不捨晝夜地奔馳。我也早已習慣了當人生的戰火稍息，清點戰果時，那一片悽愴與空虛。我的動力只是一分不肯敗退的堅持，不甘坐待疾馳的歲月，提早捨我而去。

# 三十、時光隧道小時候

我常說：「中國人眞厲害！能讓人父母子女一輩子見不了面。」

見不了面的當然不僅是父母子女，還有夫妻、情人、同學、同事、朋友……

而我們一概很認命地滿足於「終於在有生之年可以見面了，而且逃過了一切的政治風暴，不能不說是『命大』」。

四十幾年，究竟是多長的一段歲月呢？

假如活得不太久，那是一個人的一生。

假如活得夠久，那是一生中最精華的一段歲月。不管你是從二十歲算到六十歲，還是從三十歲算到七十歲，那都是整整的一段生命的巔峰。

這些人學業完成，事業起步，戀愛與婚姻都正給人生塗染著華彩。心智成熟，正待爲環境和己身努力耕耘。而就在這朝著巔峰起步的時候，被隔絕了。

中國人使自己陷於衆叛親離。許多感情就此斬斷，許多計畫都要撕了重寫，從頭開始調整自己的信念。

你我當然都不曾停頓，只是彼此都走入了與過去一刀兩斷的悲情。互相都不再知道對方是在怎樣一種情況之下耕耘。

居然，四十年之後，一聲令下，允許你們重逢了！

於是，歡欣鼓舞取代了對那失去歲月的惋惜之情。大家心甘情願地就從這裡起步，面對一切本該熟悉的人變爲陌生。而試圖再度調整彼此，看是否能從這樣的陌生之中，重新建立或找回當年的感情。

返鄉探親的人們都已體會到這中國式的「時光隧道」。驚訝地發現，當年的長輩大半已經作古；當年的平輩變成老人；而當你所未曾預期的晚輩出現時，由於有四十年的空白歲月，會使你忽然覺得他們才應該是和你同輩的人。

這種種的失落以及年齡上的錯覺，有時會以很可笑的姿態出現。而這當時的「可笑」，瞬間卻又化爲難以解釋的悲涼。

這也是只有我們這一世紀的中國人才有機會體嘗到的一種奇特的心情。

去年，我經由天津社會科學院的協助，幫我這「台胞」安排尋訪我父親供職多年的「塘沽久大精鹽公司總工廠」，那養育我、培植我，記錄著我最溫暖的親情的地方。




天津碱廠是由當年的「久大精鹽」和「永利純碱」合併而來。兩岸開放之後，我再三往訪，心情上是「在這裡可以找到父親」，而我自己「可以回到童年」。

這工廠，是當年一群青年實業家身體力行，工業救國的最成功的範例。創辦者范旭東先生全國知名。他自民國初年在渤海之濱的塘沽創辦了「久大精鹽」。隨即發展「永利純碱」，取代了當時壟斷中國市場的英商「卜內門」。戰前又創辦了硫酸錏廠。我父親自民國八年至民國四十幾年，除了抗戰時期之外，都未離開「久大精鹽」。

返鄉最大的願望是再多看看「久大」。那是我小時候隨父母安身立命的地方。雖然父親已經在一九七二年去世，我對這工廠的懷念之情卻是更加強烈，總覺得去這工廠就好像是「回家」。

一九八八年，我首次返鄉就已和弟弟妹妹一同去了一趟。它已由當年的「久大精鹽」和「永利純碱」合併為「天津碱廠」，原址未變，仍可尋到許多舊日遺痕。那天是星期假日，我們這幾個不速之客並未受到如所預期的阻攔，由一位值班的張先生帶領，大致看了廠房和以前住過的員工宿舍。

一九九二年，我再去。由於有天津社科院預作安排，使我不但可以深入看看工廠內部，找到一些當年的建設遺址；也由於現在工廠負責人的熱心接待，為我找來了「當年的老人」，認為我可以與他們話舊一番。

「時光隧道」出現在我和「當年的老人」見面的那一刻，是很富戲劇性的。

第一次找來的「老人」趙巨賢先生，白髮蒼蒼，由兩位員工攙扶著下了「奧迪一〇〇」，我迎上前去表示尊敬，並握手問候：

「趙老伯您好！」

趙先生笑嘻嘻、顫巍巍，回答說：「我是當年明星小學的學生。」

我也是「明星小學」的。於是，我明白過來了，更正地說：「哦！趙學長您好！」

趙先生仍然笑嘻嘻，顫巍巍，再度回答說：「我和你二妹是同班。」

我再度恍然大悟，趕緊又更正說：

「哦！趙學弟您好！」

稱呼「連降三級」。旁邊參加這次聚晤的人們哄堂大笑。

從「趙老伯」到「趙學長」到「趙學弟」，是我從「時光隧道」走過來之後，猝不及防，所產生的錯覺。

離開家鄉時，父親才只有五十多歲。這白髮蒼蒼的趙先生，和我記憶裡那中年的父親同時出現。感覺上，他不但應該是「我」的「趙老伯」；而且應該是父親的「趙老伯」。在旁邊熱心接待我們的天津碱廠廠長，在年齡與風格上，卻完全與當年父親的同事們一般無二，使我無論如何也調整不過來這年歲上的錯覺，總覺得他是我父親的同輩。

第二次，「天津碱廠」也是用「奧迪一〇〇」鄭重接來了另一位「老人」——我小學同學王增壽先生。王增壽比我高三屆，這次我記住了不稱他爲「王老伯」；很「通達」地讓自己回到與他同樣的年齡，問他道：

「你小時候爲什麼告訴我說，天上的飛機是你做的？」

王增壽忘了他當年所「吹」的「牛」；更沒想到這麼多年之後，被他的小同學來「清算」。那時我們的「手工」課正在讓男生們用木板做飛機模型。我們的共同經驗就只到那幼小的年齡。

對一位白髮蒼蒼的老者，一見面，先問他「小時候」，又一次引起聽者大笑，而我們就再也找不到共同的話題。

「久大精鹽」是當年我經常來找我父親的地方。小時候，偷偷跟在他背後走到工廠，才被他發現，只得放我在辦公室後面的空地上，和新實驗成功的各色各式的玻璃瓶爲伴。長大一點之後，進了子弟小學。冬天大風雪，中午不回家，父親叫工友給我買新出爐的醬肉燒餅，讓我一個人在偌大的會議室吃這香醇美味的午飯。而那「會議室」和現在我做訪客所置身的這會議室，不論設備、格局與色調，都一般無二。雖然家具窗簾與地板，一切都新，那質料與式樣卻並未離開從前的基礎。也就因爲這個緣故，無論現在這位中年的寧培海廠長是怎樣用不肯定的神情說「恐怕不一定是原來那間」，我也仍然要一廂情願地把我當年的印象和如今的心情強加上去，堅持而又無奈地說：「就假裝是吧！」

我是如此不可救藥地回到童稚，回到少年。那是十二歲以前的我，尚未離開父母去學校住讀的年齡，而不是我隻身遠走台灣時的年齡。因此我尤其沒有辦法相信，那白髮蒼蒼的同學老者是我的平輩，而這位現任廠長不但不是我的長輩，也不是我的平輩，在年齡上，他是我的晚輩。

三次訪問「天津碱廠」，我始終沒有辦法使自己擺脫那由「時光隧道」走出來的感覺。我始終是一個浮游在現實時間之流以外的、不固定的存在。

這次訪問之後，回到旅館，三妹用提醒的語氣問我：

「你每次都要去天津碱廠，每次都不想參觀人家的設備，也不問問營運的情形，你是怎麼回事呀？」

唉！一直未離開家鄉且比我小十歲的三妹有所不知，我的目的豈是來參觀碱廠？我的感情豈是在於「天津碱廠」的設備及營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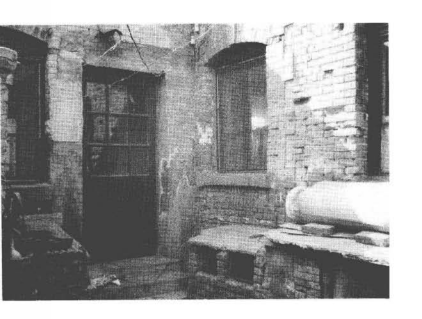
我再三地回到這養育我、培植我的地方，我所要尋訪的是那濃郁的幼時親情。目的是——**「再看一看我的父母的家園，再溫一溫我童年的甜蜜」**。此外我還更負載著一生的歉疚，下意識裡，覺得在這佈滿父親足跡的地方，可以默念一下我對父親的懺悔，獻上多年未變的孺慕依戀之情。我一點也不是來做一個訪客，一點也不是要參觀「新中國的建設」；我是藉著這由海上吹來的鹹味的風，讓自己回到一個失去的年代。問一問，是不是可以從少年的時候重新起步，找回一段當年我未曾把握住的光陰。而我相信，在那濱海的、藍藍的、寬朗的空間裡，一定存在著父親當年對家庭與國家的愛與熱忱；他會感覺到我這一心想要對他有所奉獻的心情。

而我相信，儘管風雲變幻五十年，從這幾次見到的天津碱廠員工們所無意間流露出來的，對他們已退休前輩的悉心照顧，所反映出來的「久大、永利」兩廠當年重視倫理的傳統，創辦者及

後繼者所沿襲下來的廠風。那種對退休前輩日常生活的了解，以及把他們由家中接來送去時，所表現的噓寒問暖，無微不至的神情，都還承續著當年的「久大」和「永利」兩廠互相支援，親如家人的傳統。

我一次又一次地造訪天津碱廠，而他們也以「非公事」的人情給我溫暖的接待。難得他們肯在繁忙的工作中排出時間，陪我回到一個久已逝去的年代，而給我的感覺是如此輕鬆。或許在這幾小時的談笑之間，他們也會開始了解——

我不是一個訪客，我是當年這裡的一個小孩。在隔絕了半世紀之後，帶著古今中外都難找到可以類比的惆悵，回到這故土，只爲的是要看看他們，好像他們都是我家裡的人。



# 卅一、一生的李伯大夢

塘沽新村十七號。

1993年4月返鄉時，由現任「天津碱廠」廠長寧培海先生陪同尋找，我少年時的「新居」。

唉，這便是了，六十年前，久大精鹽第一批員工宿舍，我們是第一家搬進來的。

古舊斑駁，六十年，它仍可以讓我去為它拍照，好像專誠等待我這一天。

這間小房間，是我當年的住屋，門都還是原來那樣，當年我在這裡看完了家中所有的線裝小說，晚上看《聊齋誌異》，嚇得把書扔好遠，才敢睡覺。

忽然
在自己古老的日記裡
發現了四十年的時差
一生的李伯大夢
我來自一個
曾被宣布「暫停」的年代
不知道我的一九五〇
已經是你們的一九九〇
我是從大宇宙的換日線
走回來的
一個失去記憶的人
從那「四十年暫停」前的起點
悠悠夢醒
戰前戰後的鐵砲
久已鏽蝕

卻一心以爲你們是
我入夢前的親人
不知道
自己變白的頭髮
與臉上的皺紋
我是入夢前的少年
用童稚的心
想要約上你們
和我一同相信
走過這熟悉的廠房
推開那即將傾圮的門
跨過斑駁的門檻
就可以看見我的雙親

請原諒我剛剛夢醒
不知道隔著一片年齡

誤以爲
你我曾經同在
不相信
我們如此陌生
原諒我無端地造訪
茫然於
自己是奇特的旅人
曾闖入時差四十年的
宇宙大夢
醒來時的驚訝是
兒時同伴都已老去
而我那重新起跳的心
卻孤獨地停留在
半世紀以前的早春

一九九三、五、七　台北

# 卅二、萬里關山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五，台北市秋雨瀟瀟。因爲喜歡這分清涼與蕭索，我藉口到中央圖書館，來淋一趟路上的秋雨。

心情和秋雨一樣蕭索。

千里關山，如今比萬里還更阻隔了。

家園人事全非的眞實感，在我走過十趟祖國關山之後，開始具體化了。

爲什麼要等去過這麼多次以後，才切實感覺到這份阻隔？

讓我告訴你，那是感情的濃度一直不肯被歲月的淚水所稀釋。

我不信，那一切「家」的溫馨，長輩的愛，愛情的情，曾經熟悉與曾經陌生，曾經互相了解與曾經有待證明的一切的人和事，眞的都已不在。

我用尋尋覓覓的心情，在五年之內回了十趟大陸。

第一個落腳處是北平。

現在它叫北京。

我不在意它名稱的先前與現在，我在意的是我將要離開它的那一年——一九四七年的冬天，我一個人，放棄了與我有關的一切，到這冷漠的古城來告別自己那不再有意義的青春。想問問那斜陽下的孤影，那心情上的淒清。

不是要找回那一天，而是要找回那一段落年輕的生命。毫無憑藉地想著，或許可以就這樣把四十年的時間擠扁，使它就像昨天和今天。

四十年，沒有擠扁。四十年，在這可以回去之後的十趟往返之中，迅速地膨脹，膨脹到我不再能從這一邊看到那一邊；膨脹到我不得不了悟，原來我已過盡了這一生；膨脹到我不再認識那邊的路，不再聽懂那邊的語言，不再了解也不再能接近那邊的故人。

他們說，「這就是你父親住過的陋巷。」

我瞥一眼就走過去。「什麼?我父親住這裡?開玩笑!他不會，他沒有，他不是這裡的人。這裡沒有他工作的地方，他不屬於這裡。」從小，我就知道，他是塘沽「久大精鹽」最早期就加入工作的開拓者。他盡忠那工廠，他愛那工廠。他說過，他知道自己是多麼幸運，將終老於那工廠。

他不會住到這北京的陋巷，那只容一個人進出的、下雨天就濕滑泥濘，不堪行走的羊腸小

巷。

他們鑿鑿有據，說，父親和繼母的晚年在這裡度過。一間狹隘的小屋，一個雜院，就讓年老的父親和繼母在恐慌中結束了他的一生。

什麼嘛！我不相信，根本不去細聽。

他們只是在講他們的一個噩夢。那怎麼會是眞的？

所以我一點也不難過。

一直住在大陸，曾經下放農村，好不容易平反，落實政策之後的三妹，總是在經過這條陋巷的時候，暗示我，以爲我應該進去看看；但是我不曾理會她的暗示。我要去找到父親眞實的足跡；那足跡是在塘沽久大精鹽工廠，在天津法租界花園旁，在塘沽新村，在天津太古洋行……。父親是神采奕奕的工業界的那位中年人，父親不是陋巷裡三餐不繼的貧戶。

或許正是因爲這個緣故，我不喜歡北京，不喜歡那裡的一些人，因爲他們總想把我拉進一個只有他們才知道的噩夢。

於是，除了到三妹家和她一起忘記這四十年，與她相聚，或參加開會，或領版稅，我盡量逃避北京。

我開始固執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天津，因爲我堅信，在那裡，我可以找到我所要的感情。

如今，一九九三年過盡了。我結束了我第十次的返鄉之旅，很突然地夢醒了。這夢醒，讓我看到了自己的固執與遲鈍——我是用一種什麼樣的心情在面對這「四十年一覺」的「家鄉夢」呢？我爲什麼一直要到跑過十趟之後才突然醒轉，才看到了現實的面貌呢？我該是多麼癡迷愚頑地、盲目地，以爲自己可以找回久已失去了的歲月呢？

其實，我也並沒有眞的想要找回什麼，我只是理所當然地以爲一切都依然存在，不必找，而只要「去」就是了！

我把這感情的夢，努力地化解成理智的愛。

我強迫自己安靜下來，仔細想，我所該做的，我所眞能付出的，我知道，時間會保佑古老的中國，如果我努力，時間也會認可我的努力。

我不再去悲悼那些已經從我生命中失去的個人；我要愛他們所留給我的愛。這包括父親所愛的詩，所愛的田園與山水，所愛的足以救國的工業。這也包括我的學校所留給我的愛。那學校已經不在了，但它教育出來的我們這些曾經獻身教育的人們都還是他們留下來的根苗；我要承續，做爲其中的一株。這也包括了曾給我一生影響的年輕的摯友。他留給我的是一片屬於青春的瀟洒與天然，以及我們共同對音樂的愛，共同做過的對國家前途的夢，那日子是不會隨著歲月流失的。他沒有完成的，我可以繼續去走。而我知道，在另一個世界裡，有億萬個和他一樣的中國人，在含笑等待我們和往後的中國人的成就，那都是要奉獻給國家的。

這不是高調，不是口號，而是一種愛。我們所愛的是那一直被冷藏，而生命力一直活躍旺盛的古老的、屬於中國的美德；來自民間小說與偉大詩人同時併存在人們心中的、高超的、不慕榮利的人生理想。

有不少人建議我，「你用版稅在大陸買房子吧！買了就賺。」

我聽任那版稅迅速貶值！我不想去做一個「炒房地產」的「汙染源」。

「你不炒，別人也會炒。」

「對呀！我們台灣就是這麼『發』起來的，『無殼蝸牛』也是這樣多起來的。」

我不是「台商」，我只是一個爲愛台灣當年的淳樸詩情而來耕耘的一個單純的、寫文章的人。

我愛很多事物，但獨獨不愛興風作浪，爲了發財而發財。

我的夢醒了。但「愛」在持續。它使我仍然夜以繼日地在做事，我知道，愛就是這樣一種生死不渝、執著感情。

附：

獻

我是一朵望鄉的雲
難得邂逅到
這樣的季節風
帶我飄回了
童年的海濱

四十年歲月
未曾留痕
我仍然是

卅二、萬里關山

當初那個小孩
帶著我小小的成績
投奔的心情
來到父親的廠房
推開他斑駁的門
「父親，我回來啦！
我要陪伴你
像你當年
對我的呵護
做一爐驅寒的火
一盞指路的燈
我可憐的父親
在你暮年歲月裡
曾怎樣地等待過
來自女兒的
這一份

一直想要奉獻的
孝心
請恕我
這麼久才得到
風的允准
讓我隨著記憶的腳印
追尋你走過的路程
希望能見到你的慈容
我要匐伏在你膝前
求你恕我一生的罪
讓我獻上——
這一杯，這一杯
痛——淚
浸透著
永未改變的
孺慕依戀之情」

一九九三、四、十九　海風中

# 是否

機窗外
晚霞的酡紅
凝聚著你和悅的笑容
是否你知道
我逝水般的歲月
惆悵的心情
是否你也曾想像
一個失約的年代
塗滿倉皇的履痕
是否你知道
有一份無從送達的歉疚

搭乘著飄泊的風
是否你的笑容裡
也有陌生的同情
是否你也在問：
　為什麼你總以為
　迎向潮汐
　越過風雪
　就可以索回青春
是否你也可以讀懂
我寫了又寫的那一封信
寄給海風的父親
河水的情人
　盼能接受我遲來的回贈
　冬日寒風裡
　仍可攜手同行
我深謝你的禮遇

不忍冷落我的癡情
接納我
擠滿憂傷的叩問
容許我
多看一看
再聽一聽
環繞在你周遭
那來自海上的
鹹味的風

一九九三、四、廿一　國際航空班機上



# 溯源



# 卅三、不朽的薊運河

自從兩岸開放以來，我回了三趟蘆台老家。

第一趟是和三妹、堂弟等人，隨便去轉了一圈，只看到了全無昔日痕跡的道路和市容。原來那是新社區，舊社區隱藏在後面。穿過一條寬寬的主要馬路，再穿過一兩條巷子，才可以看見舊時的北街。匆匆一瞥，也沒找到老家的遺址。唐山大地震，使許多房子都被震毀，老家也不例外。北街的街道比以前寬了些，房子當然也都是新蓋的。帶著茫然的心情穿過旁邊的土路再往北走，只見空空的土坡，旁邊有幾頭牛。然後就到了薊運河邊。

看見薊運河就等於看見了老家。它是我記憶中最美好的一景。道家生涯，詩人與農夫生涯的「插圖」。

第二次是天津社科院招待。先是在天津舉辦了一次座談會，和當地作家、畫家與音樂家見見面。然後我請他們陪我去看塘沽和蘆台。塘沽是父親帶著我們離開老家，走入工業社會的地方。

現在我是來看那由當年的「久大精鹽」和「永利純碱」合併之後的「天津碱廠」，讓我在心情上覺得仍然可以回到有父母呵護的童年與少年。然後由社科院朋友帶領，去蘆台。這次因爲有官方的安排，聯絡了當地的統戰部和年長的鄉親來和我見面，聽他們談了一些過去的老家習俗。當然大家對「靳嚮善堂」都知之甚稔，反過來告訴我一些我所不知道的掌故，接受了豐盛的家鄉菜的招待，晚上住在旅館。

我的目的是找到老家，不是來吃喝飲宴。但問來問去，大家仍是語焉不詳。晚飯時，很意外地一位堂妹和妹丈來找我，原來他們不但現住蘆台，而且妹丈魏寶才可能是在「靳嚮善堂」住到最後才離開的一位。他很肯定地知道老家的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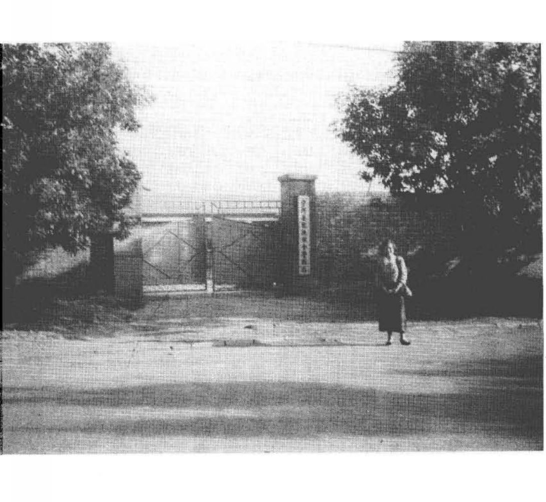
時間已經很晚了，魏寶才開著自己的車子，帶我們去看老家遺址——「這就是！」好大的一片空地，外面圍著簡單的圍籬。黑暗中，看不清楚，但既然已經知道了位置，就可以明天再來看看了。

第二天清早，我和三妹從旅館出來，在門口叫到一部三輪車。三輪車伕姓李，年紀不小了。聽說我們要去看「聚泰號」（老家以「聚泰號」糧店聞名），高興得很。「我和你們家的靳祖光最熟，當年常在一塊玩。」靳祖光是比我小三歲的堂弟。我們這一代的男孩子之中，他最大。我不但在女孩子中最大，而且是全家這一代的孩子中最大的。他們說是我這「老大」，給靳嚮善堂的第五代帶來了二十個弟弟妹妹。我們五代同堂，沒分過家，所以堂房兄弟姐妹也像親的一樣。



靳鸞善堂五代同堂，雖已無「堂」可同，卻是親情依舊。堂弟祖訓見五叔（祖訓已是南京農經學院的院長），你看這兩位的表情，長者和悅，幼者孺慕，發乎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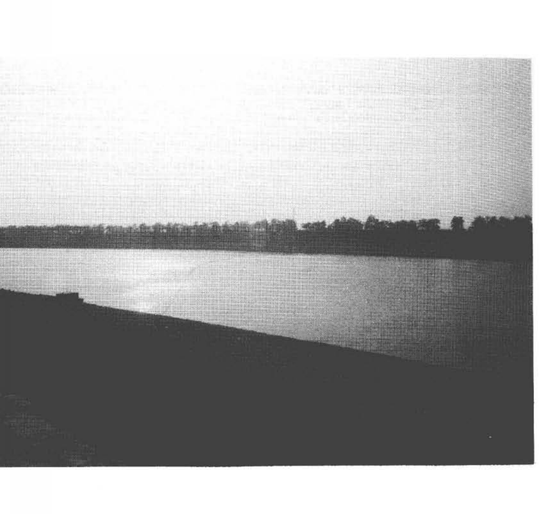
五叔從那麼堂皇的大宅裡走出來，住在狹窄的宿舍裡，依然保持和悅、安詳的笑容，百分之百代表著老家的傳統門風。



「靳鬱善堂」遺址，它仍然是很安閒地在薊運河畔。有它寬鬆鬆的圍牆，輕輕地標示著它的存在。



「新嚮善堂」的後門外，薊運河永恆地流著。我和兒子朱旭來憑弔遺址。「老家」並沒有眞的消失，它將永遠存在於我們這後世子孫心中。



老家還是很安閑地存在於薊運河畔，那來自河水與藍天的清朗氣質，使它以十分怡悅的神情，隨著時間，走向另一形式的不朽。

我們坐「李師傅」的車去北街。三妹很不習慣，她好像沒坐過三輪車似的，說：「人拉人，眞過意不去。咱們爲什麼不下去走？」她是非常「社會主義」的。

已經坐上車子了，何必多想？再說，「李師傅」又那麼熱心。他好高興能拉到靳祖光的家人。

他毫不遲疑地帶我們到老家原址。下得車來仔細看，那寬大的、像廠房一般的圍籬，疏疏朗朗的圍著，面積很大的鐵門安閑的關著。門旁一個牌子，寫的是「能源管理委員會」。遙望那空闊的院落，只有一間臨時房屋，想來那就是辦公室了。

果然，這地點「風水」不凡！歷盡劫難，現在它仍然是站在時代尖端——管能源。

我們悵惘地站在門外，對這片空地品頭論足。這時，聚來了一夥當地人，除一位穿制服的，大概是治安單位負責盤查的之外，大部分是婦女。其中一位大約三十多歲，操著典型的家鄉口音問我：

「是聚泰家的嗎？」

「從那兒來呀？」

「台灣好不好啊？」

「這一家子都搬啦！命好！地震一個都沒趕上。」

「靳家規矩大喲！家裡的男人走這邊，」她用手比著，「女人走那邊。男不見女，女不見

男。他們家冬天用檀香木燒炕。一到下午滿街都香。」

我們都笑了。

我是在「聚泰號」長大的，家裡的爺爺奶奶，伯伯叔叔，伯母嬸嬸……規矩是很多，但男也見女，女也見男。一家人，怎麼能不見？只不過，長幼有序。做兄長的和弟媳婦確實嚴守舊禮，彼此不多講話；不但幼輩見了長輩要垂手侍立，弟弟見了哥哥，也要起立相迎。但這一切禮貌都是自然而然，不會有「男不見女，女不見男」的怪事。「檀香木燒炕」？不可能吧？

不知這位比我年輕這麼多的同鄉婦女，從那裡得來的這些傳聞。算算她出生的年月，已經是「解放」之後，那時我早已離鄉遠走。老家人們也已星散，家中曾一度駐進了「解放軍」。以她的年齡，不可能認識「靳嚮善堂」的什麼人。對唐山大地震之前的這所大宅，她也不會有什麼印象。這是一九九二年，距離曾祖母〈白馬傳奇〉、〈檀香木燒炕〉的年代，已有一百多年了，怎麼可能仍然有這麼多的里巷傳聞？而使她這位年輕婦女，如此認眞而興奮地把這傳聞傳布給我這「靳嚮善堂」的第五代？她不知道我是在這宅院裡長大的。

我覺得眞是驚奇！

不過，這也可能是我幾次憑弔老家，所得到的最「不朽」的消息了！

「衣冠不改舊家風」吧？人都走了，家已傾圮，而「家風」卻還存在於人們的傳說之中。

這次，我是帶著我的大男孩同去的。我希望他具體看看這隔海的、屬於母親這方面的

「根」。

一年之後，一九九三年，我仍請社科院的姚同發先生帶我回蘆台，再去看看老家。姚先生曾在蘆台工作過，那裡是他很熟悉的地方。

這次統戰部「吳部長」不再閃爍其詞。當我告訴他，我上次已經找到了老家遺址的時候，他告訴我，「不錯，那就是聚泰號。」起先是「糧食局」在那裡辦公。現在是「能源管理委員會」。

他並且補充說：「我曾在糧食局工作過，天天到那裡去上班。」我奇怪他爲什麼不早告訴我。

當然啦！「聚泰號」糧店，不做「糧食局」做什麼？

眞是「風水」使然吧？

我第三度去看那白亮的薊運河。這次，岸邊已經堆積了許多磚石。「吳部長」說，縣裡準備把這河邊做成一個「帶狀公園」，供人們休憩之用。

想像那古意盎然的「月白風清之夜」，將被現代繁華的霓虹所取代。前來納涼閒坐的人們，將不再留戀傳統的風雅，而樂於享受現代的人爲裝飾。那大概就是另一種「中國的世紀」來臨了。

我聽長輩說過，這薊運河的潮水是偏往北岸沖激，鄉人稱之爲「潮打北」。每年河道逐漸往

對岸移動。而這邊就自然而然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新生地。曾聽長輩們說，老家的房子在當年剛建好的時候，人們從後門圍牆外走過，要側身靠牆，小心翼翼地走。因爲那圍牆距河岸邊只有一尺多寬。但是多年來，因爲「潮打北」，我們的圍牆外面早已形成了可以再蓋一層四合院的新生地。而當年的地契上所寫的地界是「北至河沿」，這應該說是大自然在給「靳嚮善堂」的地產無限擴充了吧？但是大家並不想往河岸邊加蓋房子。以當年人們的想法，那片新生地應該是屬於薊運河的，爲「河神」所有。人不應該妄想去佔據它。

我不必再去尋覓那可愛的大宅。

很奇怪的一種感覺是，自從我三次往訪，肯定了老家的位置，證明了它還是很安閑地在薊運河邊，有那寬寬鬆鬆的圍籬，輕輕柔和地標示著它的存在。那來自河水與藍天的一分清朗的氣質，使我覺得它正以十分怡悅的神情，隨著時間，走向另一形式的不朽。

# 卅四、歲月沉沙

一九九〇年，我「打撈」上來一份舊報。

它是四分之三世紀以前的《天津大公報》。

日期是「民國八年六月卅日」。

我翻來覆去地看它，已經好幾天了，卻覺得一直都還沒有辦法把它看完。其實，它是很簡單的，而且只有「第一張」。但是，就只這一張對開的報，向我展開的卻是一整部的中國現代史。而它比任何的歷史書都更溫暖、活潑、生動。

這張報，非常生活化地顯示出距今四分之三世紀以前的年代，我們那奮力圖強，與惡劣環境宣戰之下的中國。那嘹亮清新而又深沉無比的時代的聲音，透過這張報紙，像千軍萬馬，擎著大旗，奔騰而至；又像一位親切的長者，帶著無限的溫慰與關懷，要我細聽他認眞告訴我，那天風海雨的一個時代。

那不只是一張報紙，那是廣遠沈雄，充滿開拓與奉獻精神的歷史的足音，朝著今天的我漸行漸近，親切極了。它說：「你不需要再去各處參訪，你只消靜下心來面對我，就可以知道你和你們這些人的來時路。表面上，它十分崎嶇，實際上，它非常壯闊；表面上，它舉步維艱，實際上，它十分穩健。那飽含著內在活力與自信的步伐，肯定地告訴你，那時代，以及那時代的人們，匯集了全國力量拒簽不平等條約之後，正在齊步向前，用使你誠服的信心與鬥志，不是喊口號，而是在實踐。那穩步的改革，不畏艱難的披荆斬棘，是爲了讓你今天回顧時，看到他們所開的路，每一分都是今天的基石。你們都曾從那上面踩過。於是，你們有了今天。」

現在，讓筆者我來告訴你，關於這張《天津大公報》。

這張對開的報紙是它的「第六千九號」。（它是這麼寫的，純粹中國式的寫法），民國已經建立了八年。《大公報》由當初的「邸報」式，如同書本一樣的印法，改爲直式對開。稱國家爲——「大中華民國」。

全部版面上，沒有一個阿拉伯數字，所有的年月、號數，一切數字全是中國方塊字。

那天的日期——「大中華民國八年六月三十日即己未年六月初三日」，印在刊頭的右邊。

刊頭左邊是——「西曆一千九百十九年六月三十號星期一」。

報紙的外文刊頭用的是法文 L’IMPARTIAL 。下面是羅馬拼音的 TIENTSIN（天津），下寫「第六千九號」。再往下是橫排小字，寫著地址：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立券之報件 大公報第一張 明治三十八年九月一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星期一）

大中華民國八年六月三十日卯己未年六月初三日

# 大公報

L'IMPARTIAL
TIENTSIN

西曆一千九百十九年六月三十號 星期一

第六千九號

商務印書館
秋季開學用書
教育部審定公布
各省長通飭采用
共和國教科書
實用教科書
單級教科書
簡明教科書
教授書一律齊全

商務印書館
日用百科全書
准期陽曆七月十五日出版

商務印書館
小說月報
十週紀念贈品

中興煤礦公司付息廣告

民國八年六月卅日（舊曆六月初三日，我出生那天）的大公報，曾為它寫了一篇〈歲月沈沙〉給《聯副》。

「本館開設天津日租界旭街四面鐘對過」。（沒門牌）

然後是「電話四百五十號」全部是「國字」。「今日本報共出三大張」。

第一版（它叫第一張），不是要聞，而是廣告。廣告沒有什麼設計，和新聞一樣，一條一條豎著排，只是把廣告主題用黑底反白，像石碑一樣。

當天最大的廣告是日本人開設的一家醫院——東亞醫院。特大號楷書，下面第一行是「院長田村俊次」。

不要忘記，那民國八年六月，正是「五四」浪潮奔騰洶湧，從平津擴及全國，從學生擴及農工商各界，全國為當時政府不能在巴黎和會中爭回山東的利權，激烈抗日的時候。日本人所開的醫院卻仍然是報紙最有勢力的廣告客戶。這在當時言論最前衛的《大公報》是設在日租界。而這家日本人開的「東亞醫院」的地址卻不在日租界而在法租界。

廣告詞寫得很「逗」。全文沒有標點，「一氣呵成」，令你喘不過氣來。寫的是：

「本院以中日親善之目的而設立各種專門醫員學術深奧經驗宏富而最喜者非為營利蓋喜治療之成績而卓著此本院之特色者也」。

「中日親善」的口號，原來那時就已經在用了。

「病室幽潔內備療病之機器無不完全於天津堪稱第一」。

最末一行是地址：

「天津法租界西開　電話一七八九」，沒標點，中間空一格就是標點。

細看這第一頁的廣告，刊有報紙本身的價目表，耐人尋味的是。「本地每月大洋七角，零售每份銅元四枚」以外，「外埠」和「日本」價錢竟然一樣，全年九元五。「外蒙」倒和「外國」一樣（那時外蒙還在我國版圖之內），全年十五元。如今想來，「外蒙」和「外國」一樣也許有它地理上的理由；「日本」和「外埠」一樣卻不容易了解。如果說是以路途遠近或交通是否便利爲準，那或許是從天津去日本比來往國內邊遠地區還要方便的緣故吧？在這價目表欄的下面另有說明，寫的是：

「凡定閱本報者本埠外埠及各國一律均按陰曆核算概收現洋定者若以郵票代現洋按九五扣收報費先惠空函定閱恕不奉覆」。

你如不太了解，請自己在「九五扣收」及「報費先惠」下面各點上一個標點。就明白了。

後來我才發現，這整張報紙，包括廣告與新聞及評論，完全沒有標點。原來當時「新文學運動」剛剛起步，文字方面已擺脫了文言八股，略顯文白夾雜，標點卻還完全沒有開始應用呢！「新文學運動」使我們現代人用好奇的眼光讀當年的報紙。凸顯出這文學革新的特殊意義，它眞是不平凡的！無論當時有多少激烈的論戰，如今看來，時間是做了它要做的裁判。

一張報紙，固然會從所刊載的新聞或評論中，透露出當時社會的脈動；廣告卻也時常更會提供側面的消息，能使你從更生活化的層面去觀察當時社會的動態。比如說，你從這張《天津大公

報》的廣告中，不但可以得知那時就已開辦了「郵政儲金」，而且銀行也業務鼎盛，「中國」、「交通」與「中國實業」都在當天的廣告上出現。「交通銀行」更用很大的篇幅報告他們的悠久歷史與輝煌業績——「本銀行設立於前清光緒年間，迄今已屆十年……國內設有分行七十餘處，國外分行二處，另有代理代換機構二千餘處。凡商業銀行所有之業務無不具備……」（其中標點是筆者加上去的。）由這條廣告所詳列的業務內容看來，和今天的銀行不但沒有差別而且規模方面猶有過之。

此外，「中興煤礦」在通知發放股利。天津最有名的「謙祥益」綢緞莊和國貨「松鶴牌」棉紗的廣告給人的感覺也十分堂皇，顯示當時工商業的殷實與穩健。

而令今天的我們感到羨慕的是，在全版十則廣告中，有三則最「理直氣壯」站上頭版頭條的，全是正當的「書」的廣告。而且都是「商務印書館」的。包括一、百科全書、二、各級學校教科書。三、小說月報。

另有兩則是聖功女中和法政專科的招生廣告。

一種誠樸殷實，富有朝氣，在列強環伺下而不屈不撓，充滿志氣與自信的感覺，勾勒出那民國八年的中國人們，心情上豪情萬丈的壯盛。

這一張《天津大公報》透露著令今天的我們仍然心情波動的訊息。「五四」波瀾壯闊，全國學生赴京請願之類的相關新聞仍在刊登。這張報紙的兩天以前，六月廿八日，巴黎和會簽約之

日，旅法華工集合至三萬多人，奔走呼籲，包圍中國各代表的住所，要求拒絕簽字，發揮了海內外團結一心，衆志成城的力量。

當年留學法國的學生和留日的學生人數最多。知識分子極力從外洋吸收新知的心情是悲壯昂揚的。他們都比在國內的人們更加倍地體會到「國家」強盛的重要。一種「哀兵必勝」和「捨我其誰」的心情躍然紙上。

那是一個把日本年號也放在報紙頂端的年代。寫的是「明治三十八年九月一日第三種郵便認可」。

那是一個從法國輸入思想，而用法文翻譯報刊名稱時代。

那是文白夾雜而充滿銳氣的時代。

那是個沒有標點符號卻使你看到一切的革新都蓄勢待發的時代。

那是有容量把優良書刊的廣告放在報紙頭條的時代。

那是個「不管時局多麼困難」，銀行、郵局、工商業卻是都已齊備而且規模宏偉的時代。

那是個容許大專校長「一任到底」，專心治理一所學校而可以心無旁騖，終身奉獻的時代。

民國八年六月卅日這張《天津大公報》上，有一則緊急啓事，標題是：

「天津各校校長請釋被拘學生」。

啓事的署名有當時天津各有名的大專與中學的校長。其中吸引我注意的是「第一女師校長齊

國樑先生」。

「第一女師」是我日後就讀，獲益最多的學校。那時，校長已是「院長」，留美歸國，帶來許多新知。齊國樑先生一任到底，不但直到抗戰爆發，而且搬到大後方之後，仍然是他任校長。戰後復校，也沒有改變。幾十年如一日，治理同一所學校，方針得以貫徹，使這學校發揮了深遠的影響力。

不管環境何等惡劣，無論列強怎樣囂張，當我們回顧來時路，定會感覺到自己身爲一個曾經擁有這時代歷程的中國人而自豪。

我們要的是一個能與世界並駕齊驅的中國。

不僅是「並駕齊驅」，你應誠服的是，放眼全世界，唯有我們在經過數不盡殘酷的侵略洗劫之後，展現在世人眼前的仍然有那麼多與近代史同年齡的各種建設。它們有國人自己的心血，有列強冀圖強佔的遺痕和飽受炮火洗禮的烙印。而它們仍然那麼巍峨，那麼不屈，那麼健在，而且把列強的經營也化爲我們所有。

它說明，有些生命似乎就是這樣——它們是越打越壯，越燒越旺，不會倒下的。

一張報，看得我這麼感動！它讓我鑽進了歷史的洪流。像潛水的泳者，從歲月的沉沙中，打撈上一頁歷史的見證。它讓我有機會追回我不曾認識過的年代，與它見面，和它細談，讓我發現

它不但沒有一點朽壞或變形；反而更加凸顯出它們質地的堅實與價值的永恆。

附記：

這天，「大中華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六月三十日，陰曆六月初三，是我的生日。



# 著作年表

一九五九年（民國四十八年）以前

・以靳佩芬本名及不同筆名在報刊發表散文及小說，並爲廣播節目撰寫短劇。

一九五九年（民國四十八年）

・開始用羅蘭筆名撰寫人生哲理性之短篇論述及散文小品，在廣播與報刊發表。

一九六三年（民國五十二年）

△出版《羅蘭小語第一輯》，收入〈敝履〉〈談忙〉〈看戲的傻子〉〈偷閑一遊〉〈小悲哀不必悲哀〉等五十五篇。

・發表〈談徐訏的詩〉於《中央副刊》。

一九六四年（民國五十三年）

△出版《生活漫談》《給青年們》等書信體廣播作品共一百四十六篇。

·發表〈廟裡的日子〉〈父親的照片〉〈吉人天相〉〈夏午〉〈兜雨〉等散文，約每周一篇在《中央副刊》。

·發表〈風外杏林香〉〈冬暖〉〈葉澐〉等短篇小說於《聯副》及《皇冠》。

一九六五年（民國五十四年）

△出版《花晨集》，收入上述短篇小說等共十二篇。

·陸續發表〈那豈是鄉愁〉〈生活的滋味〉〈寄給飄落〉等散文於《中央副刊》。

△出版《羅蘭散文第一輯》

一九六六年（民國五十五年）

△出版《羅蘭小語第二輯》。收入廣播作品十二萬字。

·發表〈碧天俱著海洋〉〈那南風吹來清涼〉〈春夜聞笛〉〈雨中的紫丁香〉等一系列散文小說。嘗試將小說及散文加入音樂的聯想，以表達有關戀愛的各種心情，題為「青春組曲」（《聯副》）。

·發表〈聽啊聽啊聽〉〈二弟〉等短篇及〈嗚咽的河〉中篇等以教育問題為主幹的小說。

**一九六七年（民國五十六年）**

·發表探討當前教育問題的論述〈一億字的心願〉於《徵信新聞人間副刊》。（此文一萬五千字，獲得廣大讀者迴響，未收入任何文集）。

開始撰寫《飄雪的春天》長篇小說。

△出版〈羅蘭小說〉短篇集。

·發表《綠色小屋》，先爲短篇，在《人間副刊》發表。後改寫爲十二萬字之長篇，在《純文學》月刊發表。

**一九六八年（民國五十七年）**

△出版《綠色小屋》。

△出版《羅蘭散文第二輯》，收入〈生活的滋味〉〈那豈是鄉愁〉〈彩色的聯想〉〈青春組曲〉等，計三十篇。

**一九六九年（民國五十八年）**

·發表長篇小說《飄雪的春天》，於《徵信新聞·人間副刊》連載。

·《羅蘭散文第二輯》獲中山文藝獎。

·開始爲《婦女雜誌》撰寫「現代生活」專欄。

**一九七〇年（民國五十九年）**

△出版《飄雪的春天》。

一九七一年（民國六十年）

・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訪問，沿途撰寫「訪美散記」並遊歷歐洲及亞洲等十一國。

・發表〈華府風貌〉〈天涯若比鄰〉〈無止境的超越〉〈洞天豈在塵寰外〉等遊歷散記（《人間副刊》）。

△出版《訪美散記》。

・發表〈孔夫子在臺北〉〈莊周夢錢〉寓言及其他散文於《聯副》及《華副》。

一九七三年（民國六十二年）

△出版長篇小說《西風古道斜陽》（在《文壇月刊》發表）。

一九七四年（民國六十三年）

△出版《羅蘭小語第三輯》。陸續出版各散文集。

一九七六年（民國六十五年）

△出版《詩人之國》（在《中央副刊》發表）。

・發表《歌與春及花》系列小品於《聯副》，並予同年出版。

一九八〇年（民國六十九年）

△出版《一千個你怎麼辦》選集。收入為廣播節目所撰寫之教育短劇及問題解答一百篇。

△出版《獨遊小記》。

△出版《早起看人間》，收入為《婦女雜誌》所寫有關社會及婚姻問題之專欄計三十六篇。

一九八一年（民國七十年）

·《天下雜誌》創刊，應邀撰寫有關傳統文化與經濟社會之矛盾與調適問題之專欄。

一九八二年（民國七十一年）

·撰寫《濟公傳詩歌劇》。

一九八三年（民國七十二年）

△出版《濟公傳詩歌劇》。赴印度旅行。歸國後，發表〈印度行〉〈印度一弦琴〉〈風雨歸舟〉等散文於《聯副》。

一九八四年（民國七十三年）

△出版《羅蘭小語第四輯》。收入〈勇往直前談人生〉〈答問談道家〉〈武俠小說中的武與俠〉〈百川匯海溯源頭〉等討論傳統中國文化之散文與現代生活小語約十二萬字。

·爲《民生報文化版》撰寫「指南針」短評。

一九八五年（民國七十四年）

·發表〈燈的隨想〉系列小品於《聯合文學》。

·赴菲律賓參加亞洲華文作家會議。次年夏，寫〈菲律賓的資源及藝術〉，題名「另一種財富」，發表於《天下雜誌》。

△出版《生命之歌》散文集。收入〈燈的隨想〉〈生命之歌〉〈印度一弦琴〉〈風雨歸舟〉等計卅三篇。

一九八六年（民國七十五年）
·往返美國多次，體驗美國生活，撰寫〈美式商業幻術〉〈跟上時代的悲哀〉〈屬於中國的現代〉等專欄論述。

一九八七年（民國七十六年）
△出版《從小橋流水到經濟起飛》。收入〈從不屑言利到不恥言利〉〈從三顧茅廬到自我推銷〉等為《天下雜誌》所寫之專欄及〈孔夫子在臺北〉〈莊周夢錢〉等相關文章，計三十八篇。

一九八八年（民國七十七年）
·兩岸開放之後，開始往返大陸，撰寫〈故土之旅〉、〈返鄉小記〉等散文，在各報刊陸續發表。

一九八九年（民國七十八年）
·赴美國遊歷落磯山十州，歸復寫〈旅行筆記〉在《中華日報》發表。
△《綠色小屋》英譯本出版。

一九九〇年（民國七十九年）
·開始撰寫《歲月沈沙》散文，記載所做的生涯回顧。

一九九一年（民國八十年）
·應邀赴南非旅行，發表觀感及詩一系列於《聯副》、《聯文》與《華副》。

一九九二年（民國八十一年）
·應大陸出版界邀請，赴東北參觀訪問歸，歸後寫〈野風呼嘯過關東〉等散文，並開始為《天津日報》不定期撰寫〈羅蘭時間〉等散文，及小品。

一九九三年（民國八十二年）

·發表「我家雪莉」生活故事一系列，及其他散文於《聯副》、《華副》與《新生副刊》。

一九九四年（民國八十三年）

·發表《歲月沈沙》於《中華日報》、《新生報》、《青年日報》，美國《世界日報》轉載。

一九九五年（民國八十四年）

△出版《歲月沈沙》三部曲——「薊運河畔」、「蒼茫雲海」、「風雨歸舟」。

一九九六年（民國八十五年）

·「歲月沉沙」三部曲獲「國家文藝傳記文學獎」。

·四月，參加在南京舉辦之「第八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華文文學的成就與使命」。

·六月，天津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主辦「羅蘭作品研討會」，應邀參加。

·七月，應邀赴美國休士頓參加「華文作家會議」發表演講。

一九九七年（民國八十六年）

·四月，應邀赴美國華盛頓，參加「亞洲文學國際會議」，歸後撰寫「新世紀的跫音」，在台北中國時報發表。

·十月，「羅蘭作品研討會」之論文「解讀羅蘭」結集出版。

・十一月，應邀赴北京，參加「第九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兩岸文學同步同源的感情啓示」。

一九九八年（民國八十七年）

・六月，應邀赴香港參加「廿一世紀中華文化使命研討會」，發表談話。

・八月，應邀參加在台灣舉辦之「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第三屆會員代表大會」，會後發表「散沙浩歌」感言，前瞻華文文學在全世界的普及性及其前景。

（作者作品自一九八六年起，已陸續在大陸出版簡體字版）

歲月沉沙三部曲：
薊運河畔、蒼茫雲海、風雨歸舟

ISBN 957-08-1390-3



# 前言

## ——獻給讀者

一九九〇年七月，台北天氣酷熱，住處樓上又在整修房屋，竟日塵土飛揚，噪音盈耳。不得已，只得向中央圖書館申請了一個研究小間，一方面避開塵囂，一方面想讓我對自己這生命的長程，做一次感性的回顧。

我這趟生命的列車，已經在這世界上奔馳很久了。我不想就這樣頭也不回地沿著這生命末梢隨風而逝。並不是我要留戀這世界，我只是想要認眞地了解一下自己這幾十年生命旅途上，都看到了一些什麼，和它們究竟都代表著什麼意義？

在中央圖書館，我用了三個月時間，從自己出生那一天的《大公報》開始，細讀自一九二〇年代到晚近的各種相關史料，我所致力尋訪的，全是自己曾經從旁走過，卻又全是當時幼小或年少的自己所不曾了解的一些路程，它們籠罩我，影響我，塑造我，考驗磨練我，也培育我。而我這三個月在「研究小間」，藉著報刊書籍上的文字記載所做的生涯回顧，可以說是讓我把一生所經過的路程，從頭再走了一遍。

離開了「研究小間」，我開始沈下心來，用剛剛回去檢視過這趟旅程的、嶄新而澄澈的心情，著手寫這部題名《歲月沈沙》的書，寫這樣一個渺小的我，如何走過了這樣一個複雜的時代。

那是一九九〇年九月，我開始寫下這部書的第一篇——〈大宅巡禮〉，想要帶讀者回去看看我那記錄著歷史軌跡的老家。

也要感謝一九八七年的與大陸恢復來往。那以後的五年之內，我往返大陸十趟。它不僅讓我認識現在的故土，也給了我具體的可能性，去找回我廿九歲以前的腳步，用屬於一個中國人的一世滄桑的心情，把那悲喜交集，一言難盡的感慨，通過實際的了解和具體的回顧，來做一次由衷的表達。

今天，是一九九五年四月廿七日了。

我從《薊運河畔》寫到獨自飄洋來到台灣之後的《蒼茫雲海》；歸結爲能在有生之年，回到故土去尋尋覓覓的《風雨歸舟》。

寫這樣一個中國人的生涯回顧，用了將近五年的時間。我實在已經很累。所幸，我總算把握住這段時間，讓自己有機會回溯到生命的源頭，用惆悵而又安恬的心情，認眞地「再活了一次」。

現在，當我擱下這支爲我用慣的筆，靠向椅背，面對滿室空寂，仍彷彿聽到遠遠傳來歲月的

濤聲，帶著沈雄的迴響，向我敘述它們的感慨，告訴我時間的去處，宇宙的遼闊，與個人生命的渺小與蒼涼。

讓我就此把感慨化作欣慰，把這部《歲月沈沙》獻給愛護我的讀者。

「**海上風濤闊，扁舟好自持**」，是我當年隻身來台時，面對茫茫大海，惆悵悽惘而又對前途充滿憧憬的心情自況。其實，它也是每個人在人海風濤中奮勇航行時，所共有的心情，個人所能做到的，也許只是爲自己好好掌舵，認識這航程，記錄這航程，以使自己不虛此行吧？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一九九五）四月廿七日台北

# 風雨歸舟：歲月沉沙第三部

1995年6月初版
1998年9月初版第二刷

定價：新臺幣180元

著　者　羅　蘭
執行編輯　吳興文
發行人　劉國瑞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電　話：23620308・27627429
發行所：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
發行電話：26418661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6418662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ISBN 957-08-1390-3(平裝)